

96
K250.6
2
2:130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辑

(总第 13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

509965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30 辑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8

ISBN 7-5034-0757-3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9138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通县燕山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大 32 开
印 张：7 字数：164 千字
印 数：1—7,000 册
版 次：1995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7.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 抗 日 史 料 ·

- | | |
|---------------------|------------------|
| 转战豫中 | 陈正风 (1) |
| 鲁西豫东抗战中的第三十二军 | 齐国樞 陈锐霆 张尊光 (25) |
| 追忆南阳保卫战 | 董永昌 (39) |
| 安阳守卫战前后 | 陈家珍 (47) |
| 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真相 | 韩同文 (54) |

· 文 化 史 料 ·

- | | |
|------------------|-----------|
| 我从事戏剧工作的经历 | 吴祖光 (77) |
| 我的求学之路 | 张志公 (88) |
| 张大千在青海 | 贾永琛 (105) |

· 人 物 述 林 ·

- | | |
|-----------------|---------------|
| 范汉杰的人生历程 | 李以勋 (109) |
| 解放前夕的李汉魂 | 承纪云 (126) |
| 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 | 徐晓林 陆雅乾 (137) |

· 工 商 经 济 ·

- | | |
|------------------------|--------------|
| 抗战前的国民政府审计部 | 季树农 (152) |
| 旧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人事制度简述 | 谭子薪 张森 (162) |

- 旧中国直接税的回顾 倪 镇(175)
旧中华邮政人事制度一瞥 毛祖培(184)

• 政治史料 •

- 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 文 强(196)
漫谈盛世才的特务统治 何耿光(207)

• 补充 订正 •

-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的补正 程金荣(216)
对《津塘蒋军被歼纪要》等文的订正 胡晴华(218)

• 抗日史料 •

〔编者按〕：在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本书特提供一组我抗日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史料。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较详细地介绍了原国民党第二、第二十、第二十八等集团军的某些部队在中原地区抵御日军的战斗场面，以及“珍珠港事件”后，英、美等外籍侨民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的经过、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在中国军民的帮助下战胜饥饿、疾病，最后被营救的感人情景。

转战豫中

陈正风*

1944 年 4 月 18 日，侵华日军发动了中原会战。当时我任第一战区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中校作战参谋兼军长刘昌义的侍从参谋，曾跟随刘昌义转战于中牟、新郑、长葛、许昌、襄城等地，一路上与日军反复拼杀，浴血苦战，历尽艰险，予敌重创。虽已事隔近半个世纪，但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会战前敌我之态势

暂编第十五军于 1941 年下半年在偃师县缑氏镇成立，军长是刘昌义中将（河北高阳人）。辖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刘耀军，河北良乡人）一个师，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序列。我在

* 作者当时系暂编第十五军参谋处作战参谋兼军长的侍从参谋。

中央军校第一分校第十七期毕业后，即到该军任职。次年十月，暂编第十五军奉命移驻西平县，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指挥。1943年11月，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总部由安徽阜阳移驻河南禹县，改辖暂编第十五军、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和泛东挺进军（总指挥陈又新）。当时，暂编第十五军正在新郑整训，担任中牟一带新黄河河防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奉命归属本军。

刘军长本人虽系行伍出身，但十分注重军官们的学历、部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他延聘、接纳了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毕业于东北、西北、保定、云南讲武堂的老军官来部队任职。部队在新郑整训后，连以上军官几乎全部进行了调整和更换，面貌较前大为改观。当时，军长以下的军官主要有：中将副军长李强（江西人，黄埔第一期）、少将参谋长赵蕴奇（东北人，陆大干训班毕业）、暂编第二十七师少将师长萧劲（湖南人，留德生）、第七十九团上校团长刘耀军（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练习队练习生，此时由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降为团长）、第八十团上校团长张少泉（湖南人），第八十一团上校团长王××、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浙江开化人，黄埔六期）、第八十五团上校团长杨尚武（湖南沅江人，陆大毕业）、第八十六团上校团长姚俊明（陕西人，西北讲武堂毕业）、第八十七团上校团长李培芹（山东人，黄埔军校毕业）、辎重团上校团长傅中枢（江苏吴县人，黄埔十期）等。营、连级军官也都有学历，排级军官中军校毕业生约占 $\frac{1}{3}$ 。除军佐外，全军行伍出身的军官已为数极少。

1944年3月初，我们从军令部和集团军总司令部发来的情报中得知，日军已修复黄河铁桥，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大量兵力，加紧准备进犯中原地区，企图打通平汉线南段。战前，本军情报部门获悉，当面之敌是日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一一〇师团、坦克第三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以及骑兵第四旅团等部，约15万人。

4月初，第二十八集团军调整部署，命暂编第十五军暂编第二十七师担任中牟境内的新黄河河防；新编第二十九师守卫许昌。当时，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滹沱张村；所属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防守新河南岸第一线阵地；第八十一团作为预备队驻师部附近。该师武器装备差，新兵多，战斗力不强。新编第二十九师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其主力驻许昌，第八十六团驻新郑、和尚桥等地。

暂编第十五军军部驻新郑西南二公里的大高庄，军直属部队驻城西二公里半的杨庄。军长刘昌义住在城内的一所大房子里，跟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中尉侍从副官焦田来（新郑县陵岗村人）和8名卫士。我就住在军长住所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作为军长的侍从参谋，我必须时刻不离军长左右，以便完成军长交给的任务。

暂编第十五军左、右两翼的友邻部队分别是第八十五军和泛东挺进军。第八十五军以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和预备第十一师（师长赵琳）担任郑州、广武一线河防和对邙山头日军桥头堡的监围，第二十三师（师长张文心）守卫密县。泛东挺进军负责守卫中牟以东尉氏、扶沟等地的河防，并策应郑州、中牟、许昌等地的战斗。

刘军长督师上火线

1944年4月18日凌晨2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门外传来侍从副官焦田来的声音：“陈参谋，快起来吧！刚才参谋长给军长打来电话，说暂编第二十七师在中牟与日军接上火了，叫你快点去。”焦田来说完便跑回去了。我意识到情况紧急，匆忙穿好衣服，跑步来到军长的屋内。

刘军长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抽烟。停了一会儿，他说：“刚才接到参谋长的电话，今天零点暂编第二十七师在中牟与日军接火了。集团军总司令部来电，命我们火速驰赴中牟迎敌。你快

去整理一下应用的东西，我们马上出发上前线。”我说：“报告军座，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只有你和我吗？军部是否也一同前往？”军长说：“军部在大高庄不动，副军长和参谋长也都不去，就是你跟我去。我们带着特务连，军官队也让他们跟着去。”我说：“军座，特务连是必须要带的，可是军官队多数是军佐，有些是戴眼镜的书呆子，在战场上没有什么用处。是否就近从驻新郑的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调一个营随同前去，军官队就不用带了。”军长说：“也好，我写手谕，你拿去找姚团长，让他派一个营来。不过军官队还是要带，让他们当传令兵也行，怎么说没用呢？你赶快去办，命令他们天亮时在东门外集合，别耽误时间。”

我领命后，首先前往第八十六团，向姚俊明团长传达了军长的命令，接着又赶到大高庄军部，从译电室和参二科分别取出所需的密码本和军用地图。当我回到住所时，天已拂晓。我将各种应用之物、枪支弹药收拾停当，才去向夫人孟梅告别。孟梅听了我的告别话，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后来她在随军部转移至遂平嵖岈山时，被日军野炮击中身亡，年仅 22 岁。

我告别了孟梅，急忙来到军长住处。我们刚走出大门，就遇上了日军飞机的空袭。卫士们举着捷克式七九步枪不停地对空射击，我和刘军长、焦田来急忙翻身上马，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扫射，朝东门外奔去。此时，军部特务连（上尉连长张广勤）、军官队（中校队长赵洪超）和第八十六团第二营（营长胡光耀）已集合完毕。刘军长到后，作了简短的训话，交待了出发的目的，命令各队以急行军速度前进，并许以先到中牟滹沱张村者有奖。

一路上，我们一行十余人策马疾驰，恨不得一下子赶到前线，中午 12 时许，到了新郑县城东北约 40 华里的薛店镇。焦田来问军长是否在此稍事休息，吃些饭再走。军长说，要争取时间，到滹沱张村再吃饭。

离开薛店不远，我们遇上了暂编第二十七师运送病号、军官家属和行李向后方转移的 30 余辆大车，其中有师长萧劲的夫人和

一名副官。刘军长对那位副官说：“你们一路上要严守纪律，不得扰民，否则枪毙。”说罢，我们继续赶路。

激战中牟

18日下午3时许，我们到达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地滹沱张村。军官队、特务连以及第八十六团第二营，于日暮前也先后到达。在师部里，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萧劲向军长刘昌义汇报了该师当日的战斗情况。

18日零时前后，日军利用原已占领的中牟县城作为掩护，分兵两路由县城以东的邢庄、荣庄、傅庄和以西的三王等处渡过新黄河，向暂编第二十七师阵地发起进攻，并不断扩大渡河面，使后续部队加快渡河速度。我军当即奋勇抵抗，因武器很差，只得以投掷手榴弹为主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战斗。激战至天明，小李庄、小辛庄、桃村李、大潘庄、洞上等第一线阵地相继被突破。此后，我军利用房屋、沟渠、树林为掩护，先后在姚家、刘巧、念罗、坡刘等村庄节节抵抗。目前正与日军相峙于树头村及其以东的沙丘地带。萧劲还说，暂编第二十七师凭借黄河天险和阵地工事都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此刻在没有工事的开阔地上，要将日军驱逐回黄河北岸就更难了。军长听着萧劲的汇报，不时紧锁双眉，脸上流露出不满的表情。他认为，在此战况激烈、战局恶化的危急关头，身为师长的萧劲应当亲临火线指挥作战，而不应当仍旧坐守师部。

晚9时许，我陪军长与萧师长在一间茅草屋里共进晚餐，并讨论反攻计划。吃饭间，日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时在离师部不远的地方爆炸，并有人进来报告部队不断后撤，日军已逼近师部。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刘军长虽已是一天粒米未进，但此时却举箸而难以入口。暂编第二十七师三个团早已投入战斗，师部已无预备队可派。刘军长命令萧师长立即上火线督战，组织部队反

攻，并对我说：“咱们把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都带上去，非把日军赶回黄河以北不可。”

4月19日2时许，我奉命集合队伍随军长出发。我们越过砚台寺，向北搜索前进。当胡营先头连进至黑牛张村边时，被村内的日军发觉，当即展开了战斗，刘军长命胡营的另外两个连迅速迂回到村庄的东、西两侧，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又令特务连、军官队紧随先头连从正面强攻，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军官兵冒着密集枪弹冲进村内，日军遗尸数十具向北败退。战斗中，我方亦伤亡50余人。与此同时，暂编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和第七十九团也分别攻占了坡刘和彦张村。此时天已微明，我军乘胜追击，克服了大汾店、罗宋、大庄等据点，中午前已推进至刘巧附近。当时我军如果有后续部队，是能够把日军赶过黄河的。

中午时分，赶来增援的日军步、骑兵千余人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我军右后方发起围攻。官兵们轻装上阵，激战竟日，午餐无着，饥困交加，已是精疲力竭了，且无后续部队增援，只得逐次后撤。我们作战的地区是沙土地，难以构筑工事，而且地势平坦。我军就利用房屋、断壁、沟渠、树林、麦地阻击日军，以手榴弹、迫击炮予以杀伤。

下午，我军撤至祥符刘、树头村、单家、滹沱张一线顽强阻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自开战以来，暂编第二十七师的伤亡人数已达两千左右，刘军长的卫士张明和四名军官队队员也都阵亡了。当晚，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移驻八岗，部队也收缩在八岗周围地区继续阻击日军。

刘军长带领胡营、特务连和军官队来到八岗，独自躺在师部的一间草屋里闷闷不乐，我和焦田来站在一旁一再安慰他，劝他吃饭、休息。对于刘昌义此时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战斗紧张之际，刘军长曾直接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右翼的刘耀军第七十九团作战，使得师长萧劲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乱了指挥系统，因

此二人之间产生了矛盾。特别是一天来的战斗由胜转败，部队伤亡严重，更使刘军长焦虑不安。

4月20日，我军击退了日军的几次小规模进攻，战况相对平静。泛东挺进军张清秀旅奉命由八岗东南的黄店附近攻击日军侧翼，以策应暂编第二十七师作战，但遭到了日军的猛烈反击，被迫撤退。当晚，我们收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电报，命刘军长率部在中牟继续阻击日军的进攻。

4月21日清晨，日军集中火炮和重机枪，猛烈轰击和扫射八岗村，外围阵地前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师长萧劲要求撤退，而刘军长则命令他拼死坚守，因而暂编第二十七师又坚持了一天。

日落后，八岗以北一公里的绪张村被日军攻占，师部的北面已失去了屏障。刘军长命令萧劲火速派兵夺回绪张，而萧师长则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了，并再次提出撤退的意见。二人各持己见，最后刘军长说：“坚持战斗，死不后退。”萧劲不答话，出门而去。刘军长对我说：“萧师长不服从命令，我也奈何不了他，现在只好由咱们来计议退敌之策了。”

当时，我们虽然无法搜集情报，不了解整个战局，但从日军两天来一直未对八岗发起大规模强攻这一点判断，就可知其主力业已绕过我军西进，此刻郑州、新郑很可能已沦入敌手。我们虽是被困敌后孤军作战，然而只要能守住八岗一带，就可以牵制住一部分日军，为友军减轻一些压力，况且汤恩伯也命令我们在此阻敌，所以不能撤。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驱逐绪张村的日军，以解除其对八岗正面的威胁。但此时刘军长对暂编第二十七师指挥无效，只好带领自己的随身部队出击。

当晚8时许，刘军长在没有通知萧师长的情况下，就带领特务连、军官队离开师部，径往八岗以西的胡营阵地。我们与胡营会合后，即向右迂回到绪张村以西约800米的一片杂树林里。经过几天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胡营和配属的迫击炮排仅剩400余

人，特务连和军官队尚有 130 余人，总共加起来也只有 500 多人了。刘军长以胡营为冲锋队，特务连和军官队编为援队，将迫击炮阵地设在杂树林内，要与日军决一死战。我建议将冲锋队分为两队，一队由我带领从西街口冲入；另一队由胡营长带领绕至绪张以北接近村缘冲入；军官队由赵队长带领，从村南侧佯攻；军长带特务连为援队。刘军长同意我的意见，但坚持要亲自带队冲锋，同时命令军官队要先于冲锋队发起进攻，以使日军误认为是暂编第二十七师部队出击，从而分散其注意力。最后，军长命令我带领特务连为援队，观察周围的情况，在冲锋队前进时指挥迫击炮排向绪张村内的日军射击，然后带领特务连跟上去，待冲锋队摸进村内，手榴弹一响，立即吹起冲锋号。

晚 9 时 30 分，刘军长和胡营长各率领一支冲锋队出发，我即命令迫击炮排开炮。刚打出五发炮弹，我还在观察弹着点时，射击忽然停止了。我急忙提着手枪奔至炮位查看，方知炮弹已全部用尽。我只得命令留下一个班看守三门迫击炮，其余两个班归属特务连，随军长所带的冲锋队之后迅速跟进。

侵入绪张的日军，约是一个前哨中队，此时正在假眠，以待拂晓出击。日军原以为暂编第二十七师已丧失战斗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向村南部聚集，盲目射击。当刘军长和胡营长率领的冲锋队自村北和村西冲入绪张，出现在日军的后背和右翼时，日军才发觉，但还未来得及调转枪口，冲锋队投出的手榴弹就如同冰雹一般落入敌群。我立即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并带领援队冲进村内，和冲锋队一道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打出了几颗信号弹，但为时已晚，这 100 多名日军在我军的手榴弹和刺刀之下毙命，我军夺回了绪张村。

夜 10 时 30 分，我发现绪张以北和八岗的西北方、东方都升起了日军的信号弹，而且由远而近，就立即报告了军长。此时八岗方面已无枪声，暂编第二十七师的情况也不得而知。如果日军攻占了八岗，我军的退路就会被截断，于是刘军长下令速回八岗。

昼夜薛店

部队撤离绪张，经原路返回，行至八岗西街口时，发现暂编第二十七师在此设置的警戒部队已经撤离。刘军长留下几名士兵担任警戒，急忙来到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部驻地，见里面已空无一人，始知萧劲已带领部队撤离了。但刘军长仍希望能找到暂编第二十七师，就命特务连沿街向东寻找。特务连刚走到东街口，就与冲入村内的日军遭遇，双方展开巷战。与此同时，留在西街口的数名警戒也跑来报告，说从西北方向进攻的日军已接近西街口。此时我军已是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刘军长急令部队经南街突围。在南街出口处，部队被暂编第二十七师设置的鹿砦所阻挡。我军只得一面阻击从东、西两面冲入村庄的日军，一面加紧拆除鹿砦。仗打得很惨，由于我军是几百人拥挤在一条狭小的街道上作战，部队既无法展开，又无工事可作依托，所以伤亡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将街口的鹿砦扒开了一个约一米宽的豁口。当我军由此撤往村外时，日军集中火力封锁豁口，又有不少弟兄伤亡，重伤员们也因无法救出而惨遭日军杀戮。

4月22日零时左右，部队撤离了八岗。刘昌义虽曾估计到新郑已被日军占领，但还是希望能与军部会合，以便重整旗鼓再战。他命令胡光耀率第二营快速返回新郑寻找军部，自己带领特务连和军官队随后跟进。

黎明时分，部队从东门进入了薛店。此时的薛店较之四天前我们经过时已是面目全非，一片凄凉。镇内镇外看不到一个行人，绝大多数老百姓为躲避战火已远走他乡，少数未来得及逃走的全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所有的院门、屋门都被推倒或砸坏，粮食、财物和家禽家畜被洗劫一空。我随刘军长走进一座小院，看见一位老汉倒在血泊中，屋内的床上躺着一具披头散发的裸体女尸。我们又来到大街上，见路当中有几十堆麦秸，周围布满了洋

马蹄印和许多炮车留下的车辙。

此时天已大亮，为了避免白昼行军可能造成的无谓牺牲，军长刘昌义决定就地宿营，待天黑后再行动，于是部队就在丁字街北口中药铺门外的大槐树下休息了。刘军长命令特务连在镇的四门设置了望哨。上午9时和下午3时许，我们发现先后有两股日军共约数千人，分别沿着薛店以北2000米外的大道由东向西行进，很可能是去进攻密县。

当天中午时分，特务连张连长送来了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孩，这是我们数日来在战场见到的唯一活着的老百姓。但其面容、神情、言谈、衣着不像讨食的乞丐，形迹有些可疑，有些像我们曾抓到过的日军奸细。在一时无法弄清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为了不冤枉好人，同时又预防万一，我们决定将这个小孩暂交特务连看管，给吃给喝不许虐待，到我军离开薛店时再放他走。

这一天好像过得特别慢，大家都急切盼望天早点黑。军长刘昌义因暂编第二十七师去向不明和急于离开薛店而忧心忡忡。我往返奔波于薛店镇四门之间观察敌情，考虑当晚部队的行进路线。

花园村附近遭遇战

4月22日日暮后，我们一行百余人来到南门两侧。我登上寨墙向外观察，见无异常情况，即命特务连出发，向南略偏东方向搜索前进。行进中，我们避开道路和村庄，并将队形疏散开，随时准备战斗。

夜10时许，我们在新郑县城东北约20华里的一个村庄里与暂编第二十七师会合了。此时我们才得知，昨夜刘军长带队攻击绪张时，萧劲即命全师撤离八岗，于今日拂晓到达此地。因新郑城内和城东均有日军，不能通过，故在该村内隐蔽。不久，胡光耀营也来到这里。

夜11时许，据情报人员报告说，新郑城内的日军兵力较大，

城东南约 20 华里的花园村有一个大队，花园以东各村也都驻有日军，只是新郑县城与花园村之间尚未发现敌踪。于是军长刘昌义和师长萧劲商定：部队从新郑以东 8 华里处通过日军的占领地带，以刘耀军第七十九团为前卫，刘军长带领特务连和胡光耀营紧随其后，萧师长位于本队。我非常清楚军长不在本队而跟在前卫团之后，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能抓住他的老部下刘耀军的第七十九团作战。该团在中牟战场上伤亡很大，现在仅剩 600 多人了。

4月 23 日零时，部队按原定的顺序和进行路线出发了。当前卫团接近花园村西南的一个村庄北缘，我和军长刚走上村北 50 米的石桥时，突然遭到村内日军的猛烈射击。我们急忙跳到桥下的干河沟里，前卫团也被迫退至此处。刘军长立即命令暂编第二十七师速派一个团监视新郑的日军，再派一个营牵制花园村之敌；胡光耀营经该村西侧绕至村南拊敌后背；第七十九团以一个营迂回至村东，另两个营待胡营打响后立即从正面发起攻击。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了村内约一个中队的日军，并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 100 余枝。

战斗结束不久，花园村方面的枪声也逐渐停息，估计是暂编第二十七师的那个营已奉萧劲之命撤离了。刘军长立即带领刘耀军团和胡光耀营从南街口出村，向左迂回，攻击花园村之敌。由于该处敌人兵力较强，激战至拂晓，我军仍未能攻入村内。此时，驻新郑的日军即将出动，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刘军长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以胡营为前队，刘团为后队，向许昌方向转进。

和尚桥突圍

4月 23 日上午，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空袭，部队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直至下午 3 时许才到达长葛县和尚桥村。此地位于长葛县城以西，许昌以北。一条长约 500 米的南北土路是村内的主要道路，紧靠村东侧的平汉铁路此时已拆除，东面是大片的麦田。

清潩河自北向南，在村西约 1500 米处转向东南穿村而过，一座长约数 10 米的石桥连接着河两岸的大街。村南端地势骤然升高，两条深达二米的大沟与南街口相交，一条伸向东南，另一条伸向西南，分别是通往许昌和禹县的大道。两条沟之间是一块三角形的坟地，其顶端正对南街口处有一座五道庙。坟地居高临下，地形十分有利。这里虽是许昌以北的重要屏障，但在我们一行到达之前，却既无部队防守，也未构筑防御工事，仅在村边挖了一些立式或跪式的散兵坑。新编第二十九师第八十六团（欠第二营）驻守在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里，团部驻和尚桥东南约 1500 米处的一个村庄。

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连续激战和行军，官兵们已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和尚桥保公所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饭食，军长刘昌义决定在此宿营，翌日再去许昌。

饭后，刘军长用保公所的电话与驻许昌的吕公良师长通了话。这时，上校参议王宝斋（河南镇平人）和王海东（河南修武人，前第八十一团团长）便装自后方来见军长，要求去敌后组织抗日部队。经军长批准，我发给他俩每人十张盖过暂编第十五军关防的空白差假证和公函纸。后来听说，王海东在组织抗日队伍时被日军逮捕杀害。

下午 4 时，哨兵跑来报告，说在和尚桥以北 2000 米的一个村庄里有大队日军，正在向和尚桥进犯。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立即进入村边阵地，准备战斗。由于没有防御工事，部队只得利用村边的房屋和墙垣坚守。

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我军则因炮弹用尽而无法进行远距离拦阻射击，只能待其迫近时以轻武器进行近距离作战。日军的行进速度很快，下午 5 时 30 分即与我军接上了火，我第七十九团官兵沉着应战，以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然而该团以不足 600 人对付数千敌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均处劣势。当敌人第二次冲锋时，该团已无力支持，只得退入村内防守。

战斗打响后，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日军的动向。此时，我发现日军的后续部队正向我左翼运动，有经村西向南迂回，夺取村南高地，对我军进行前后夹击之企图。我急忙将此情况报告了军长。刘军长命令第七十九团继续阻击正面之敌，自己带领胡光耀营、特务连和军官队立即离开保公所，数名警察和保公所人员紧随其后，顺着街道向南跑去。在通过石桥时，几乎是与我们齐头并进的敌人，已自村西的河道用机枪向桥面射击，我军有几名士兵倒下。刘军长一面组织火力掩护，一面指挥部队低姿跑步前进，迅速通过石桥直奔村南口，终于抢先一步占领了村南的三角形高地。我军居高临下，立即与从村西绕过来的敌人展开了战斗，将敌人压迫在沟道内。

晚7时后，敌人接二连三地对高地发起冲锋，战斗更加激烈。五道庙的庙顶已被敌军的机枪掀掉，高地上的几棵小树也被打得光秃秃的。我军官兵英勇顽强，用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守卫和尚桥村的第七十九团与敌军逐房逐院地争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尚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周围，枪声、喊杀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守卫在那里的第八十六团（欠二营）也正在与敌军鏖战。

这时，我们发现和尚桥村东的大片麦田里无我军部队防守。为了防止敌军由此钻隙南窜，刘军长命令我迅速通知姚俊明团长，派一个连去填补空隙。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建议先派军官队越过沟道向北警戒，军长同意。于是我便带领仅剩20人的军官队，由高地东侧越过沟道，到达指定地点，然后独自一人提着手枪沿沟堤直奔东南。

在距和尚桥1500米处，我找到了姚团长，向他传达了军长的命令。姚团长听后十分为难，他领我来到团部，说：“你看，这里只剩下一个排的预备队了，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拉上去应急。”接着，我们又来到阵地上，这里正在进行着紧张激烈的战斗。当夜刮起东北风，黄沙扑面，我军阵地面向北方，对作战极为不利。

我跟姚团长在阵地上巡视了一遍，深感兵力已不敷使用，若强行抽出一个连，势必导致全线溃退，因而只得急速回去复命。

当我跑到距坟地 250 米处时，发现一人迎面而来，我立即隐蔽在麦田里，高喊：“口令！”对方说：“是我呀！”我一听是军长，连忙站起身来问：“你一个人到哪儿去，怎么连卫士都不带呀？”军长说：“卫士班都去拼刺刀了，我还带什么？你去了半天还不回来，我是来找你的。”我说：“小声点，路北的情况不明。”话还没说完，敌军就从路北约 50 米处的麦田里用机枪扫射过来，紧接着又是一阵步枪。我抓住军长的袖子往下一拽，弯腰低姿跑回坟地，钻进一个已经迁葬的墓穴里。此时，坟地西侧二营阵地前的敌军不断发起冲锋，东侧特务连阵地对面敌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我军已是腹背受敌。刘军长突然从墓穴里一跃而起，骂道：“他妈的，和鬼子拼了！”他脱下大衣扔到一边，又摘掉军帽甩出老远，端着枪要冲上去和敌军拼命。我急忙把他按倒在墓穴里，说：“军座，现在可不是拼命的时候，你还要去许昌指挥新编第二十九师作战呢！”

这时，日军已占领了和尚桥的北半部，我第七十九团经过激烈巷战，被迫撤至清潩河南岸，与村南高地上的二营和特务连阵地相衔接，利用南街两侧的房屋继续阻敌。24 日 1 时许，守卫在和尚桥以东麦田里的军官队队员已全部阵亡，第八十六团阵地上也已是一片沉寂。半小时后，和尚桥东南第八十六团团部方向经过一阵激战，枪声也逐渐稀疏了。不久，敌军的机枪由那里向我阵地后方打来，我军已处在敌军的东、西、北和东南四面包围之中。我军以七八百人的疲惫之师，孤军困守和尚桥一隅，既无力消灭或击退数倍于己之敌，更不可能长期坚守，若待天亮后敌军发起进攻，就会招致全军覆没的厄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刘军长决定 1 时 50 分突围。他让我派传令兵去通知刘耀军团长，又从第二营和特务连挑选了 20 名精壮士兵组成奋勇队担任掩护。

1 时 50 分，潜伏在原第八十六团团部驻地村边的奋勇队，准

时向村内的敌军投掷手榴弹，该处顿时枪声大作。我阵地东面的敌军调转枪口向东南盲目射击，西、北两面的敌军也都在注视着那里的突变。我军乘机迅速撤离了阵地。敌军虽已发觉，但因天黑看不清我军的动向而不敢贸然追击，只是在原地胡乱打枪。我军以北极星为准，先向南再向西南，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然后又转向东南，朝许昌方向转进。

壮别吕公良师长

4月24日晨7时许，部队到达许昌。刘昌义军长命第八十六团第二营归还建制，第七十九团在城防附近待命，自己带领特务连和卫士班从东门进入许昌城。这时，城内的机关和老百姓俱已疏散，新编第二十九师官兵们守卫在城防阵地上，准备迎击来犯的日军。我们一行来到设在东大街原商会院内的师部，吕公良师长率师部军官们出门迎接刘军长，并陪同军长共进早餐。饭后，刘军长在浴池里洗了澡，换上了吕师长派人送来的新军装，一周来艰苦征战的紧张和疲劳顿消大半。

在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部，我们了解到了开战一周来的战场形势。4月18日，日军自中牟渡河后，当天即兵分四路，一路与我暂编第十五军部队鏖战；一路向西北进犯郑州（20日攻占）；一路进犯东南，与我泛东挺进军部队交战，于21日攻占尉氏，22日又陷洧川；其主力向西南进犯新郑（22日攻占），并分出一股西犯密县。19日，盘踞河南岸邙山头桥头堡的日军主力，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发起攻击，突破我第八十五军的监围阵地，然后分为两路：一路沿陇海铁路西犯，21日陷汜水，因遭到我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的顽强阻击而无法前进；另一路向南进犯，20日陷广武，21日占荥阳，然后继续南犯，与由新郑西犯的日军会攻密县（23日攻占）。昨天，有两股日军自新郑南犯，其中西路的一股就是与我军在和尚桥交战之敌，东路的一股今晨占领了长葛县城。目前，

日军正在加紧准备进攻许昌，其前锋已进抵许昌以北的杜寨、苏桥、周寨、岗朱一线。虽然泛东挺进军曾于 20 日收复了太康，但在短短的一周内已有九座县城沦陷，其中八座属于我第二十八集团军的防区。

此时，许昌已成为我军在平汉线上最北端的阵地，也是我暂编第十五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否能守得住，对于下一步战局的发展至关重要。战前，蒋介石曾电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应以两个师的兵力固守许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曾将许昌附近定为以主力与日军决战地区之一。像许昌这样的旧式城垣，四周地势平坦，无险可凭，属易攻难守之地，然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仅以新编第二十九师一个师的兵力守卫，如此部署实令人忧虑。

此时刘军长、吕师长已下定决心，誓与许昌共存亡。我们在许昌的几天里，刘军长一直忙于同吕师长等人研究守城方略，指挥加固城防工事，还多次亲临阵地视察，召集官兵们讲话，激励部队士气。

4月 25 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奉汤恩伯之命，令所属各部对日军发起反攻。26 日拂晓，新编第四十二师一部袭击了和尚桥，与日军激战两小时，同时，该师另一部还破坏了新郑附近的日军通讯设备，泛东挺进军克复了尉氏县城和部分据点。此次反攻由于参战部队兵力少，装备差，虽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4月 28 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刘军长指挥新编第二十九师固守许昌，同时指挥彭责良新编第四十二师守卫许昌以西各据点，阻止日军南犯。29 日，各路日军麇集于长葛南部、许昌北部地区，做好了进攻许昌的准备。下午 2 时，集团军总司令部来电，命新编第二十九师死守许昌，并令刘军长指挥第二十师和新编第四十二师于次日黄昏前展开了襄城的化行、颍桥和禹县的前陈一线，向许昌的七里店和禹县的马沟一线攻击前进，协同马励武第二十九

军和泛东挺进军围歼许昌外围的日军，限各部队于 30 日下午 3 时开始行动。此时，新编第二十九师官兵已进入临战状态，师部内更是紧张繁忙。我一面派人通知第七十九团和特务连、卫士班准备出发，一面忙着收拾行装。刘军长实在舍不得在大战前夕离开自己的部队，但上命难违，他只得再三叮嘱吕师长一定要不负使命，奋力死守许昌。临别时，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道珍重。没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两天后，吕公良师长就为保卫这座古城而在突围途中殉国，年仅 41 岁。

误走灵井镇

4月29日下午5时许，刘昌义带领着不到600人的队伍离开了许昌。当夜天很黑，又没有向导，我们迷失了方向。当夜11时后，我们进入一个镇子，部队停在街心，军长派人挨户去找向导。但老百姓都已弃家远逃，连个犬吠声也没听到。后来我走进一个院子，见屋内有几张办公桌，就急忙上前打开抽屉想寻找点线索，但里面空无一物。当我走出屋门时，发现院子的墙角处竖着一块木板，翻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灵井镇公所”。原来我们离开许昌后不是向西南直奔颍桥，而是转来转去误入了西北的灵井镇，险些走进日军的占领区。

灵井镇位于许昌城西北 26 华里处，是许昌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昨天，集团军总司令部还电令刘军长指挥新编第四十二师扼守许昌以西各据点，但未能与该师取得联络，所以也无从了解这一带的情况，直到现在才发现这里竟然没有守军。而我们离开许昌后一路上也没碰到一兵一卒，联想到中原会战十多天来的亲见亲闻，不能不使我对于上峰的战略思想是否正确，兵力部署是否得当，掌握部队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同时也深为困守孤城许昌的新编第二十九师担心。我们在灵井没有守备任务，即于 4 月 30 日凌晨 1 时许离开。由于正南方有敌情，我们只得先向东南走数

华里，然后再转向西南。行进中，我们遇到了新编第四十二师补充团。该团团长魏骏明说他们是许昌外围的游动部队，我则将灵并无部队防守的情况告诉了他。自开战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友军部队，自然感到欣慰。

4月30日晨6时许，刘军长命刘耀军率仅剩500人左右的第七十九团先去颍桥，自己则带领特务连、卫士班慢行。走了不远，我们发现前方路西边约300米处有一个小寨，寨墙由于年久失修，已有多处倒塌，周围长着二尺多高的麦子，没有树木。从缺口望去，里边有几户人家。刘军长想让部队在这里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走。我立即从图囊里抽出几张军用地图，查出此地名叫红土寨。由于有些人当时还有迷信思想，认为打仗时进入红土寨不吉利，军长又决定到颍桥以北五华里的古城寨打尖。

7时后，部队到达古城寨。寨墙有几处坍塌，墙外杂草丛生，寨内有20几户人家。部队在寨子里休息，副官和卫士们忙着做饭，刘军长和我躺在一所高房子门外的台阶上闭目养神。忽然，颍桥西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经久不止。刘军长对我说：“这可能是刘耀军团与日军遭遇了，听枪声距此不过七八里路。”我说：“有可能，因为刘耀军团走的是那条路，不过现在还无法证实，即使刘耀军派传令兵出来也找不到军长。”刘军长坐起来，又说：“你马上给吕公良师长写封信，告诉他我现在的位置，命令他与许昌共存亡。”我想找张桌子写信，便走进寨墙边的一所小瓦房，里面虽有一张方桌，却无凳子，于是我只得趴在桌上写信。写完信，盖上刘军长的印章，交给了传令兵，让他送到许昌面交吕公良师长。传令兵刚走，突然一声巨响，山墙倒塌，屋瓦坠落，我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是日军打来的第一发炮弹，紧接着又打来十几发。我登上寨墙了望，看到东北方有大批日军正向古城寨开进。我和军长分析了当面的敌情，判断出这股来自泉店、灵井的日军是为了夺取许（昌）南（阳）公路上的重要据点颍桥，阻止我军增援许昌并截断新编第二十九师的退路，以配合其主力

对许昌的攻击。于是刘军长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古城寨，以急行军速度向颍桥镇开进。

颍桥守卫战

4月30日上午9时许，刘昌义军长率部经关店跨过许南公路上的颍河石桥，来到颍桥镇北门外。守卫颍桥的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第五十八团（团长王书鼎）是28日由叶县开来的，此时已作好了战斗准备。进入临战状态。经刘军长派焦副官与北门守军联系，守军开了寨门，王书鼎团长出门迎接并陪同军长到团部休息。

颍桥镇位于襄城东北30华里、许昌西南40多华里处，春秋时是郑国颍邑；秦汉时为颍阳县治；晋以后成为襄城的一个集镇。许南公路穿镇而过，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冲，且与许昌互为犄角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镇为长方形，南北长4华里半，东西宽约2华里。寨内地势高于寨外，四周有五至八米高的寨墙，墙很厚，上面有用装满土的麻袋堆成的射击孔。寨墙外约五米处有深2米宽3米的壕沟，寨四周树木茂密，有利于我军的防守和隐蔽。颍河自北向南流经镇东北角处急转向东，行约2华里后又转向东南。河宽约20米到60米不等，水面宽约10至20米，水深60厘米左右，流速虽不高，但河两岸都是数米高的悬崖，故涉渡和上下攀登均为不易，从而为颍桥镇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刘军长刚到第五十八团团部，第七十九团的一名军士就跑来报告，说该团在颍桥镇以北的余张村阻击日军渡河时，全团都完了，团长刘耀军阵亡，活着回来的只有几十个人。全团覆没，又失爱将，使刘军长十分伤心。这时，汤恩伯打来电话，命令部队停止出击。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和让部队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错误指挥，使我们深感意外和不满，却又无力违抗。为了尽到军人守土抗战的职责，刘军长当即请求留在颍桥再和日军拼一

下，汤恩伯表示同意，并令刘军长督率第五十八团固守颍桥。

上午 10 时，日军从东北方向对颍桥镇和颍河沿岸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我军以迫击炮猛烈还击。一小时后，日军炮兵部队赶来增援，掩护步兵于中午 12 时后攻占了我军设在颍河对岸的前进阵地关店。此后，日军将大炮和重机枪架在关店，与我军隔河激战。

军长和我分析了当时的战况，认为日军从正面久攻不克，势必绕至颍桥以北或东南方渡河，对我军实行迂回包围，两面夹击；我军虽凭险扼守，顽强抵抗，但兵力和武器装备均远逊于敌，一旦受到日军的包围，颍桥镇就难以固守。于是，刘军长派人将坐骑送至位于颍河西岸、颍桥以东 3 华里处的大马庄，再随敌情变化向南转移；同时命我带领特务连的一个排去寨外侦察地形和敌情。我立即让郭贤德排长集合队伍出发。由于寨门已用装土的麻袋堵死，我们从东寨墙上缒寨而下，越过外壕径直向东到达颍河西岸，然后顺着河岸向东南方向搜索前进，沿途未见防御工事，也未发现对岸有敌情。行至大马庄以南，我们即折转向西，经颍桥东南 300 米的菅庄，于下午 2 时许到达南寨门外。当我向正西方向了望时，发现有大部队从 3000 米外的后庾河村南街口向东运动，其前锋已在麦地里展开。我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他们头戴钢盔，身着黄军装，确系日军无疑。日军行进速度很快，直扑颍桥而来，我命令郭排长带队伍立即返回寨内。有人对我说：“日军已经包围过来了，还进寨干啥？”我严肃地说：“明知是死，也得进寨，决不能把军长丢在里边我们溜掉。”于是我们来到南寨门东侧的一个缺口处，由寨墙上的士兵将我们一个一个地拉了进去。

下午 2 时后，我回到了寨内。日军的炮火已开始向镇内射击，炮弹接二连三地落在屋顶、院内和街心。我军官兵们都上了寨墙，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向寨西的日军猛烈射击。我们来到第五十八团团部，只见房屋已被炸塌了大半。经询问，方知团部已转移到了东寨墙内 100 米处麦田里的地下掩蔽部。我即命郭排长带队回特务连，独自一人向掩蔽部奔去。当我刚下到第三级台阶，突然

一颗炮弹在洞口的一侧爆炸，掀起的土块劈头盖顶落了下来，砸得我一头栽进了地下室。我强忍疼痛站起身来，向刘军长报告了在寨外侦察到的情况。刘军长听后，立即要通电话，向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汇报了当面的敌情，请求火速派兵增援。李仙洲说，已命令第二十师师长赵桂森率该师主力由襄城来援，日暮前即可到达颍桥。刘军长放下电话，已是下午 3 时许。在此之前，日军已推进到了颍桥东南角，与我军展开激战。

下午 6 时许，进攻颍桥西面的另一股日军已接近到冲锋距离，随即对 2000 多米长的西寨墙发起了全面攻击。日军以西门两侧作为进攻的重点，企图从颍桥镇中部实行拦腰突破。守卫西寨墙的我军官兵沉着应战。就在日军刚接近寨墙，尚未未来得及爬寨时，随着一声令下，数百枚手榴弹顿时在敌群中开了花。冲在前面的敌军被炸得血肉横飞，后面的急忙调头往回跑，一直退到 500 米以外才停住脚步，开始构筑简易工事。当日军的第二次冲锋又被打退后，便暂时停止了步兵的进攻，改用密集的炮火轰击西寨墙。我军官兵不怕牺牲，冒着滚滚的硝烟和横飞的弹片，随时用土麻袋填堵被炸塌的寨墙。

下午 6 时 20 分，进攻颍桥东南角的一股日军占领了营庄。天黑后，颍河东岸的日军强渡成功，马庄遂沦入敌手。此时，颍桥镇已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密集的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我第五十八团官兵虽伤亡严重，弹药即将告罄，但仍坚守阵地，用大刀、刺刀、枪托、锄头、钉钯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冲锋爬寨的日军。夜 10 时 30 分左右，颍桥的东南角首先被突破，我暂编第十五军特务连当即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此后，西、北、南三面寨墙均有多处被日军突破。起初我军尚能集中火力封锁豁口，配合白刃战将突入的日军消灭或赶出寨去。但随着突破口的增加，冲入的日军越来越多，我军只得放弃原阵地，利用房屋、院墙和街垒与日军进行巷战。

激战至 5 月 1 日零时许，蜂拥而入的日军已占领了大半个颍

桥镇，我军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这时，刘军长、王团长和我都在东南角督战。面对战斗节节失利，援军迟迟不至，颍桥失守已成定局的严酷局面，三人相对无言，沉默良久。还是王团长先开口说：“军长，颍桥已被日军占领了，我们现在没有弹药，无力把敌人赶出去，你看怎么办？”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第五十八团由寨西、暂编第十五军特务连保护刘军长由寨东立即突围。

由于东寨墙很高，墙外地势又低，我就命令特务连士兵抱来几百捆秫秸，扔到墙外垫高地面，以防往下跳时摔伤。这时，从东南角进寨的一股日军已冲到距刘军长 100 米处，特务连且战且退，实在无力招架了，刘军长只得下令越墙出寨。

按照预先选定的突围路线，我们出寨后先向东，直奔颍河西岸，然后再转向西南去襄城。在行进到大马庄以南的麦田里时，许多人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十具老百姓的尸体，他们显然是在此躲避战火而被攻占大马庄的那股日军残杀的。目睹如此惨状，官兵们个个义愤填膺。

凌晨 2 时许，我们已走出大约 10 华里，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突然，特务连先头与对面的一支部队接上了火，后面的人立即散开卧倒，准备战斗。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对方讲的是中国话。为了弄清楚对方是敌还是友，刘军长当即命令副官焦田来上前询问，方知是奉命增援颍桥的第二十师部队。在该师前哨连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设在颍桥东南约 6 华里郝庄村内的第二十师师部。刘军长向赵桂森师长介绍了该师第五十八团在守卫颍桥战斗中奋勇杀敌及被迫突围的情况。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赵师长于 30 日下午 3 时奉命率该师主力由襄城向颍桥东南前进，与寨内的第五十八团协力合歼颍桥外围之敌，然后即向东侧击进攻许昌的日军。但由于他们行动迟缓，到达郝庄后又逡巡不前，从而贻误了战机。

刘军长受嘉奖

5月1日清晨，刘军长骑着从第二十师师部借来的一匹黑马，带着只剩下50多人的特务连和卫士班，离开郝庄，前往襄城。一路上我们多次遭到敌机的空袭，刘军长所骑的马也因此而受惊脱缰。下午3时后，我们来到县城北门外数百米处，守军第十二军（军长贺粹之）第二十二师（师长谭乃大）第六十四团警戒部队误认为是日军前来攻城，因而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急忙卧倒隐蔽并向对方高声喊话，他们也发现我们不是敌军而是友军，便停止射击，但说没有团长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入城。此时，我们50多人已是困饿交加，精疲力尽了，只得躺在北关街道上休息，等候开城门。

下午4时，第六十四团团长来到城上，令士兵打开城门，将我们接进城内。那匹受惊跑掉的黑马也被该团士兵截获，送还了刘军长。当晚，我们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说是奉汤恩伯之命，令刘军长进驻叶县汝坟桥村，指挥暂编第二十七师、新编第四十二师（该两师均因受重创而于数日前到此整补）及工兵第九团（团长蒋桂楷），担任叶县警备任务。

5月2时下午，我们在去汝坟桥途中经过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申楼时，刘军长又奉命改赴舞阳，指挥第七十八军（军长赖汝雄）新编第四十四师（师长姚秉勋）及南阳地方武装挺进纵队（司令别光汉）。同时，我们也得知了许昌已于5月1日陷落，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及团长杨尚武、李培芹，营长胡光耀、何景明等许多官兵阵亡的消息。

5月3日，我们在叶县南部的旧县镇与从新郑辗转到此的暂编第十五军军部会合了。下午，刘军长率军部前往舞阳，我因患病被送往地处后方的镇平治疗休养。我虽暂时离开了部队，但每日里总是惦念着他们，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消息。据我所知，在

5月中旬至6月上旬的鲁山作战中，刘军长曾奉命指挥新编第四十四师和由许昌突围出来的新编第二十九师余部继续与日军激战，后来又在南召县境内收容整理暂编第二十七师和新编第二十九师部队。在此期间，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调新编第一师师长刘汉兴接任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又以萧劲“人地不宜”，将其调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派该部副参谋长苟吉堂代理暂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中原会战结束后，蒋介石颁给刘昌义三等云麾勋章一枚，及蒋本人的半身铜像一尊；并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查报吕公良遗属的抚恤情况，指示先发给特别抚恤金20万元。

鲁西豫东抗战中的第三十二军

齐国楷 陈锐霆 张尊光*

1938年2月，商震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和第三十二军驻开封以南朱仙镇地区。2月15日，第三十二军奉命担任黄河防务^①。军部即由朱仙镇移驻开封宋门外齐鲁花园。18日商震军长训话，说明防守黄河之重要意义，并说明韩复榘丢山东的后果。

当时第二十集团军仍属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归其指挥的有以下部队：

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藩；

长芦税警旅旅长蒋纪珂；

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辖第一三九师师长黄光华，第一四一师师长宋肯堂，第一四二师师长吕济；

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王劲哉^②；

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③。

* 作者齐国楷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炮兵团代理团长，陈锐霆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炮兵团第三营营长，张尊光当时系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第四旅第七二三团第二营营长。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兰中、东考两区河防及菏泽、开封等役战斗详报》(以下简称“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当时该部奉命守卫兰中区(兰封至中牟)河防。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当时商震指挥的部队除以上外，还有第九十一师，骑兵第十四旅和两个炮兵营。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当时商震指挥的部队没有新编第八师。

二十集团军为了阻击敌人渡过黄河，特作以下部署①：第二十三师在郓城、菏泽以北黄河南岸沿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菏泽以北之董口归该师防守②；

第一四一师在董口至兰封黄河南岸沿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

第一四二师在兰封以北三义寨（含）至开封以北沿黄河南岸地区占领防御阵地；

新编第三十五师在开封、中牟以北沿黄河南岸地区占领防御阵地③；

新编第八师在中牟、郑州以北沿黄河南岸地区占领防御阵地④；

第一三九师为预备队，位于朱仙镇地区，3月29日奉命调归第五战区指挥。长芦税警旅为预备队，位于菏泽东北地区；

集团军总部在开封宋门外齐鲁花园。

各师进入防区后，立即构筑工事，积极侦察当面敌情；并加紧整补、训练，准备作战。

2月至6月是黄河枯水季节，水面较窄，水深较浅，流速缓慢，渡河比较容易。两岸沙滩宽，防御工事构筑困难。

第二十集团军在黄河防御战线很长，约500华里。兵力分散薄弱，防守黄河第一线兵力用了五个师。第二线预备队用了一个师和一个旅。3月下旬第一三九师调到徐州台儿庄一带作战后，预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该部于四月十七日奉命接替东考区（东明至考城）黄河河防，原兰中区河防交第三十九军接替。以下部署不知根据何在。同时，商震部从未在同一时期守卫过如此宽广之河防。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二十三师于4月23日后归商震指挥。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3月24日，新编第三十五师奉程潜之命调往郑汜区（郑州至汜水）。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该部守卫东考区河防时也未指挥过新编第八师。

备队就剩下了一个税警旅了。形成分兵把口，处处薄弱，作战指挥，通信联络均不便的局面。

2月至4月，第二十集团军在黄河防线没有什么战斗。新编第八师在郑州黄河北岸建立桥头阵地和撤退以及炸毁黄河铁桥都是由第一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的。因为长官部驻在郑州市内，连以后的花园口决堤计划和实施，也都是长官部直接办理的。4月，第二十集团军总部派第一四一师第七二一团到黄河北岸地区打游击，并侦察敌情^①。

4月，敌人修改了进攻徐州计划，加强了进攻徐州的兵力。敌第十六师团增加到济宁、安居、嘉祥方面。新乡方面之敌第十四师团，开始向东明、濮阳方向侦察活动。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为了适应战事的发展，便于指挥防止敌人从东明以东地区强渡黄河，故于5月1日由开封移驻考城东南的何庄。此时前敌总司令薛岳已率第八军、第六十四军和第七十四军进驻归德一带支援徐州作战^②。

（一）菏泽战役

5月10日上午，第一四一师第四旅第七一五团第一营赵营长，将在长垣至濮阳路上俘获的日本士兵一名、洋马四匹和军用品送交到总部。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第十四师团正向东明东北方面的黄河北岸运动。该营长是4月28日，奉命到黄河以北地区打游击的。这件事对我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商震总司令当即决定派参谋长傅立平率总部参谋处作战科长武泉远和必要人员到菏泽设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菏泽城里文庙内。必要人员中有少校副官康启华和译电员、电台人员、有线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七二一团于3月3日奉命渡河游击。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5月11日，第七十四军和第八军分别到达砀山、商丘，第六十四军正在向商丘输送途中。5月12日，薛岳随蒋介石到郑州。

电话人员、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一辆大客车、两辆大卡车，于当日下午到达菏泽城内；并命令第一四一师第四旅旅长林作桢率第七一五团（欠一营）和第七二三团，限当晚到达菏泽布防和支援黄河守军作战；同时，还命令军炮兵团第一营（营长董瀚）、第三营（营长陈锐霆）限当晚到达菏泽协同步兵作战。军属炮兵团代理团长齐国樞正在开封住医院治病，商总司令即派汽车到开封医院接他出院，于10日黄昏把他送到菏泽。

菏泽县城旧为府治，城池坚固，周长约为12华里，因历次战争和年久失修，多处残破，豁口很多。东关西关有少数居民。南关北关有商店铺面和较多的居民，个别房屋较高又坚固。城关外一片平原，坦克、大炮、汽车运动方便，利于作战。由菏泽城向北100华里为董口和鄄城，向东北约150华里是郓城，向东约150华里是巨野，向南约150华里是民权县及火车站。

10日下午，傅立平参谋长、林作桢旅长、第七一五团刘斐然（字茂宣）团长、第七二三团孙栋生团长、军炮兵第一营营长董瀚、第三营营长陈锐霆都按通知提前赶到菏泽。总部前进指挥所指挥官傅立平当即作了如下部署：

1. 当面之敌为第十四师团；
2. 第七二三团以两个营在北关占领防御阵地，一个营在城内为预备队；
3. 林旅长率第七一五团在城内占领防御阵地，并指挥第七二三团作战；
4. 军炮兵团两个营在城内南北两区占领防御炮兵阵地，支援城内外作战，并准备巷战；
5. 稽警旅仍在原地准备作战；
6. 指挥所设在城里文庙内。

11日，各部队在菏泽城里城外自己的防御阵地内，加紧构筑工事。第二十三师报告敌人攻占郓城。敌人骑兵正向我右后方活动。

第二十集团军当面之敌为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是土肥原贤二，该敌属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战斗序列。1937年9月，第二十集团军在正定石家庄作战时，就是与这个师团，还有其他师团交锋。尔后沿平汉铁路节节抗击作战和在安阳作战时，都是该师团在我正面。现在黄河防御作战据抓获俘虏供称和所得情报，知道当面仍然是敌土肥原这个日本大特务头子。这个大坏蛋曾搞成立伪满洲国和所谓华北自治，作恶多端。判断该敌行动，可能是企图渡过黄河协助敌第二军进攻徐州作战。

11日夜，敌在董口突破了我第二十三师防线，占领了董口东西地区。我第二十三师守军，虽然坚决抵抗和反击，终因力量薄弱难以固守和恢复阵地。12日凌晨敌军即长驱直入，其先头快速部队于中午到达菏泽北郊同我守军接触，继续向我进攻，即被我军击退。当时，我防守菏泽的部队营长以上的指挥官，都写下遗嘱，坚决与城共存亡，并用土坯堵死了城门，准备死守，以阻击敌人前进。

12日5时，总部接到第二十三师报告敌人向董口进攻时，当即命令在菏泽东北地区的税警旅向董口驰援，迎击或侧击敌人，阻其前进。当该旅同敌主力激战后也未阻住敌人前进，反而被迫退到菏泽城郊东北地区阻击敌人。

13日上午8时，敌人飞机开始对我阵地轰炸。敌炮兵利用高空系留气球观测，对我军阵地炮击。紧接着就是坦克和步兵的冲击，但被我军击退。下午敌增加了兵力，又向我军攻击，经过激战后，我城关和郊外阵地被敌突破。黄昏后，我军作了调整部署。税警旅进到敌军侧后攻击敌人，断其后路。第七二三团利用商店、居民房屋固守，进行巷战。

14日上午8时许，敌人开始了比昨日更加猛烈的轰炸，制空权完全被敌人控制。我军既无空军支援，又无高射炮部队，只好任敌机为所欲为。敌人炮兵比我军炮兵占优势，约5：1。因而我炮兵射击受到敌炮兵的压制。当开始炮战时，代团长齐国樞正在

炮兵团第三营炮兵阵地，和营长陈锐霆指揮射击，突然数颗低飞炮弹在近处爆炸，陈锐霆急将齐国樞推倒，并压在齐的身上。一块弹片打在陈的腰皮带环上，将环打弯；另一块弹片打在图囊内200张中央银行的新印出的票子上。两人都幸未受伤。在这次激烈的炮战中，炮兵第一营副營長孙鴻章壮烈牺牲。敌人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后，其坦克和步兵向我攻击，都被我军击退。我军伤亡惨重。下午3时敌人开始了更猛烈的攻击，经激战后敌人步兵和坦克由西城突入城内，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我步、炮兵准备的巷战工事和作战计划都用上了。步兵逐房逐屋地争夺，进行手榴弹、白刃战。炮兵直接瞄准多次击毁敌人坦克。各级指挥官都身先士卒指挥部队拼命战斗，官兵伤亡很大。林作楨旅长右腿受伤，仍继续指挥作战。卫士陆志勋阵亡。黄昏我军开始突围，因城门堵死，都是缒城出来的。林旅长由官兵保护和背着，也是缒城出来的。大炮和汽车无法弄出来都丢掉了。这是堵死城门造成的后果。于是菏泽失守。

参谋长傅立平和指揮所人员缒城出来到了菏泽城南大黄集，当即打电话向商震总司令报告。他一面痛哭一面说：“我对不起总司令，没有完成死守菏泽、抗拒敌人进攻菏泽的任务。我是山东人，要坚决在山东省菏泽县大黄集这块土地上继续抗击敌人。不成功便成仁。”商总司令一面安慰他，一面叫他速回总部研究处理作战事宜。

当傅立平自菏泽撤出到大黄集时，即和林作楨旅长以及各团、营长失掉联系。他在大黄集同商总司令通电话后，敌人骑兵即追到大黄集。傅等立即向西转进到一个村庄内。傅召集全体人员讲话，组织敢死队，由特务营排长率领夜袭大黄集。该排长很勇敢，到大黄集后，发现敌人很多马匹拴在寨墙内的树上，他命令所有人员荫蔽在寨墙上，只身潜入敌人宿舍内，用二十响手枪扫射，毙敌多人。当他退出到寨墙时不幸壮烈牺牲。墙上伏兵手榴弹、手枪步枪齐发，将敌很多马匹击毙，随即撤出战斗，敌人枪炮乱发。

傅立平率全体官兵退回总部。

15日上午，在傅尚未回到总部之前，参谋处作战科长武泉远首先回到总部。武是自报奋勇申请去前进指挥所的。当敌人攻破菏泽城，经过巷战于黄昏突围时，他愤恨跳城自杀，幸被同人救起，护运到大黄集，即乘三轮摩托车回到何庄总部。他向商总司令汇报了菏泽作战和突围情况，并报告了所了解的当面之敌第十四师团的情况。

将近中午时，发现敌人骑兵向内黄、野鸡岗方向急进。黄昏时得到通报，敌人骑兵炸毁了野鸡岗附近的陇海铁路。同时接到通报，黄口附近的陇海铁路于14日、15日，被南北前来的敌人快速部队炸毁。同日夜间又接到第一三九师电报，言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坚守萧县。

16日，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因在菏泽战斗中身受重伤，抢救无效，壮烈殉国。

当时，商震总司令能使用的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四连制）和一个警卫营。清晨8时第一四二师第五旅第三补充团第一营营长张崇阁率全营自兰封驰援来到何庄总部，当即在何庄东边的端庄占领防御阵地。敌机9架轰炸考城（今兰考县堌阳镇），敌侦察部队在何庄东北地区为我骑兵团所阻，其主力分数路向南前进，情况非常危急，总部已是首当其冲。商总司令犹能镇静自若，从容指挥，真是难能可贵，大将风度，令人敬佩。

17日上午，敌机仍频繁轰炸考城、兰封和交通线。我骑兵团袭击了敌人一辆小汽车，打死了司机和一名军官，这个军官的军衔是少佐，职务是主计（即少校军需官），在他身上搜获得敌第十四师团作战计划、命令和部队编组情况一份。该骑兵团立即将材料送到总部。从这份材料中，综合得知以下情况。

1. 酒井支队。由步兵第二十八旅团长酒井隆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五联队、第五十联队的一个大队、独立机关枪第五大队，骑兵第十八联队主力、野炮兵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野战重炮第五

联队、独立装甲车第一中队、工兵一个中队等为基干组成。4月18日由新乡乘火车出发经石家庄、天津、济南，5月8日到济宁集结。11日攻占郓城，同时配属于第二军第十六师团。支队主力向金乡方面南下，令骑兵第十八联队向师团主力方面前进。15日下午骑兵一部到内黄附近炸毁了陇海铁路。同时支队主力奉命归建，经城武向内黄前进。

2. 敌第十四师团主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中将指挥步兵第二十七旅团（辖步兵第二联队、步兵第五十九联队）、步兵第五十联队（欠一个大队）、野炮兵第二十联队（欠第三大队）、野战重炮兵第二旅团（欠第五联队）、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迫击炮第五大队、独立气球第一中队、高射炮第二队、第二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第十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第十六师团第二渡河材料中队、架桥材料一个中队、折叠船约150只、独立工兵第二联队、工兵第十四联队、辎重兵第十四联队、第十四师团通信队、卫生队、第一至第四野战医院、兵器勤务队、军马场等。于14日攻占菏泽后，16日开始分数路南下，经大黄集和考城以东地区向内黄前进。

商总部判断，敌第十四师团将于18日全部在内黄附近集结，并切断陇海铁路，寻机攻占兰封或协助其第二军攻占归德（商丘）。并将以上敌情报告了蒋介石、程潜。

当日中午，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考城何庄何家花园商总部商量作战事宜。

18日，接到第一三九师电报，16、17日敌猛攻萧县，18日攻入城内，发生激烈巷战。随即失掉电台联系。是日，萧县失守。

19日国军撤离徐州。

（二）攻击土肥原师团

20日，商震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歼土肥原师团。薛岳当时原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

令^①，在归德指挥黄杰第八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原系韩复榘部三个师），还有新编第三十五师及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四旅等部队^②。当敌十四师团渡过黄河、攻占菏泽，前进到内黄附近地区，截断陇海铁路后，蒋介石即令薛岳率各军回师围歼该敌^③。

同日，商震接到薛岳的命令要旨如下：

1. 敌第十四师团现窜集内黄、仪封、楚庄寨、野鸡岗等地区；
2. 我军决心攻击该敌，并以野鸡岗、楚庄寨、仪封、内黄之敌为攻击目标；
3. 以第六十四军、第七十四军为东路军，沿铁路两侧向野鸡岗、楚庄寨、仪封、内黄之敌攻击；
4. 以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七军为西路军向仪封、内黄、野鸡岗、楚庄寨之敌攻击；
5. 新编第三十五师向宋庄、纸坊集之敌攻击；
6. 第三集团军向旧考城之敌攻击，并以一部埋伏在鲁道口、大寨集等处相机袭敌；
7. 第三十二军以一部确保大黄集，并埋伏于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敌，其余部队仍坚守河防；
8. 定于 21 日开始攻击。

21 日，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率部队（欠第八十八师师部和

①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及《李汉魂将军日记》，当时薛岳的职务有“鲁西兵团总司令”、“豫东兵团总司令”和“第一兵团总司令”等说法。另据其他资料，5月30日，蒋介石委薛岳为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

②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5月11日，蒋介石令第七十四军、第八军、第六十四军统归薛岳指挥，为鲁西兵团。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原在商丘附近各部中，西进的是俞济时军和李汉魂军之主力。黄杰指挥第八军全部及俞济时军冯圣法师之一团、李汉魂军第一八七师主力仍在商丘、砀山。

一个旅，该师师长龙慕韩归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指挥驻兰封）由红庙附近地区出发向仪封之敌攻击前进。该敌经过抵抗即向西南退去。当日下午宋部攻占仪封^①。仪封西南约4000多公尺处敌炮兵向我射击。我炮兵还击，形成炮战。22日，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十四军会师。内黄、野鸡岗之敌向西退去。两军长商妥由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统一指挥，向当面之敌攻击^②。下午2时，开始攻击，经过激战稍有进展伤亡颇大。

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率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部和邱清泉率领的一个战车营及搜家装甲车一个连，并指挥第七十一军的第八十八师（欠一个旅）师长龙慕韩。21日攻击无多大进展，却大肆吹嘘。23日，敌大举进攻时，桂部溃退西逃，一直逃跑到开封以东附近地区。兰封县城、车站和罗王车站、兴隆车站失陷。桂永清军长被撤职。龙慕韩师长被枪决。

商震总司令按照薛岳的作战命令，即令税警旅确保大黄集并埋伏在杨桥、郭庄、马庄等处相机袭击敌人^③。并令各部队严守河防。当敌攻占兰封、罗王、兴隆^④时，立即命令第一四二师防守

①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该军于5月22日下午攻克仪封。

② 据《陆军第七十一军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李汉魂将军日记》，24日下午，宋希濂去杞县阳堌，晤李汉魂、桂永清。宋、桂力请李统一指挥各部，薛岳亦令李统一指挥，李遂受任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各部于25日拂晓开始攻击。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5月21日，商震令税警旅固守东明及竹林口以北的河防。

④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至6月2日该部西撤时，日军未曾占领过兴隆集。另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5月23日，罗王寨之敌向北运动，曲兴集、三义寨间发现敌人，商震遂令新编第三十五师在考城西南爪营、魏庄一带对西南方向警戒，第一四一师第三旅占领陈寨、王爷庙对面警戒。

三义寨至袁坊地段守军，应集中兵力迎击来犯之敌，坚决控制黄河渡口。经过激战伤亡非常严重。终因力量悬殊三义寨被敌攻占^①，渡口失守。

敌第十四师团攻占兰封、罗王车站后，即将其主力转移于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三个据点和黄河南岸渡口，利用河北岸贯台集进行后方补给。敌一部兵力占据了埽街，构成了半圆形防御阵地，背靠黄河，固守待援。同时，留置一部分兵力于兰封和罗王车站成犄角形势。

当敌人攻占兰封时，在郑州的蒋介石怕敌人直攻开封、郑州，立即调胡宗南十七军团（辖第一、第九十两军）由西安潼关赶到开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到开封指挥督战^②。

24日，第三十二军税警旅一部克复菏泽^③。第一四一师第七二三团到何庄以东雷寨布防。

同日开始围攻土肥原师团。第七十一军攻击兰封之敌。第七十四军俞济时部、第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师、新编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六师沈克等部攻击三义寨附近地区之敌^④。第六十四军攻击罗王车站地区之敌，尔后协助胡宗南部攻击罗王寨、埽街地区之

① 据编者于1992年赴三义寨调查，召集十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座谈，得知三义寨失守的情况是：民国二十七年阴历四月二十二日（1938年5月23日），三义寨正逢集市。一大早，日军就从西南方的罗王寨经李沟进攻三义寨。守寨的骑兵部队急忙从东门出寨，在东门外用小钢炮隔寨向西打了一炮，就朝东北方向跑了。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第十七军团（仅辖第一军一个军）于5月20、21日已先后到达开封、郑州地区，程潜于5月21日进驻开封，此二者均在日军占领兰封之前。

③ “第二十集团军战报”上无此项记载。

④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5月25日攻三义寨的仅有新编第三十五师及第三十二军骑兵团，各路部队联合攻击三义寨是27日开始的。

敌^①。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以第一军为预备队，以九十军及邱清泉的战车营、搜索装甲车连，并配属重炮兵营攻击罗王寨、埽街地区之敌^②。在豫北的朱怀冰指挥其部队和其他部队，向长垣、封丘、延津地区和至黄河北岸地区积极活动，截断敌人补给线和阻击敌人增援。

经过 24 日至 27 日作战，我军攻克了兰封和罗王车站。攻击三义寨、曲兴集、罗王寨、埽街地区之敌有进展，虽伤亡很大，但仍在继续猛烈进攻。敌土肥原龟缩阵地内固守待援。

（三）由于商丘失守全线撤退

当薛岳在商丘调集军队回师攻击土肥原师团时，原命令第八军军长黄杰坚守商丘，竭力阻击敌人西进，以保证大军围歼敌第十四师团。但黄杰未执行薛岳的命令，当敌军先头部队刚接近商丘便率部撤退。27 日商丘被敌第十六师团和配属该师团的混成第三旅团攻占^③。事后，薛岳向军事委员会控告黄杰不听命令、贪生怕死、擅自放弃商丘。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的袒护，撤职了事。

敌军陷商丘后，即分路西进。敌第十六师团、混成第三旅团，自商丘直向杞县方向前进^④。敌第十师团、混成第十三旅团自徐州

①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李汉魂将军日记》，5月28日凌晨，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五师和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八团攻占罗王寨及车站。当晚李汉魂奉薛岳之命，率第一五五师和第五十八师于29日攻击何寨、范店、杨寨、杜庄，策应胡宗南部攻击曲兴集之敌。

②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5月23日以来，胡宗南部除一个团攻击罗王外，主力及配属部队主要是攻击曲兴集及其以东、以北之敌。另外，至6月2日胡部西撤时，日军未曾占领过埽街。

③ 据《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于26日开始攻击商丘，28日占领之。另据第八军、第一八七师战报及日方资料，商丘城及车站于29日被日军占领。

④ 据《第十七军团兰封会战战斗详报》及《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日军占领商丘后，即分两路西进。一路沿陇海铁路，29日已到商丘以西之小坝车站；主力由铁路南侧向宁陵、睢县、杞县方向，29日晨在宁陵附近与第一八七师接触。

以西直向太康方向前进。

薛岳鉴于敌军西进，将危及我军后方，即令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四军及其他部队，在杞县南北一线地区，占领防御阵地，阻击敌人西进。并令第十七军团、第七十四军和其他部队，加紧猛攻第十四师团，期全歼该敌。猛攻三日，虽有进展，但伤亡甚大，攻击受挫。

30日上午，商震总司令接到上级命令，总部向郑州转进^①。第一四一师向开封转进，担任防守开封任务^②。第一四二师在三义寨以东的部队，即向开封转进归还建制。税警旅和第二十三师即向郑州、新郑间地区转进，整补待命。总部和部队都于30日晚饭后出发徒步夜行。31日拂晓，总部抵兰封附近，宿营后梨沟。6月1日，沿途不断遭敌机轰炸袭击，宿营开封车站附近。2日乘火车至中牟，宿营大衡庄。第三十二军奉命坚守开封，掩护大军西撤。第一四一师于6月1日早到达开封，占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③。开封城北至黄河岸为新编第三十五师王劲哉部防御^④。第一四二师集结于开封以西地区为预备队。总部人员徒步行军至郑州，宿营崔庄。郑州被严重轰炸，成了一座死城。

6月2日，第六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在杞县南北一线防御阵地上，刚与敌接触作战^⑤，即奉到蒋介石的命令，速向新郑、许昌中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商震于5月30日下午接到的薛岳电报是：请商震在东明、考城各留兵一连，其余部队星夜兼程集结于兰封附近，并请商进驻兰封指挥，协同各军击破西犯之敌。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一四一师接替开封城防的任务，是6月1日晚10时接到的，此时商震已到郑州。

③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一四一师于6月2日下午接替开封防务。

④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5月28日，王劲哉师即奉命守卫兰封城。此后至第一四一师撤出开封，担任开封以北河防的一直是刘和鼎军。

⑤ 据《李汉魂将军日记》，日军于6月1日下午开始进攻杞县，2日晚守军撤退。

间地区撤退。各部队即分路向目的地转进。同时，胡宗南第十七军团、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和其他部队，接到撤退命令，各部队立即徒步或乘火车沿陇海铁路和以南地区，分路向目的地转进。

防守开封的第一四一师和其他部队，于6月2至4日掩护大军西撤完毕后，5日遭到敌十四师团的攻击^①。夜间奉命向郑州以南地区转进^②。集结待命。

(王启明 整理)

①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日军于6月3日下午4时开始攻击开封外围阵地。

② 据“第二十集团军战报”，第一四一师、税警旅于6月6日1时退出开封，当天上午即奉命守卫中牟。

追忆南阳保卫战

董永昌*

1942年，我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秘书，负责总司令（初为孙连仲，不久即由刘汝明接任）的新闻发布工作，经常陪同总司令接待记者采访和视察、检阅部队，同时还兼任南阳盐务局局长。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总部和所辖部队的军官们经常交往，因而对于军事方面的情况也比较了解。现仅就我在1945年南阳保卫战前后的经历和见闻回忆如下。

在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日军摧毁了美国设在我国中南地区的一些空军基地，但位于豫西南鄂北交界处的老河口机场仍完好无损，对其所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中美空军联队第三大队的飞机经常由此起飞，袭击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的铁路、公路、桥梁、军事设施和长江航运，使之遭受重大损失。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并相机占领作为陪都重庆屏障的豫西南鄂北地区，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1月29日下达了攻占老河口的命令。日军深知，欲攻占老河口，必须首先切断其与后方西安的公路交通，扼住西峡口这一咽喉地带，以阻止来自第一战区的增援，同时南阳也是一个重要据点，因而采取了南北夹击、中间突破的战术。2月，日军开始调集军队，准备发动进攻。

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刘峙，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峤）判明敌情后，下令调整部署：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

* 作者当时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秘书兼南阳盐务局局长。

司令孙震)、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和豫鄂挺进军第三、第六、第九纵队组成右集团，防守大洪山、襄阳、老河口一线的鄂北地区；以第二集团军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和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豫鄂挺进军第一和第七纵队，以及临时归属的冀察战区高树勋部的新编第八军(军长胡伯翰)组成左集团，布防在南阳四周地区。内乡县西峡口和淅川县一带由第一战区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防守。总司令刘汝明奉命后，即与幕僚们进行了研究，于3月16日在南阳城西十余华里的总部驻地刘相公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六十八军第一四三师坚守南阳城，其他部队在外围地区阻击日军。

当时我和同僚们都坚信，第一四三师一定能够完成坚守南阳的艰巨任务。早在抗战初期，该师师长黄樵松就因在忻口会战中的娘子关战场、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场和武汉会战中的大别山北麓战场英勇杀敌，屡建战功而驰名全国。当时国内许多报纸都登载过他的事迹，我也曾为他写过一篇题为《抗日名将黄樵松》的文章，刊登在南阳《前锋报》上。1943年，他率部进驻南阳并兼任城防司令，不久我们即相识。由于我们是近同乡(他是河南尉氏人，我是河南长葛人)，又有着共同的志向和爱好，彼此语言相通，无话不谈，遂成莫逆之交。1944年中原会战后，豫中、豫西大片国土沦陷，从而把豫西南地区推到了我军在长江以北的抗日前线。从那时起，黄樵松就开始组织部队和民众在南阳城四周修筑城防工事，在城北的独山、城西北的靳岗、城西南的卧龙岗等处设置了十多个据点，并加紧屯积粮秣，训练部队，准备迎击日军的进攻。

此次受命后，黄樵松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工作也更加紧张和繁忙。他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最大的莫过于兵力不足。一个师守城已经是不敷使用，而第四二七团团部和第二、第三两个营又被集团军总司令部调去担任警卫，就使得兵力更加不足。他和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参谋长谷云明等为此事进行了

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以第四二八团守卫城东半部及大盆窑、独山等据点；以第四二九团守卫城西半部及靳岗、卧龙岗等据点；第四二七团第一营为总预备队，控制于城内王府山上；配属的两个野炮连分别列放于望仙台和医圣祠，战防炮连放列于北关外，高射机枪排置于西城墙。14日，黄樵松召集南阳地方军政官员开会，讨论战时戒严问题，决定城内居民、一切非战斗人员和各种物资一律于两天内疏散至城外，并令工兵在城外各要道路口密布地雷群。为了使全军上下牢固树立誓死守城的决心，黄樵松还抓紧时机对官兵进行战前鼓动，组织部队宣誓：要把南阳城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誓与日军血战到底。在此期间，我曾多次与黄樵松磋商，一再表示愿留在城内，同他并肩杀敌，生死与共，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3月21日前后，日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我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由南向北进攻的日军第三十四军（司令官栉渊）所属的第三十九师团（师团长佐佐真之辅），由北向南进攻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一部，分别遭到我第三十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较慢，但由东向西分四路进攻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各部进展甚快。至23日，其先头部队已攻占南召、唐河的源潭镇等地，进薄南阳城下。

23日晚，我再次潜入了战云密布的南阳城。此时黄樵松的眷属已经撤离，我们就在他的原卧房内促膝密谈。几天来的过度操劳已使得他两眼布满了血丝，前额上的皱纹更加深陷，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嘶哑，但他仍是像往常那样的精神饱满，坚定沉着，谈吐幽默，待人热情。他对我说，他已抱定了誓与南阳城共存亡的决心，并已向家属交代了后事。战斗打响后，他就要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材放在师指挥所门前，还要立一块牌子，写上“黄樵松之墓”五个大字。如果日军一旦进攻城来，他就要血战到底，以身殉城。他还向我吟诵了他的得意之作：“陈兵娘子关，壮志凌云间。笑斩鲤登头，放歌大坂山。”他说，日军在台儿庄被他的第二十七

师打得焦头烂额，竟闹出了在战场上悬赏活捉他的笑话。这次他就在南阳等着，倒是要看看日军有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致认为：别看日军其势汹汹，兵临城下，但已是强弩之末，当时形势发展对我军作战很有利，反攻阶段已为期不远。他说，即使他看不到那一天，也会含笑瞑目于九泉之下。最后，我说明了来意，再次要求留下。他坚持认为我不是战斗人员，必须马上撤离，否则我俩都会受到纪律处分。我看到实在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只得起身告辞。临别时，我俩的眼眶都湿润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感。此时已是午夜时分，黄樵松为了我的安全，命令他的随从副官陈亚民送我出城。当我走出几步后回头再看他时，黄樵松挥动着右手对我说：“来生再见！”

此后，我因妻子苏锦豫分娩不久，需人照顾，便随着总部眷属经镇平、内乡，撤退到了淅川县城。但万万没有想到，日军很快就到了内乡，经丹水、上集绕到淅川县城北部。这时，淅川地方团队负责人陈重华、任平甫建议我带领总部眷属到城北的屯子沟暂避一时，我同意了。但对于日军为什么暂时放弃南阳不攻而急于西进的原因，我直到战后与黄樵松重逢时才弄清楚。

次日黎明，屯子沟四周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和妻子急忙跳下床，披上衣服，抱起小女儿就往外跑。到了后院墙下，我蹲在地上让妻子踩着我的肩膀翻过墙头。就在我刚刚站起身来准备翻墙时，十几个日军士兵端着步枪冲进了院内，我躲闪不及，当了俘虏。

被俘期间，我受尽了种种摧残和折磨。一天夜间，日军与我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部队发生激战，我被押到了一个山洞里。大约半个小时后，看守我的日军士兵竟抱着枪睡着了。我乘此机会迅速挣脱绳索，拼死逃出洞外，连夜寻找部队。

不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移驻湖北省鄖县县城，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也分别到了均县和鄖县白桑关。在白桑关，我和

黄樵松劫后余生得以重逢，心情格外地兴奋和激动。他向我谈起了南阳保卫战的经过。

在向西进攻的四路日军中，由鲁山出发的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和由舞阳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团（师团长杉浦英吉）是奉命进攻南阳的。3月24日，这两路日军已分别到达南阳以北的石桥、三岔口一带和以南的三十里屯、禹王店、刘营一带，并加紧进行攻城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系列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情况。以西峡口为攻击目标的日军战车第三师团（师团长山路秀男）从襄城出发后，由于连降大雨，河流水位猛升，道路泥泞难行，又不断遭到中美空军的袭击，因而行进受阻，此时才到达赊旗镇（今社旗县城）附近。日军第三十四军所部正在湖北境内的欧家庙、武家堰、八都河一线与我军激战，前进受阻，从而使得由驻马店出发且行动迅速的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藤田茂少将）成为冒险深入老河口攻坚的孤军。我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所部也不断向平汉铁路南段发动袭击。同时，日军还发现我新编第八军、第六十八军、第五十五军在南召、方城、象河关等地节节抵抗后撤至白河西岸，主力并未受损，我军在西峡口一线的防卫力量已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南阳城内我军已作好充分准备，正严阵以待，城外还埋有大量地雷，决非轻而易举就能攻下。因此，日军临时改变了计划，将攻击南阳的任务交给了二线部队第一一七师团吉武支队（支队长步兵第八十七旅团长吉武秀人）；第一一〇师团配合战车第三师团向镇平、内乡、西峡口方向攻击前进；第一一五师团渡过白河向西南方向急进，增援骑兵第四旅团攻击老河口。至此，我终于明白了日军急于西进的原因。副校长阎尚元也说：南阳是一块硬骨头，日军啃了几啃也没有啃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绕过南阳，去攻老河口和西峡口。接着，黄樵松详细地向我讲述了战斗经过。

3月24日夜，日军先头部队进攻城东大盆窑，企图渡过白河，被我守军第四二八团一部击退，南阳保卫战从此开始。25日，日

军已占据了南阳东、西、南、北四面的红泥湾、安皋、陆营、石桥等地，南阳已陷入重围之中。日军攻占独山后，在山上架起大炮，对师指挥所驻地蚕桑场进行猛烈轰击，副师长韩世俊的坐骑就是在这里被炸死的。当晚，我师指挥所迁至城南关小水门内，决心与日军背水一战。当日及次日，第一四三师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坚守外围各据点，毙伤大批日军，还抓了一名俘虏。27日晨，日军骑兵旅团开始攻击老河口机场，于傍晚占领，我军失去了空中支援。当天，日军步兵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城外据点连续猛攻，靳岗、十里铺、大益窑沦入敌手。当晚，暂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崔贡琛）第三团第二营营长刘博益率部从方城突围来到南阳。刘汝明总司令命令该营归黄樵松指挥，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黄樵松和副师长韩世俊、阎尚元，参谋长谷云明等人经常亲临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巡视。27日上午，黄樵松带领一名卫士前往北门外的重要据点玄妙观督战。途中卫士突然中弹身亡，他便独自一人冒着枪林弹雨来到阵地，坐阵指挥，并严令各部死守外围据点。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黄樵松手执铜锣，在战壕里来回奔跑敲打，嘴里还不停地高喊：“打！打！狠狠地打！”主将亲临火线，呐喊助威，使官兵们深受鼓舞。经过激战，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3月28日，南阳外围的战斗更加激烈。日军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从四面围攻南阳城。守卫卧龙岗的第四二九团第一营第二连赵新芳排与数十倍于己之敌激战数昼夜，本日全部退入武侯祠内，利用房屋居高临下，击毙日军数百名。该排除四人得以突围，赵排长以下数十人全部殉国。在马武冢、尚志中学、西关等处，我军与敌反复白刃，激烈争夺，终于将日军击退。在几天的外围战斗中，我军埋设的地雷和战防炮炸毁和击毁日军战车八九辆。

29日，守卫尚志中学、马武冢的我军官兵全部阵亡，西关、北关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部分日军突入街市。西关战斗紧张之际，

黄樵松命令刘博益营前往增援。该营到达西关后即发起反攻，毙伤日军数百，击毁战车两辆，自己也伤亡了200多人。黄樵松还令南阳县长赵芝廷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出城发动民众支援部队作战，帮助往城外运送伤员。当夜，第一四三师接到了长官部发给特别守城费100万元的电报。

30日，东、西、北三关尽陷敌手，我军退入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我军的重武器多数被日机炸毁或炮火摧毁，弹药即将告罄，部队伤亡严重，但官兵们仍坚守每一处房屋街垒，顽强阻敌。当天，长官部转来蒋介石的嘉奖令：我南阳黄师长、老河口汪师长，所部坚守名城，顿挫敌气，战果丰硕，该师长，团长及各级官兵忠勇用命，着即传令嘉奖。激战至4月1日，城内已陷于混战状态，到处都在白刃格斗，南关小水门师指挥所附近已成一片火海。

黄樵松越谈越兴奋，他拿出一本“丘八诗集”让我看。他说，这一本诗有的是我在战壕里哼出来的，有的是撤离南阳途中骑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他指着其中的一首念道：“大军被迫去，孤军守宛城，倭寇倾巢犯，血战马武冢。”黄樵松还说，守卫马武冢那个排的排长叫刘国旺，真是好样的，作战勇敢顽强，他和排里的大部分士兵都牺牲在阵地上。

就在黄樵松率部浴血奋战宛城的日子里，周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3月25日到4月1日，邓县、镇平、老河口机场、内乡、西峡口等地先后失守，主战场已移至西峡口以西地区和老河口城下，南阳已成为一座孤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黄樵松与副师长和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当晚突围，并制定出突围的部署。傍晚，第一四三师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突围，于2日晨到达唐河境内。休整数日后，又奉命袭击南阳附近的日军据点，一度收复了大盆窑、溧河等地。

4月中旬，第一四三师奉命归还建制，途中多次与敌遭遇发生激战，于5月上旬辗转来到湖北郧县。途经荆紫关时，黄樵松又

作了一首诗，我记得其中的两句是：“凯旋来到荆紫关，一路小戏歌上山。”

后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等人曾到第二集团军各部慰劳，特别是对于曾浴血坚守孤城南阳的第一四三师官兵，更是勗勉有加。国民党中央和陪都重庆各界，也组织了劳军团前来郾县慰劳，并召开大会庆祝胜利。

(李景魁 整理)

女
史
記
卷
二

安阳守卫战前后

陈家珍*

1937年10月18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辖第三十二军）总部南渡漳河，到达安阳城，随即奉命占领安阳以东既设之国防工事，准备迎击日军进攻。19日，北岸日军对守卫安阳城及以西地区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猛烈炮击和空袭，步兵开始强渡漳河。汤部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与敌激战三昼夜，歼灭大部分渡河日军。此后敌我双方对峙于漳河两岸。

10月22日，程潜令第二十集团军向淇县、汲县（今卫辉市）及新乡一带转移。次日至24日，除骑兵部队留在安阳、汤阴外，主力相继到达指定地点，以部分兵力守卫淇县前进阵地和汲县主阵地，其余作为机动游击队。

31日，上级命令汤恩伯部驰援晋东娘子关，所遗安阳城及东西一线之防务由商震部接替。程潜为了增强商震部的战斗力，特令独立骑兵第十四旅张占魁部和铁甲车第一中队长何平率一列铁甲车开赴安阳，归商震指挥。商震奉命后，即将总部推进至汤阴以南后李朱村，并部署如下：吕济第一四二师以第六旅崔真部立即开赴安阳，以一个营防守车站，主力固守安阳；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在安阳西南丘陵地带构筑阵地，与安阳车站及安阳城我军相呼应；骑兵第十四旅在水冶镇附近积极向北搜索敌情，掩护本集团军左翼的安全；铁甲车第一中队位于安阳车站归崔旅长指挥，不

* 作者当时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一科参谋。

时来回于安阳、汤阴间维护交通安全；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在宝莲寺东西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其余部队在汤阴附近整训、补充。

11月2日早饭后，商震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派你到安阳去一趟，先到车站后到城内，代我看一看构筑的工事和配备。不当的地方你向他们提出建议，加以改进。你是学工兵的，又和他们都熟。我已通知崔旅长在车站等你，让刘剑萍给你预备一辆轨道车（铁路上巡查或检修用的车子，以人力摇动），骑兵团派4个士兵给你押车。晚上回来，向我详细汇报。”我回屋立即向骑兵团打电话，副团长钱燕斋接电话，也想到安阳看看，他带了4个枪兵，我们在汤阴车站坐上轨道车出发了。当我们走到十里铺就轰的一声触了地雷，把轨道车抛起炸毁。我被抛出七八米以外，钱副团长腰被折断（后来治疗多年，才勉强能走），4名士兵一死两伤。驻安阳的部队及铁甲车闻声先后赶来，查明是敌人骑兵于昨夜晚窜入十里铺内隐藏，在铁路上埋设了地雷。将钱副团长及伤兵两名送回汤阴军医院，掩埋了死去的士兵，我与另一士兵乘铁甲车到安阳车站。崔旅长正在车站等我，连忙握着我的手说：“好危险，你死里逃生啊！”随后我和崔旅长在守备车站的苏永刚营长陪同下看了车站，到城内旅部吃过午饭，又在补充第三团王本善团长陪同下视察了城内外的工事及兵力部署。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他们都欣然接受。事办完后，我到后李朱总部时，已是晚8点了。我当即到商总司令的办公室汇报。商说：“你们路上的情形，刘本厚主任已向我报告了，你不要紧吧？”我说：“我不要紧。”我汇报了视察安阳的情况及向崔旅长等的建议，商不住地点头。

此时平汉线安阳河北岸敌军有大量增加，似有夺取安阳县城南下，配合各方面敌军作战之可能。当晚总部接到骑兵第十四旅张占魁旅长报告：今晨敌骑兵约三四百名由水冶镇北方向我旅攻击，敌后有后续步兵部队，小屯以北约六华里有敌一两千人向南运动，已令杨岳斌团在水冶镇与敌战斗，小屯方面敌人，我正严密监视中。

11月3日早饭后，参谋处长蒋纪珂告诉我说：“你马上带五十分之一安阳附近地图随总司令、邴高参坐火车到安阳，他们在办公室等你。”我急忙把地图装入皮包到办公室，商和邴正在等我。我们三人乘汽车到汤阴车站，见一个火车头挂两节客车正升火待发，我们上车后即向安阳开去。车距安阳车站尚有3华里时停止，听到安阳车站的炮声。刘副官急忙来报告说：“敌人已发现我们的火车开来安阳，正猛烈射击，火车是否再向前开，请总司令指示。”商说：“车停在此地，不再前开。”又对邴和我说：“走，下车，我们走到车站去。”当我们走进车站区后，敌成群的炮弹不断向我们飞来，摧毁了许多树木和房屋。商震左右的人一闻炮弹飞来，或卧倒或俯身。商则左手持一手杖，谈笑自若，毫不在意，还笑着对邴高参说：“东桥，敌人用礼炮欢迎我们呢！”我们快到车站票房时，何平队长前来迎接，他向商行礼后说：“请总司令到站内地下室休息一下，敌炮停射后再到铁甲车上看看。”商说：“不必，我先到车上看看，回来再休息。”邴高参说：“总司令先到地下室休息，我代你先到车上看看。”邴又对我说：“走！你我一同去，总司令就放心了。”商只好在何队长引路下到地下室去。我们来到列车指挥室，童副队长正在指挥射击。约半小时，敌炮停止射击，邴和我转回地下室去。地下室大约有4间房子大，崔旅长正在向商震汇报敌情。见我们来了，商起立说：“我们先到铁甲车上看看，然后再回到城里去。”来到铁甲车上，何队长向官兵作了介绍，商总司令一再慰问士兵辛苦。巡视车内情形后，问何队长有无困难，何说：“没有困难，请总司令放心！”

告别了何队长，我们即向城内走去。先到旅部吃午饭，饭间商问崔旅长守城方案，崔说：“我控制了较大的预备队，哪里出现紧急情况，我就往哪里使用；哪里最危险，我就往哪里去。我告诉团、营长们也要这样做。”商点头称好。崔旅长和王本善团长都是商震在山西任旅长时期的的老部下。崔任商的副官处长多年，王则是商由卫士提升起来的。饭后开始视察城防工事，强度、射向

不适宜的地方，商震不厌其详，一一予以指示。视察了5个多小时，天近黄昏，崔、王送我们到南门外。商对他们说：“现在战斗很紧张，你们要做好准备：不要再送了，回去吧。”我们十三四人在傍晚中登上火车，回到后李朱时，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这一天，第一四一师一部曾对安阳河南岸的日军发起攻击。日军立即在飞机、战车掩护下向第一四一师补充第二团阵地发起猛烈反攻。该团是在正定战斗中牺牲最大的一团，人员较少，主要干部都是新接任的。战至下午3时，团长陈行先，团附阮成美，营长魏凤云、王葵先后阵亡，阵地被敌突破。第一四一师被迫后退到十里铺以南。穆潜以我部攻击力弱，下令固守安阳工事，不必再作积极行动。当晚，日军又袭击我安阳西南的东、西八里庄和三分庄一带阵地。

4日上午8时，崔翼旅长打电话向参谋长傅立平报告：丰乐镇以南的日军总计不下四五千人，附有各种大炮30余门、战车多辆，今晨向我军阵地射击，有南渡安阳河进犯的企图。上午10时，崔又来紧急电话报告：日军升起系留气球观测，指挥炮兵开始向我车站部队射击，我以铁甲车炮还击；敌分四路强渡安阳河，向我军发起全线进攻，与我骑兵第十四旅在水冶镇、小屯方面展开激战。

同日，敌空军出动频繁，以多架飞机协同水冶镇、小屯、安阳车站以北地面敌军作战，并派出侦察机掠过总部上空向新乡、郑州方面进行战略侦察。商震召集参谋长及参谋处长、课长等开作战会议，分析了当面敌情，认为安阳战斗已开始，要接受石家庄以南战役的教训，进行坚决抗击，部署如下：令第三十二军骑兵团（附机枪连、炮连）立即以战备态势由汤阴向安阳以东白璧附近搜索前进，到达后与安阳守军切取联系，急速向各方搜索敌情，警戒我军右翼的安全；崔旅固守安阳县城，安阳车站苏永刚营必要时撤入城内；骑兵第十四旅积极主动策应安阳守军作战；铁甲车第一中队俟火车站苏营转移城内后，可稍向南移，积极协同安

阳城方面的作战；第一三九师守卫宝莲寺东西之线加强工事，准备战斗；第一四二师（欠第六旅）为集团军总预备队，并在汤阴县城构筑工事。商震以电话向程潜司令官报告了本日上午战况。

当日下午敌以猛烈炮火轰击安阳车站和安阳城，步兵千余人在10多辆战车引导下向我车站守军猛扑。我守军伤亡殆尽，仍顽强阻击，并以集束手榴弹击毁敌战车两辆。这时，我骑兵第十四旅由水冶镇、小屯向后转移，使车站的左翼空虚。崔冀旅长看到车站阵地已无法固守，只得下令向城内转移，铁甲车中队也南移至十里铺附近。

日军攻占车站后，即集中全部炮兵猛轰安阳城，并以飞机向我守军轮番轰炸扫射。炮击和轰炸甫停，千余名日军步兵在战车掩护下向安阳城发起猛攻。这时，城门及水泥工事大部被摧毁，我军的轻、重机枪也十有八九被击毁。崔冀一面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一面多次打电话向商震报告战况危急，请求增援。但此时第一四一师已与敌接触，第一三九师守卫宝莲寺东西之线准备迎敌也无法抽调，而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一四二师（欠崔旅）一旦动用，其他方面若出现危急情况就会无兵可调，从而使整个平汉线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商震审度全局，反复权衡利弊，决定不动用预备队。他请求程潜派兵增援，但程回电说已无军队可派，希望商自己解决。商震见指望上峰增兵已不可能，只得打电话命令崔冀拼死守城。崔冀是商震多年培养的军官，甚为商所看重。值此危急时刻，崔冀亦不负商的重托，指挥部队连续三次打退日军的冲锋，并将由城东北角缺口处突入城内的一股日军驱逐出去。战斗中，崔旅的李团长受伤，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伤亡更为严重。激战至4日深夜，安阳城被突破，崔冀率残部退至城东南马官屯。商震命崔冀整饬残部待命反攻，并令守卫宝莲寺以北阵地的第一三九师严阵以待。

不久，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转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安阳战役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六旅旅长崔冀，在作战期间，

未完成固守安阳县城任务，致使安阳要地沦陷敌手，着即撤职，永不录用。商震接到命令后非常难过，但上命难违，只得转饬第一四二师师长吕济遵令照办。崔旅幸存的官兵听说崔被撤职，无不为之鸣冤叫屈。

日军攻占安阳后，11日又攻占了河北大名。由于日军前锋推进过快，其后方部队、设施和后勤补给线经常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如关麟征军11月11日和13日袭击邯郸、磁县日军机场，炸毁许多飞机、大炮，并焚烧大批汽油；中国军队南撤时与大部队失散的许多小股部队此时已重新集结，再加上大量各色地方武装，搅得日军不得安宁。因此日军被迫暂停南进，与我军在安阳、宝莲寺之间形成对峙。

日军虽暂时停止地面进攻，但常对我军进行空袭。一天下午两点，日军三架重型轰炸机经后李朱上空向南飞去，约3分钟后即掉头折回，飞临第二十集团军总部上空，未侦察也未盘旋即投下重磅炸弹三四十枚，又向北飞去。炸弹多数落在商震的住宅附近，死伤军民20多人，房屋被炸毁多处。是时商震在屋中办公，屹然未动。敌机去后，商震偕战区少将高参邴淳到村里巡视，并派人叫来医务人员给受伤群众包扎。他叫来总部警卫部队第七二三团第三营营长常东阳说：“今天飞机来炸，一定有汉奸指示目标或预先得到情报，不然不会这样准确。以后要特别注意防谍、防奸！”

11月中旬，南京军事当局来函，征询商震的意见：“意欲命你率领第三十二军深入河北中部敌后，组织地方武力，在敌后进行抗战，任河北民军总指挥，如何？盼复！”商看后经过再三考虑，又接受平汉线北段抗战教训：不是自己亲自培养的军队，遇到重大情况，就不接受自己的指挥，徒有兵力数量之名，而无实力作战可凭，与其勉强应命，不如事先陈述困难，免误国事。遂与参谋长傅立平等商量，决定不去河北任河北民军总指挥，立即回复南京，以年老（时年51岁）体衰，唯恐有误军机为名辞谢。后来

南京任命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

不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将属长芦税警旅的两个团约3000人拨归第二十集团军战斗序列。商震委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处长蒋纪珂任旅长，并得到河南省政府的一个保安团，将税警旅扩编为三个团，聊补几个月来对日作战中的严重损失。

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真相

韩同文

乐道院的前身——教会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陆续侵占了我国大部分领土，两国鏖战多年竟都不宣战。美、英等强国仍袖手旁观坚持中立，美、英侨民在中国传教或经商，日军也不侵犯，但外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因按照中国政府规定：“均由中国人任校长并在各级政府备案”，故日军对教会学校也实行奴化教育，勒逼教会学校也挂日本国旗并增设日语课等，否则便予以取缔。1938年，日军侵占潍县。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在潍县乐道院创办的广文中、小学，因中外师生拒不接受侵略者规定的屈辱条件，被迫停办。校长崔德润等少数师生去大后方流亡学校。1939年，广文中、小学以“圣经学院”名义在美国教会庇佑下复课，校长为黄乐德（名义是副院长，美国牧师为名义院长）。

外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是我国教育史中不可缺略的篇章。在众多的外国教会中，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在中国办的学校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早在1862年，它就在登州创办了文会馆女校；1864年，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狄考文博士夫妇接办文会馆并创办男校；文会馆男校多数毕业生在全国各地教会大学及中学任教，教科书和教学仪器，也都是文会馆师生编著和研制的，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后来，登州教区发展到60余所学校；烟台教区也有40余所学校；潍县教区多达80余所学校；还有滕县的华北

神学院及新民中学等校，济南的齐鲁大学及附小、齐鲁中学和广智院等校，仅山东省就有 200 余所学校。另外著名的金陵、燕京、东吴、华西和圣约翰等大学，都是美国基督教创办的。

早在 1866 年，文会馆校长狄考文就把学生立会定为必修课，强迫学生立会，但立什么会，任由学生自己选择，校方绝不干涉。不久，首届学生邹立文等人就创立“酬恩会”（后改名“自立会”），宣布脱离外国教会自立，自己传教，自己办学。文会馆早期完全免费。学生都是穷孩子，毕业后多教学（半义务性质）收入极少。“青年会”也是学生自由创立的，宗旨是“以体育、智育、德育改良人类救国”。孙中山对青年会评价很高，认为是和“兴中会”一样的进步团体。陆浩东和史坚如等先烈都是青年会成员。青年会早期和“自立会”一样，经费少，不能开展活动。

青岛原是人烟稀少的小渔村，1898 年，开埠并修筑胶济铁路后，一跃成为山东主要门户和通道。烟台基督教长老会先后派柏尔根（Paul D. Bergen）博士和德位思（L. Y. Davies）来开创新教区。学生周书训、张松溪、丁立美和刘寿山等先后参加。不久，刘寿山经营房产建筑在青岛建埠中致富，多次慷慨捐献巨款，自立会才实现自立，先后在青岛、济南、潍县、烟台等地自己建立教堂，传教办学，并与青岛长老会合办文德女中、附小和幼稚园，张松溪任校长。另外，德位思、刘寿山和巴乐满还发起成立青岛“青年会”，也是刘寿山捐出冠县路一座楼房，才得以发展壮大并创办义学。后来，将冠县路楼房变卖 45000 元，德位思捐款 20000 元，买下浙江路 9 号院两座楼房，充当“青年会”会址，德自己也住在里面。德位思后来在潍县和济南工作多年，仍经常回来居住，俨然是个青岛人。

1901 年，文会馆校长赫士（Watson M · Hayes）博士亲率 16 名中美教习去济南创办山东大学堂，由柏尔根博士接任文会馆校长，去潍县乐道院筹建广文大学。青岛教区由德位思主持，继续发展各区分会，筹备崇德中学，指导自立会和青年会的工作。

1903年，狄考文、韩维廉和德位思代表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仲钧安、林惠生和武成献代表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组成联办大学校董会，决定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与长老会在登州办的文会馆合并，改名广文大学堂，迁潍县乐道院新建校舍，由柏尔根任校长。1906年，因学生要求增设英文课等引起学潮，柏尔根引咎辞职，由德位思接任广文大学校长。1917年，广文大学由潍迁济南改名齐鲁大学，德位思改任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齐鲁大学部分师生迁往四川，在华西大学上课，德位思等师生留在济南继续办学。珍珠港事变后，校舍被日军仁字部队司令部和伤兵医院侵占，美、英籍教师在济南被集中关押，德位思也在青岛浙江路9号青年会内自己的住所被捕，先在江苏路、湖南路口外国教会楼房里关押。半年多后，都先后被押送到潍县，关进乐道院集中营。

乐道院就是当年德位思任校长11年之久的广文大学旧址。它位于潍县火车站东北5华里处，距潍县东关3华里的崎岖蜿蜒的虞河南岸。虞河有泉源，旱季亦不干枯，河床很宽很深，大雨后是波涛汹涌的大河，平时是清澈的小溪。当年没有污染，虞河里鱼、鳖、虾、蟹俱全，两岸风景秀丽，环境幽雅，很适宜办学校和医院。乐道院始建于1883年，义和团时期被焚毁；1902年重建，仿照欧洲古堡，墙高院深，里面各部门都有套院又像一座迷宫，因为建筑都是西洋式的，而且多数是楼房，故当地群众都叫它“洋楼”。广文大学迁走后，广文中学和小学及幼稚园已发展成为山东省的重点学校，还有一个设备先进的大医院及护士学校，以及妇女学道院和圣经学院等成人学校、外国教师和医护人员住宅及墓地等。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激烈，德国在欧洲先后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家。法国投降，英军被赶出西欧大陆。1941年6月，德军突然进攻苏联，兵临莫斯科城下；日本也越来越疯狂，已不再把美国放在眼里，竟不宣而战偷袭珍

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滕县，日军牧师和田强行接管了华北神学院；烟台美国长老会办的毓璜顶医院及护士学校亦被日军接管；潍县乐道院以圣经学院名义上课的广文中、小学被迫解散；医院被勒令停诊。

改建集中营经过及日宪兵队长兽行

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略军偷袭珍珠港，一举歼灭了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海军主力，美、英两国才对日本宣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当时在珍珠港的日本侨民中有不少间谍，利用酒吧、舞厅和妓院等窃取美军重要机密。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化装渔民先潜入珍珠港，进行偷袭。美国上下都恨透了日本人，害怕在美国各地的日本侨民也给日军提供情报。美国政府将侨居在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的6万多日本侨民，秘密集中到洛杉矶附近指定地区，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不能再传送情报。故日军也采取同样办法进行报复，将侨居在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上的美、英等国侨民也都隔离、关押起来。因中国各地都有抗日活动，日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关押，只好先在各地就近关押。后来，选中了潍县乐道院，将医院和学校改建，日军称“敌国人民生活所”，简称C. A. C，而我国群众都叫做“外国侨民集中营”。

1941年底，驻潍县地区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指挥一中队伪军将乐道院包围，伪军中队长刘锡赞守在大门，汤本率一小队宪兵进驻乐道院。这时医院刚把住院病人都打发走，医护人员从此失业，大家分了点剩余物资。女护士魏希劳分到毛毯等物，晚走一步，与汤本相遇。她当时年仅18岁，见到杀气腾腾的武装宪兵，吓得返身往回跑。汤本见魏年轻漂亮皮肤白嫩、顿时兽性大发。这时乐道院已变为集中营，与外界隔绝，由汤本主宰一切，哪里还有什么顾忌？汤本紧跟在魏后面，把她堵在美国医生梅仁德

的厨师李长安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剥光魏的衣裤，将其强奸。当时魏希芳已精疲力竭，吓得瘫软如泥，不敢抗拒。事后，汤本宣典见魏希芳像羔羊一样温顺可欺，想长期占有她，便施展怀柔手段收买魏的心，说自己是日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尚未结婚，恳求魏原谅他的粗暴并嫁给他。可悲的是魏希芳也有封建宿命思想，认为生米已成熟饭不能再嫁别人，竟以为这也是天意不可违抗，于是逆来顺受，任由汤本继续长期玩弄（日本投降后魏希芳死于肺结核，没有子女后代）。可耻的是她父亲在传教时公然宣扬日本侵略中国是上帝的旨意，不但不为女儿受辱抗争，反要女儿遵从神的安排，顺从汤本认贼作夫，且放任儿子魏汉兴当汉奸，依仗汤本的势力，残害乡里，敲诈勒索，强奸妇女，绑架杀人，无恶不做，民愤极大（日本投降前，魏汉兴也死于肺结核）。

日本宪兵和伪军进驻后，把原来住在里面的学校和医院工作人员及家属全部赶走，一个不留。他们又从四乡抓来大批民夫，突击施工，先将大院墙里外的树木砍伐光，将各部门的套院墙及门楼拆除，只留西南角原外国人住的小院（日本看守居住）。他们利用拆墙的砖石和砍伐的木料修筑许多碉堡，并在大院墙外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建一座高大碉堡，碉堡上都有探照灯和机枪、小炮等武器，四面围墙顶上都架设电网。院墙里面沿墙修成环墙马路，路里边还有一道铁丝网，防止外国侨民接近围墙外逃。

原来的学生宿舍都是青砖铺地，全都被改成木板地，和日本住宅一样。外国侨民都睡在地上，有的教室和会议室等大房间也用木板隔成小间，房间里都有放物品的木架。而且所有街区和房间都被编号，一所教学育人的优美学校就变成一座阴森恐怖的集中营。但是，这许多变化外面却看不大出来。四周墙头上的电网并不显眼，很像原来的铁丝网；碉堡只露出顶部，很像原来的天文台；大门没有改动，门楣上依旧是原来的乐道院巨匾；白天大门仍不关，里面的甬道依旧绿树成荫；大门口虽不准行人停留，却不见持枪的明岗，只是原先大门外的旅店、饭店和杂货铺都歇业

了，小商小贩也不见了，显得有些冷清；唯有西北角必经之路旁的高大碉堡较为显眼。但当年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碉堡林立，大城镇附近更多，很难发现这里竟是中国境内关押多数外国侨民的最大集中营。集中营建成后，日本宪兵撤走，改由日本高等警署少尉以上警官看守。

鲜为人知的外国侨民集中营真相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多年，资源消耗殆尽，对富有的美、英等国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发动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便将美、英等国在华的银行、烟草公司和石油公司等全部接管，最初只将美、英籍的经营者驱逐回国；后来为了报复美国对日本侨民的封锁，匆忙将各地的外国侨民就近集中，临时关押（青岛地区的外国侨民都关押在江苏路湖南路口），一律都佩戴臂章（美国人戴 A 字，英国人戴 B 字）。最初，各地情况不同：北京司徒雷登被软禁；烟台的外国侨民被游街；有的被拘捕、被抄家或遭殴打。半年多后，他们始被陆续押往潍县集中营。一批批外国侨民像牲畜一样被关进轮船的货舱或火车的闷罐车厢，日夜兼程，中途换车也不停留，到潍县火车站立即被赶上汽车，由小路径直开进乐道院集中营。这次先后将 1500 多外国侨民都关押进去，行动很诡秘。美、英及我国情报组织一时竟未察觉。

被关押的外国侨民多数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知名的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 (Jaegner) 亦称基格神父，华北神学院长赫士博士夫妇及该院教授道雅伯夫妇、申乐道夫妇和毛克礼夫妇，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及内科主任高爱瑞教授、梅凯兰女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及该校的几位教授，中国出生的辅仁大学附中美籍教师恒安石 (Arthur William Hummel)，奥运会 400 米冠军、天津出生的英籍教师埃里克·利迪尔 (即李达，世界著名影片《火焰战车》描写的原型) 青岛颐中烟草



潍县乐道院外国侨民集中营外观



李达被群众抬着



乘火车遣返的外国侨民



芝罘学校某班师生合影

公司英籍经理韦伯 (Webb)，潍县二十里堡烟草公司职员、英国海军退役军官狄兰 (Lawrance Tipton)，英籍内地会牧师戴存仁，天主教英籍神父艾文德，青岛滋美洋行 (中美冷库) 美籍经理尺滋美曼，以及加入英、美国籍的中国人 (如青岛崇德中学学生陈阴森，父亲是医生，加入美国籍，全家被关押)，还有基督教救世军的管乐队和天津歌舞团的外国乐手，以及内地会为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子女办的芝罘学校的全体师生等。

抗战后期，意大利投降、德国战败，两国在中国的侨民也被关押进去。日本人怕美、英侨民多欺压意、德侨民，便隔离关押。唯有法国在珍珠港事件前已投降德国，便不是日本的敌国，后来法国流亡政府虽又参加了对德作战，但法国侨民竟得以幸免。

由于 6 万多日本侨民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很好，只是与外界隔绝并不受虐待，所以日本法西斯对待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也较为人道，不敢像德国在欧洲的集中营那样，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屠杀，也没有活剥人皮等残酷的暴行。这不是日本法西斯仁慈，而是怕美国报复。被关押的外国侨民并不知底细，有的目睹过南京日军的大屠杀和轮奸妇女的兽行；有的见过日本侵略军的“三光战绩”；没有人相信日看守的甜言蜜语，都认为落入与世隔绝的集中营里，随时可能被迫自掘墓穴就地处决，虽然胜利有希望，但疯狂的日军失败前可能奸杀泄愤。在集中营里，人们饥饿难忍，不久就将饿毙。人们在面对死神的绝境里，经受着考验。

(一) 集中营的囚禁生活和看管情况

集中营里允许外国侨民携带自己的财物，但因仓促集中不知目的地和关押期限，实际只能携带随身衣物和生活用品（大部财物丢弃），房间里除墙上备有放物品的木架外没有家具，只好用装衣物的箱柜当桌椅。多数人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有家眷的一家人住一小间学生宿舍；单身男女集体住教室或会议室大房间；芝罘中小学的 327 名学生，男女生分住几间教室，简陋的床铺间隔仅一尺。外国侨民都穿自己的衣服，芝罘学校学生都穿校服，唯

一标志是胸前都有一个明显的布符号，上面有被囚人的号码（无姓名）、国籍和住区及房间编号。布符号必须时刻佩戴在胸前。

集中营的生活像兵营一样。清晨听到钟声起床，紧张地梳洗后分别到三处食堂去吃早餐。饭后收拾房间洗地板，然后教徒做早祷，学生自习。点名的钟声一响，所有囚徒都必须停止一切活动，快步到操场集合，按住区分六队在固定的地方排好队，各队的值日看守到队前点名，囚徒用日语依次报自己的号码，经看守核对名册，有时看守还要讲话或宣布事情，点名时间拖得很长。盛夏热不可耐，隆冬严寒难忍，天真无邪的孩子却习以为常，趁机打闹游戏并不以为苦。钟声再敲响时，人们才得散去。这是集中营的头等大事，不论刮风还是下雨雪每天都要点名。

集中营里严格规定人人都必须劳动。有专长的则充当面包师、厨师、鞋匠、锅炉工、修理工、洗补衣工、打水员（将井水打入蓄水池）及医护工作等。除年近 90 体弱多病的戴存仁和赫士博士外，其他人不论男女老少，不管是贵族、官员、专家、学者、富商还是贫民、乞丐、妓女都得工作。大家轮流帮厨、洗菜、烧火、做煤球、清除粪便垃圾、打扫卫生等。芝罘中小学和成人学校按时上课（但课余时间仍须补上分担的工作）。

集中营里有一座面包房、三个厨房和一个给老人和病号做饭的小灶。每家（或一室）还有自砌的小炉灶，可以自己烧开水、煮咖啡或做供应以外的小吃。冬季还分配取暖的铁炉子并供应煤粉，自己做煤球烧。集中营里还有洗衣房、修鞋室、锅炉房及淋浴设备；也有医院、手术室、化验室和病房等（都是原广文中学和教会医院残存的设施），医疗器械残缺不全，尤缺特效药物。

晚饭后自由活动、散步、游戏或排练节目、赛球。天黑以后活动进入高潮，教堂和几座饭厅里都挤满了人，唱诗歌、跳舞、演话剧、游戏比赛、开辩论会；最后教徒做晚祷。入寝钟声敲响后必须回各自的房间上床，不准再在别处逗留（如有人不回，同室的人要报告看守）。

星期天除照常点名外，不劳动，各教派分别去教堂做礼拜。早上天主教做弥撒；点名后，圣公会各教派联合做礼拜；晚祷多唱诗歌。每过年和圣诞节、复活节也是只点名不劳动，天不亮就开始进行各种纪念庆祝活动，一直到晚上欢乐不息。婚礼和葬礼也按各国及教派风俗和习惯举行，日本看守并不干涉，但要事先报告并在看守参加监视下进行。如赫士博士和李达的葬礼，由牧师主持仪式，学生组成仪仗队，生前友好抬棺，乐队一路吹奏哀乐，全营外国侨民都参加，和大人物出殡一样，特别是李达，因葬在集中营墙外，格外引人注意。

囚徒与看守日夜在一起生活三年多，囚徒经常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在旁监视的看守也不禁和囚徒一起拍手叫好；有时看守和囚徒还进行球赛或摔跤。日伪军练刺杀时，外国孩子也兴致勃勃地围观。每逢日军长官来视察，都要一群日本小孩列队相迎。训练有素的小学生，目不斜视，腰板挺直，先行注目礼，然后用日语报数：“依儿、泥、散、席、告……”

日本看守对待违犯集中营规的外国侨民，一般都不殴打，不用刑罚，最重的处罚是关禁闭（如某神父用衣物与营外换食品就被罚关禁闭，神父乘机作祷告，并不以为苦），但是日本看守对中国人却极其残忍凶狠，如一中国临时工偷带信件，便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来，随后失踪，再也不见了。

（二）集中营里的食品供应及物品交换

集中营的粮食等主要食品都实行配给、定量和日军侵占的中国城镇居民一样，少得不足以维持生命的最低营养。初期，配给的粮食中面粉还比较多，自己烤面包吃尚能半饱，配给的粗粮除高粱外，还有玉米和绿豆等杂粮，用白菜煮玉米糊（外侨戏称潍县乐）还有营养，偶尔还配给少量花生油和花生。有人带着磨花生酱的手摇小机器，大家争借，用花生磨酱吃。集中营里没有糖和乳制品，但代用咖啡和茶都不缺；茄子等蔬菜敞开供应；还供应老骡肉，只是暖季总是长满了蛆，骡肝呈黑色，但实在饿得不

行，只好闭着眼吃。这些食品的价格都比市场上高得多，不能讨价还价。

1943年，因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美国空军在印度和中国及太平洋上的马列阿纳岛建成基地，开始轰炸日本本土。这时老骡肉也不见了，面粉配给量减至不足两成，绿豆和玉米等杂粮都不见了，只有发霉的高粱，虫屎、泥沙不除就由蚨丰磨坊加工成高粱面（由原广文中学学生葛文奎送往集中营）。这种霉高粱面不能烤面包，只能煮粥或加在白菜、茄子汤里充饥，甚至将陈腐的面包渣浸泡后再加高粱面煮成面糊吃，连过去丢弃的碎蛋壳也烤焦磨成粉吃。由于长期饥饿营养不良，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都明显地憔悴消瘦，很多原来体重200多磅的壮汉只剩下百余磅，不少成年人体重减到不能再减的80磅，都体力枯竭，精神麻木；孩子们的牙齿失去光泽；已发育成熟的青春少女月经停止；很多人已奄奄一息。

集中营里有个物品交换所，大家可以公开交换物品。囚徒都是用衣物换食品，故食品最昂贵，如慕马快乐用一套最好的衣服只换一小听炼乳，在与世隔绝的集中营里，外侨都快饿死了，哪来的食品？不言而喻，食品是看守的专利。另外，还有一条秘密渠道，通过附近的中国居民偷着代买，暗中在约定的地方从墙上抛进食品来。有人为了赚钱铤而走险，在电网上放木板像杂技演员那样带食品越墙而入。上圩河青年韩祥第二次越墙不慎失足，触电网，电死在墙头。日本看守故意拖延半天不收尸，意在示众。

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把衣物都用来换了食物。很多人最后只剩下身上穿的破衣服，夏季男人多数袒胸赤膊，穿短裤；妇女的衣裙只能补了再补，仅能遮体。男女都缺鞋，只好留着鞋冬天穿，春、夏、秋季都赤脚和野人一样（日本投降后，外国侨民获救，欢喜若狂，许多青年人光着脚跑到城里，在闹市区乱闯，旁若无人）。

集中营里最困难的是芝罘学校300多名学生。他们全都常年

寄宿，除了两套校服以外，没有任何衣物可以换食品，而且小孩子活泼爱动，衣鞋破得特别快，身体也发育很快，衣鞋破了可以补了再补，但小了只能给更小的孩子穿。老师们便用毯子等为大孩子改制衣裤，收集过去弃置的碎蛋壳加工给学生吃，以补充钙质。

（三）运粪人偷送信广文校友营救外国侨民

封锁严密的集中营与外界完全隔绝，不准任何人出入，但1500多外国侨民及看守和卫兵的粪便垃圾很多，不准囚徒往外运送，看守和卫兵又不屑为囚徒运送，只好仍由原先承包的中国人张兴泰父子及帮工进内清除。张兴泰是东邻李家庄贫农，全家6口只有4分河滩地，经厨师刘玉瑾向外国人推荐承包了学校和医院的粪便垃圾。日本看守见张兴泰和长子锡武、次子锡志、帮工刘相增都很忠厚老实，便很放心。

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多数是在中国传教办学的，其中以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办的齐鲁、金陵、东吴、燕京和华北神学院等大学及中小学教师和医护人员为数最多，影响最大，而且有很多人曾在乐道院工作多年，如赫士博士、德位思，他们都熟悉这里的情况，认识附近的居民（很多人是他们的学生），因而赫士和德位思被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尊为首领。在乐道院混饭吃的运粪人张兴泰也认识他们，并且像圣贤一样尊敬他们，甘愿为救助他们而赴汤蹈火。

有一天，德位思求张兴泰带信给原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黄是德位思任广文大学校长时毕业的学生），说明集中营里饥饿难忍，急需食品和药物的严重情况，请求黄乐德募集一笔钱送交中立国使馆，由中立国出面代购食品和药物，援救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黄乐德见信后先请张兴泰带千元伪币给德位思应急，随后到处募捐，但当时经过6年战乱，附近居民吃糠菜度日，原来办实业致富的都已破产或逃亡，众教友虽倾力捐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黄乐德实在没有办法，便通过原护士学校校长尹连登

向张天佐募捐（护校停办后，尹回昌乐县在张办的学校里任教）；亦请寿光籍教师向张景月募集。当时二张都拥兵 2 万多，他们办的学校里，在校学生就有 4000 多人。在民族危亡时期，他们坚持办学育人，对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很大。最初，二张都不肯多出钱救助外国侨民，经陈说利害关系，并说明集中营里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许多要人后，终于说服了他们。张天佐捐款最多；张景月仅次，加上群众的零星捐献，共计 30 万伪币（当时折合美金 10 余万元），分三次送交瑞士使馆。第一次是黄乐德女儿黄瑞云（曾在山东医大附院化验室工作，现已退休）送去的，后两次是黄乐德次子黄安慰（曾在青岛照相机厂工作，现已退休）送的。瑞士使馆一面用捐款买食品、药物送集中营，一面与美、英政府联系，由瑞士驻上海总领使馆派艾格（EGGER）为驻山东代表，在青岛沂水路原美国领事馆办公，原美国领事馆翻译李成美给艾格当助手，并雇用 4 名白俄女士充秘书和打字员等职，专门负责按时供应集中营食品、营养品及药品，费用由美、英两国政府提供。由于及时得到营养食品和药物，集中营里 1500 多外国侨民得救了。他们被囚禁的三年多时间里，仅死 3 人。

（四）恒安石和狄兰越营及神秘电台真相

1944 年 6 月 10 日，上午点名时，气氛与平时大不相同。日本看守叫、喊、怒、骂，军犬全都放出来到处搜寻，按照名单查问一遍又一遍，终于查明，有两人逃离集中营。日伪军犬领路追捕也没抓到；与出逃者同房间的 9 名单身汉，被关在教堂里严加拷问；集中营附近的中国居民亦遭株连；尤其是原广文中学和教会医院的人，多被抓去刑讯追查。校长黄乐德当时不在家，次子黄安慰被抓去拷问。幸亏，黄安慰这时已是日军牧师和田接管的华北神学院学生，有学生证，又会讲日语，才当夜被释放。事后，日本看守在集中营墙里加挖一道深沟，并加装一道电网，还在虞河下游筑土坝提高水位形成护城河，河南岸亦装一道电网（同年秋季大雨，河水暴涨，将土坝冲毁电网冲走，后无力再修复），看管

更加严密，点名时要点两遍。

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人，一叫狄兰，是退役的英国海军上尉，30多岁，当过报务员；另一人是美籍教师恒安石，20岁（系中国出生，1981至198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两人都会说中国话，平时穿中国衣服推光头，早已做好外逃准备。5月中旬，他们就通过雷振远和德位思求张兴泰，替他们与附近的中国抗日游击队联系。

女教友杨瑞兰是昌邑县南乡杨家楼人，在饮马教会小学毕业后嫁了人，因不堪虐待而离异，只好到乐道院谋生。乐道院成了集中营后，她走投无路与王绍文同居。王是个花花公子，上过教会学校，会讲英语，能说会道，因好吃懒做、抽大烟，家境败落。张兴泰等人找到由昌邑南乡来潍县不久的杨瑞兰教友，请她与家乡的游击队联系，杨不敢应，王绍文却自告奋勇前往，冒充牧师，且胡吹他夫妻二人常进集中营传教，认识里面给外国人做饭的刘玉瑾等人。当时，控制昌邑县南乡的是苏鲁战区第四纵队（1944年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司令王尚志自封为国民党嫡系，目空一切。他拥有1万多人枪及简陋的兵工厂。这个厂只能造手榴弹和土枪，不会制造机枪等重武器。他对营救外国人毫无兴趣。多亏王绍文善于看风使舵，当即投其所好说：“要外逃的外国人会制造机枪。”王尚志信以为真，当即决定6月9日派特务队长杨子明率侦察队前去接应。王绍文回到乐道院，通过张兴泰转告恒安石和狄兰说：“已与游击队联系好，6月9日天黑以后游击队带着马来接你们，天不亮就到游击队驻地。”恒和狄事先与同室难友商量好，看守追查时都说：“入睡后二人才出逃的，都没发觉。”其实，他俩长期观察早已掌握了卫兵的活动规律，每天晚上按时换班，交接时总是两班卫兵共同巡视围墙一周，需时10分钟。这时电网停电（指示灯不亮）以清除电网上的异物，日本看守以为这时天黑不久，两班卫兵共同巡视，万无一失。

6月9日这天恰好是月黑天，在两班卫兵会合去巡查围墙时，三条黑影便敏捷地溜近围墙根，在墙角的一堆砖上放置木凳，身

高两米的托米·魏德蹲在上面当人梯；狄兰和恒安石站在托米肩上越墙而出，接着托米把两人的随身行李扔出去。为了保护仍留在集中营里的托米，关于越营的具体细节恒和狄一直保密，对游击队的人说：“当时没找到电网剪断处，是从阴沟里爬出来的。”

两人越墙逃出集中营后，在墙外百余米一座坟头背后略事喘息，回头见碉堡上卫兵在吸烟，说明未被发觉。他们按约定地点与张兴泰和王绍文会见。这时，还不到约定时间，游击队接应的人没赶到，但不敢停留，便由王绍文带路向东奔逃。再说杨子明率侦察小队按时到集中营外接应，这时夜深人静，听到里面巡逻队的脚步声，误认为已被发觉，吓得慌忙撤退，一路小跑，在玉米地里追上狄兰等三人。他们互相听到脚步声，经盘问无误后，遂同返第十五纵队总部——平度县孙正村。

这期间风云变幻，5月26日，王尚志因轻敌被日军俘虏，关押在青岛，改由副司令王豫民代理第十五纵队司令。他接见三人后，始知恒安石和狄兰根本不会制造机枪，却因收容两个外国人遭日军多次围剿，处境险恶，故对王绍文说谎骗人深为不满。

王绍文又自报奋勇去四川，给恒安石和狄兰向美、英使馆送信，并替王豫民向中国政府报功请赏。又多亏王绍文能说会道，竟说服了王豫民出路费并派副官李丰年同去。前任参谋长李子廉也乘机要去大后方，说找他清华大学的老师翁文灏，替第十五纵队报功请赏。

王绍文三人历尽艰险，先后到达重庆。李子廉自去投翁文灏；王绍文和李丰年找到美国使馆，交上恒安石的信。不久，援华美军总部，给第十五纵队一批机枪、弹药等武器及药品，还有1亿元法币和一台收发报机（包括手摇发电机及密码本等），指示恒安石可就地参加中国的抗日游击队，并带给恒一些生活费。王绍文也得到不少酬金。美军派一架飞机夜间将两人及12个降落伞的物资空投回昌邑南乡。跳伞时，王绍文不敢跳被踢下飞机，随风飘到华东第九纵队阎柯卿部控制地区。落地时多处擦伤，吓得昏迷

过去。第十五纵队得到收发报机后，由狄兰操纵向重庆发过两次报，手摇发电机和收发报机就先后被日军抄去。因遭日军多次围剿，当地军民伤亡很大。

恒安石和狄兰在第十五纵队呆了一年多，住在当地老乡家倍受照顾，与老乡情同亲人。他们吃的虽比士兵略好，也仅一样素菜，只额外多一份香烟、茶叶和糖果。俩人每天读书看报，跑步锻炼，经常到干训班和四维中学去与师生闲谈、打球或下棋。他俩和干训班的教官郝毓秀（黄埔军校毕业，现住昌邑县龙池乡岱邱村）交情很深，无话不说。恒任驻华大使期间曾多次去看望过郝，并合影留念。

1945年夏，恒安石和狄兰发现王豫民多次派主力支队长姚轻耘（现住青岛市）等人去青岛，在日军医院面见王尚志，与日军谈判投降条件（谈妥不久，日军释放了王尚志并派人来收编第十五纵队，王豫民又反水杀了日军派来的人）。恒安石和狄兰怕被二王出卖再被抓回集中营，曾留信，不辞而别，准备到昌邑北乡去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恰遇潍河水突然暴涨，无法囚渡，两人被迫返回第十五纵队。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恒安石和狄兰随王明义部返回潍县，曾回乐道院集中营与难友欢聚，并和帮助他们越营的雷振远神父、难友托米及运粪人张兴泰等人合影留念。后来，两人还到渴望已久的解放区参观过，受到张爱萍将军亲切接见。狄兰回国后，又到印度经商，曾写长篇回忆文章详细记述这一段传奇式经历。恒安石先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据说曾赠给四维中学1万元美金，四维中学校长佟秀廷收到钱时学校已停办，便将钱交给名誉校董王豫民。

集中营里盛传有个神秘的电台，传说电台是用竹木造的，任何探测器都找不到，日本看守曾用尽一切办法侦察过，始终未能侦破，故更增加了神秘性，被传得神乎其神。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电台，更没有什么神秘之处。集中营里能和外面经常保持联系，

最主要的是当地群众都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而对集中营里面的外国侨民却情同亲人。因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创办乐道院学校和医院 60 多年以来，医院治病救人，学校育人成才，尤其是穷苦人可以免费就医上学，使当地群众与外国侨民息息相通，这种深情厚谊就是高墙深沟和电网警犬阻挡不住的无形电波。每天出入集中营运粪的张兴泰父子和帮工刘相增是“电台”的主力，临时出入集中营的劳工和良心未泯灭的伪军也是电台的成员，冒险闯入集中营交换食品的人，可以说是神秘电台的敢死队员。有趣的是，为宣传日军的“辉煌胜利”，在集中营里公开张贴的一份经过精心篡改的英文报纸（北京出版），反而成了神秘“电台”的官方通讯社。在日军夸耀其具体战果时，不断泄露战局真相，如在某海域或地区上空，击沉几艘军舰，打落几架飞机。从战场的不断变化证实，战争中心越来越接近日本本土。吉伯尔、马绍尔群岛，以至关岛、菲律宾岛、琉球岛等地的消息，证明日军不断吃败仗，最终失败已成定局。

1945 年 5 月初的一天午夜，外国侨民劳累了一天都已进入梦乡，突然钟楼顶上的巨钟轰响起来，集中营里面骚动起来，睡眼朦胧的囚徒边跑边穿衣服，匆忙集合好。日本看守持枪命令囚徒在黑暗中排好队，折腾了大半夜后，才知道是难友为庆祝战胜德国敲的钟。大家都兴奋得再也不能入睡，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只剩下日本还能支持多久？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不用问，胜利的消息来自神秘的“电台”。

（五）集中营里高水平的学校及成人教育

1881 年，“内地会”创始人英籍牧师戴德生，为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子女就近就学创办了内地会学校 (CIM School)，后来为纪念学校创始于烟台，改名芝罘学校 (Chefusian)。1941 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校舍被日本海军侵占，校长被捕，全校 327 名学生和全体教师，在烟台被囚禁 10 个月后，被押解到潍县乐道院集中营。芝罘学校是一所六年制小学和六年制中学连贯的学校，师生

全都住校。学生都是些正在发育的孩子，在集中营里由于长期饥饿营养不良都面黄肌瘦，但仍坚持刻苦学习，练习本用完了就用橡皮擦掉再写，周而复始直到纸破。老师要求学生每天都检查卫生，还要行得正、坐得直、目不斜视；既使饿极了，吃东西也不塞满口，咽下后再讲话；刀叉撞盘不出声，羹匙舀汤向外；说话要低声；逆境不抱怨；饥饿不争食；教育得每一个小学生都有自制力，能保持成熟、镇静、礼貌和文雅。同时，老师还按照英国最高的文化水平，即牛津标准，严格要求每一个学生。1943年8月，11名学习期满参加考试的学生全部及格；1944年秋，13名学习到期参加考试的学生也全部及格；唯有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集中营被解救，受胜利狂欢的影响，11名学习期满参加考试的学生，只有9名及格。胜利后，毕业生考卷送英国审核，经牛津大学认可颁发了毕业证书，可进入英国任何大学都免试；若不上大学可凭毕业证书就业。

集中营里有很多专家教授，在逆境中都镇静如常，继续钻研自己的专业，并帮助青年人在单调乏味的囚禁生活中不迷失方向，不丧失信心，为了将来的生活学习一技之长，学习谋生的本领及知识。集中营里还创设木工、会计、中文、日语、蒙文和俄语学习班，还办讲习会，讲授航海知识、美术理论、中外历史等专业课程。

（六）外国侨民的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和精神世界

外国侨民在集中营里的物质生活虽极其艰苦，但是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多彩，有许多使人难以置信的事迹。如一架弃置多年无法修理的破钢琴，竟被囚徒精心修好，成了交响乐团的门面和支柱。以基督教救世军的15人管乐队为主，加上天津歌舞团的木管乐组和业余大小提琴手，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管弦乐团，经常演奏令人振奋的乐曲和世界名曲，水平堪称一流。外国侨民都深信最后一定会胜利，必须准备庆祝胜利的乐曲。救世军铜管乐队在看守严密的监视下，每星期二晚上，都在修鞋室隔壁的陋室

里，秘密排练由中、美、英、苏四国国歌选段合编的新曲，混上一些教会颂曲如《基督精兵》、《上主的子民速奋起》、《共和国之战曲》等，使日本看守难以察觉。

集中营里有歌咏队，经常演唱诗歌、民谣、情歌和古典名歌曲如汉得尔的《弥赛亚》、孟得尔逊的《以利亚》和司泰奈的《十字苦架》等。还有一个由经验丰富的演员组成的话剧社，经常演出萧伯纳的《安德鲁克莱与狮子》等古典名剧，没有古骑士的服装就用罐头筒改制盔甲。他们经常组织各种舞会、音乐戏剧晚会和游戏比赛，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都有精彩的庆祝会。另外，还有人人都可参加的辩论会，更是别开生面，每晚都有专题讨论，其中参加人数最多，讨论时间最久、最热烈、最吸引人的是科学家和司天主教、基督教的神学家，关于上帝创造人和耶稣复活的论争。

一般医生都认为，长期饥饿营养严重不足的人，由粗劣食品吸收的热量还不足以勉强维持生命，绝对不能运动再消耗热量。但集中营里的医生却主张继续运动，认为运动虽然消耗热量却产生活力和新能量，故集中营里组织有垒球协会，下设天津虎队、北平黑豹队和神父队等，还有足、篮、排及曲棍球队，经常练习，不断比赛。妇女则多进行网球、羽毛球、跳绳、踢毽等运动。所有运动项目的组织者和主持人及各种球类等体育用品的修理，都是埃里克·利达尔（亦译李达），绰号苏格兰的飞毛腿，小学生都叫他艾瑞叔叔。他是1902年天津出生的英籍教师，1924年荣获奥运会400米金牌；他还是著名的橄榄球星，有一部描绘他前半生成就的世界著名影片《火焰战车》，把他的事迹戏剧化了，描写有些不实。例如他拒绝星期天出场参加比赛，就不是真实的。实际上，他从不摆架子、出风头，总是默默地埋头苦干，经常星期天组织体育活动和球类比赛，而且还给天津的学生讲授科学课，晚上还组织各种游戏比赛；另外，他还组织各种工作竞赛，如三个厨房比赛工作成绩和效率，结果总是他工作的厨房第一；集中营里臭

虫、苍蝇和老鼠太多，很容易传染疾病，而囚徒的身体又虚弱抵抗力差，李达便组织大家每周都晒被褥，发动小学生消灭臭虫，还组织灭蝇比赛。有一次，小学生约翰捕蝇 3500 只，得第一，红十字会奖给他一盒肉罐头（瑞士使馆驻青岛的办事处提供）。他还组织捕鼠比赛，也是学生夺冠获奖。

1945 年 2 月，因忘我工作，操劳过度，李达突患脑瘤病逝。全营囚徒无不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部学生组成仪仗队，众友轮流抬棺，乐队一路吹奏哀乐，送葬队伍走出集中营，葬在墙外（最近李达的亲人，按照他的遗愿要捐一座运动场和一些运动器械给该地学校）。

死在集中营里的还有赫士博士，他年近 90 岁，身患重病，在中国办学 62 年，德高望重，第一批交换战俘就让他回国，却被他婉言拒绝，硬是把生还的机会让给别人。他说：“我的志愿就是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这里就是我的故乡。”赫士死后的葬礼和李达同样隆重，葬在集中营内，原外国侨民墓地。另一位跳伞受致命重伤而死的美军飞行员也葬在墙外。

随着盟国军队逐渐取胜的好消息不断传来，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都感到面临死亡的威胁。人们担心等不到集中营被解救便会饿死；甚至有人听说日军连续吃败仗反而更加忧虑，担心他们狗急跳墙，施行奸杀泄忿，或以外国侨民为人质，阻挡盟军反攻，总之，凶多吉少，生还的可能性实在太小。这样严酷的现实对每一个外国侨民都是严峻的考验。有少数人绝望了，信心动摇了，个别人甚至完全丧失了信心，暗中偷情，寻求暂时的情欲之欢，麻醉自己。但大多数人都能泰然处之，坚信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如赫士博士则视死如归；芝罘学校师生更令人敬佩，300 多名师生人人都充满信心，刻苦学习，而且高标准严要求，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一大奇迹。

奇兵天降解救外国侨民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这一天特别热，暑假期间仍坚持学习的艺界学校师生也停课纳凉。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大家都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也有人惊恐万分，担心失败会使日本法西斯丧心病狂，对俘虏实施奸杀暴行。突然空中传来嗡嗡的飞机马达声，由远而近，接着天空出现一架巨型飞机（后来才知是由重庆起飞的美军B-24型轰炸机），在集中营上空盘旋，并逐渐降低了高度，机身上的美国标记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看到窗口有人向下招手。集中营里顿时沸腾了，人们跳跃着举手欢呼，早有几个年轻人爬上钟楼顶，将一面事先准备好的美国旗扯住四角平展开。飞机上的美军看清后，7名全副武装的美军纷纷跳伞，降落在乐道院大门外北方偏西不到一华里的玉米地里。住在附近的广文中学校友黄安慰躲在玉米地里抢拍下这一历史镜头。

这是一支经过各种训练的特种部队，人数虽少战斗力却很强，都身带多种武器，着陆后立即以战斗队形向乐道院集中营猛冲。这时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像狂魔似的向大门外跑去，高举双手呼喊着向前狂奔。有的摔倒了仍向前爬行；有人高兴得痛哭起来；有的哭喊哑了嗓子，欢狂得如醉如痴。集中营的看守和卫兵都吓傻了，哪里还敢阻拦？跑在前面的青年人一拥而上，将空降美军官兵高高举起，欢呼着抬回集中营。大门外高地上，救世军铜管乐队列队奏起《欢乐之日今来临》的胜利乐曲；当大队人群走到大门口时，乐队又改奏《星条旗之歌》，带队的美军少校司太格（Major Staiger）忙从抬他的人群肩上跳下来，其他美军官兵也纷纷跳下来立正行军礼，顿时全体肃立气氛庄严肃穆，奏完又改奏有中、美、英、苏四国国歌选段的新曲。乐声停息后，人们便互相拥抱、亲吻、饮泣不止，不分男女和国籍，甚至连围观的中国居民也掺和在一起，平时封建不习惯拥抱接吻的中国人竟也忘了羞怯。

飞机仍继续在上空盘旋未走，美军少校发出信号，飞机上又空投下电台、药品等急需物资。人群欢呼着向降落伞跑去。看热闹的中国居民也跟着一起跑，跑在最前面的中国男孩不知躲闪，被伞下的木箱砸伤了头骨，人们纷纷上前抬起受伤的孩子和空投的物资返回集中营。美军人员忙掏出急救包，集中营的医生给受伤的男孩缝合伤口，包扎好以后，孩子的父母也被找来，外国侨民代表说：“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刻，却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小兄弟是为了帮助我们受的伤，我们不但要给他治好伤而且还要供他上学，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去免费上大学。”但孩子的父母是忠厚老实的农民，说什么也不接受，推让再三只收下数百元钱了事。

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连夜开会，民主推选德位思、雷振远和惠廷三位美国人和英籍神父艾文德及空降美军司太格少校5人，组成管理委员会。聘请丁士修给司太格当翻译，黄安慰为采买，给外国侨民购买肉蛋等食品和日用品。

集中营结束后遣送各国侨民回国

囚禁生活结束后的第二天，在乐道院北大门外，虞河北岸原广文中学的运动场上，人们用白布摆成英文大字 DROPHERE，多架美军B-24型飞机，先投下一个机场卸货用的金属跳板，移到河上当桥，接着空投下大批物资，红、黄、兰、白、绿各色降落伞十分美丽壮观。空投连续几天，所投物资有乳制品、糖果、奶油、食油及各种罐头等食品和药物，也有衣服、皮鞋、香烟、火柴和牙膏等生活用品，还有儿童玩具等，最多的是美国政府为军队储备的定量军粮，全部以纸盒包装用腊密封，里面有特制的压缩饼干、肉罐头、奶酪罐头及香烟火柴等日用品。因空投的物资太多，尤其是食品，外国侨民根本吃不了，便连同降落伞一起送给附近居民。

日伪看守和卫兵溜走了。先进入潍县的山东第八行政公署专

员张天佐，抢先派一小队士兵到乐道院大门站岗维持秩序，不久撤走；英国盟军情报局也派中校军官（烟台出生的内地会马茂兰夫妇的次子，他姐姐慕马快乐一家也被关在里面）代表英国政府，由重庆乘飞机来潍县，慰问集中营里的英国侨民。这个英国代表团经西安飞返重庆时，不幸飞机失事全部遇难，后来遣送各国侨民的工作完全由美国承担。

组织指挥美军空降营救行动的万伯格（Colonel Weinberg 是美军驻重庆司令部的上校军官）由重庆到青岛主持遣返工作。他在瑞士使馆代表艾格和助手李成美协助下，在山海关路一号办公，在东海饭店办理护照签证手续。因当时民间海空运输尚未恢复，只好由美国军舰运送，所以经常有两艘美国军舰停泊在前海栈桥。

在集中营里经历三年多磨难的各国侨民，都想早日回国与亲人团聚，但因当时交通不便只能分期分批走。经过民主讨论决定，按姓名第一个字母的英文顺序走，先乘火车到青岛。不久，中国爆发内战，战火车不通，改用飞机，先用 B-24 型飞机在潍县二十里堡机场试着陆不成，改用小型运输机，往返多次才将 1500 多名外国侨民全部运送到青岛，住在东海饭店等处。办理护照手续后，陆续分乘舰船各自回国。

芝罘学校的 327 名学生，只有 30 多人毕业回国升学，少数人中途辍学被父母接走，还有多数学生要留在中国继续学习。原来烟台的校舍因在共产党控制区一时无法联系，而学生的父母几乎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只好暂时迁往上海借教会房舍复课。后因时局巨变迁往九龙。现在发展成为四所学校，分别在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发扬光荣传统，仍然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的牛津标准。

·文化史料·

我从事戏剧工作的经历

吴祖光

我从事戏剧工作是从看戏开始的。我生长在北京，首先在戏方面给我启蒙的是京剧，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土包子”，完全是土的，乡土的。我受西方、外国的影响比较少，当然我也读过莎士比亚、莫里哀这些西方大师的作品，但受他们的影响很少。真正受到影响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戏，尤其是京剧。第一次看京剧的情形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那时大概只有八九岁，但我仍旧想得起我父亲带着我去剧场的情景，一进剧场的门，看见两个小丑在表演，在台上翻了几个跟头我就笑起来了，哈哈大笑。结果笑得我父亲生气了，伸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我还是在笑，好像闻到了一种化学的“笑气”。一闻这种气，就笑个没完。我就是这么大笑不止，弄得全场观众都有意见了。这是第一个印象，至今不能忘记。后来就到了我念书的时期了，我有一段荒废了学业看戏的历史。

我念中学的时候，北京有一个老京剧科班叫“富连成社”。这“富连成社”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科班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演员，包括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也在这个科班学过戏。从这个科班里出来的演员相当多。譬如大家都知道马连良、谭富英，后来的袁世海、叶盛兰，这些人，都是富连成科班毕业的学生。这个科班的学生每一科都有相同的名字，每个名字头一个字都要用科班规定的字，科班规定的字是喜、连、富、盛、世、元、韵，就是第一科的学生名字都带喜字，第二科的学生都

带连字……比如第一科的雷喜福、第二科的马连良，第三科的谭富英……我倒觉得这种办法很有意思。这个看戏的地方叫广和楼，是富连成经常演出的场所。全国解放后，经过重建，改名为广和剧场。我看戏的30年代，它还是一个老式的剧场，北京的老式剧场在我念书的时候保留的还有一些，广和楼乃是其中的一个，地段很好，在前门大街东侧的小街肉市，这个剧场经过改建至今仍在原处，但已完全改观，名字改称广和剧场了。当年的广和楼在楼下座位的安置上和现在的剧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的剧场一般都不会例外，都像我们坐在这个大厅里一样，我这里就是舞台，同志们坐的就是观众席，观众都是面对着舞台。但当年的广和楼跟现在的坐法不一样。它是用很多方桌子拼起来就成为一条一条的长桌子。从台口起一直摆到后墙，大概有三四排这样的长桌。观众是用长板凳坐在桌子的两边。所以楼下的观众都是侧面对着舞台，要看演员便得侧转身子，北京观众一向把看戏叫做“听戏”也许是这个原故。确实有些老年的行家观众他主要不是看，而是听。所以中国的戏曲，就拿京剧来说，最大的演员，第一流的演员都是真正的歌唱家，是以唱为主的演员。为什么要摆几排的桌子呢？因为桌子要摆茶壶、茶杯、瓜子、花生、糖果。观众一边喝茶，一边吃零食，一边休息，一边来听戏。这种演剧的方式似乎表现为对演员的极不尊重，但却又是考验演员的极好方式；一场真正的好戏，几个真正的好演员，一句唱、一句话、一个身段、一招一式就能把观众吸引过来，把扰扰攘攘的一堂观众给安静下来，乖乖地看戏。一些有经验的观众，甚至是闭着眼睛听戏的，他主要的不是看，而是听。我没这么老的资格，我是个要看的，我的位子在楼上。楼上跟现在的剧场差不多。没有茶喝，没有东西吃，就是看戏。当时我看戏是一种非法活动，每天下午逃学，不上课，家里也不知道，老师和父母都得瞒着。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每天中午回家吃完午饭，背着书包去上课。其实不是上课，而是到广和楼去看戏。我不能跟家里人多要钱，所以我坐

的位子都是最便宜的位子。这个位子在什么地方呢？说出来大家也是出乎意料的。这个位子是在楼座的最前端，一直顶到了舞台的后部。我这个位子呢，就是在这儿，人家管这位子叫“倒关”。其实呢，“关”可以改成“观”，就是倒过来看戏。“倒关”的座位最便宜，所以我每次买这个位子，这位子虽然不好，但日子一长呢，“倒关”的优越性就出现了。我们写戏的人要知道观众的心理，一般的观众看完戏就算了，但他如果是一个经常看戏的观众，他就会逐渐产生一个愿望，他除了看戏，还想认识演员，千方百计地想和演员作朋友。这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愿望，所以，我也不例外。我有个同学是编戏剧小报的，他编的这种报当然跟名演员都熟悉，所以我就通过他认识了不少我已熟知的演员。坐在这个位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它离演员最近。演员在台上有的时候会转过身来，那时候的戏跟现在的话剧、现在的戏曲不一样：那时演员在台上非常自由，还可以“饮场”。老一点的观众都知道，这“饮场”就是有一个跟包的，托着一块手巾，拿着一个小茶壶，或者一碗水在旁边伺候着，假如台上有两个演员，这个演员唱的时候，那个演员干什么都可以，跟包递水给他喝也行，给他整理衣服也行。所以，他回头的时候就能看见你，甚至用眼睛跟你打个招呼。而这时作为我突然成为一个特殊的观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种特殊的待遇，给了我特殊的满足，是任何观众都得不到的。所以这个“倒关”呢，优越性第一就在这儿，这是大家难于想象的。另外呢，看了几次“倒关”后就有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广和楼是一个木结构的剧场经过年长日久，也不知道起的化学变化，还是物理变化，反正是木头一干，木头就缩起来，原来是拼缝的木头裂开，裂成了不止一个大缝。从木缝处可以看见大部分后台，后台的活动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所以这“倒关”啊，观众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好处。对我说来，不要看戏，只凭这个剧场本身就具巨大的魅力，因为戏剧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非常魅力的艺术。富连成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他们每天

一定要到广和楼演日场。富连成的社址在热闹的前门西边的虎坊桥，广和楼的戏每天中午 12 点一过就开锣了。每天上午 10 点钟，100 多大大小小的演员就列队走向剧场，绝大多数都是没毕业的学生，小的 10 来岁，大的十五六岁，都是男孩子，没的女孩子，他们穿过大街小巷步行到广和楼。这群孩子都是一色灰布长衫黑马褂，全都剃光头，就跟《少林寺》一样。一群小和尚，由老师带着队，浩浩荡荡缓步前进。一到这时，前门大街的商店伙计都出来了，路上行人也都驻足而观，叫“看过大队”，而且指指点点，“哎，这个袁世海，那个叶盛兰，那个是高盛麟……”都是人们熟悉的名字。富连成社不单有舞台上的节目，吸引人精采节目之一是每天早晨在前门大街上看“过大队”。这足以说明戏剧的魅力如此。以上说的是我“入戏”的开头。等会儿我还要说由于看戏而得到的具体收获。这是我在中学时期看戏的经历。

1936 年，我接受了一个邀请，到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工作。那年我 19 岁，我的工作是校长室的秘书。校长余上沅是我的亲戚，他是中国话剧运动早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也做出很大成绩的一个老专家。是美国留学生，终生从事话剧事业，培养出很多学生，成为后来中国戏剧、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我去南京戏校工作不到半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我原计划工作一年半载仍回北平去上大学的，计划不能实现了。

淞沪战起，我只能跟随国立剧专向内地搬迁。留在南京的几个月当中，我看了当时学校演的一些话剧，如曹禺的《日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奥赛罗》……

剧专内迁的第一站是湖南长沙。我到了长沙之后，接到了我父亲从湖北武昌寄给我的一个材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英勇抗战、壮烈牺牲的材料。当时东北有一个“青年铁血军”，是包括一些由东北大学的学生组织的一支抗日队伍，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艰苦顽强的斗争，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人俘虏。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坚不投降，宁死不屈，而被日

本人杀害了。我父亲吴景洲是一个文人，他作了一辈子的官，但他最喜爱的却是作诗、写字、画画、刻图章和鉴赏文物，所以我继承了他的传统，也有了这一点“文艺细胞”。他把这个材料寄给我，信上说：“你可以写这个剧本。”于是我凭着戏剧学校半年的熏陶，和过去看过半年京剧的基础，并且找到一本当时出版的叫作《义勇军》的小册子，里面记载了一些东北抗战的英雄人物的材料，写了我第一个话剧剧本《凤凰城》，主题是抗日，是爱国主义。写成之后，正好戏校的毕业生成立了一个校友剧团，要举行一次演出，就把我这个剧本拿去演出了。演出之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主要的原因是结合当时的形势，此外是情节曲折，人物各具特色，富有传奇性。当然里面有很多编造的东西，也不免有很多陈旧的东西。譬如剧中苗可秀带着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名叫张生，一直忠心耿耿，随他抗日，到他牺牲。这个张生随侍在侧，形影不离，这其实就是旧戏曲里公子和书童的关系，完全是看京戏受到的感染，我把他写在抗日英雄身上了。大概那时候观众的思想水平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他们看了这个戏后觉得很熟悉，很亲切。我在剧场看到许多观众激动得直流眼泪。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写了这么个剧本，真真假假，但它配合了当时的抗日情绪，在舞台上演出得到了成功。据我所知，当年在前线、后方大量上演，而且在香港也演出了。后来，国立剧专再次演出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由四个大导演联合排这个戏，四幕戏一人排一幕，这四个导演是曹禺、佐临、丹尼（佐临的夫人）和阎哲吾。所以说一个剧作者有时候要靠一点运气，我的运气不错，第一个戏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样我就从此以编剧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第二个戏呢，是 1939 年写的。那时国立剧专已经由长沙、再迁重庆，三迁江安。江安是长江边上、重庆上游的一个小县城。县城极小，一共就四条街：东街、西街、北街、南街。每个街头都是城门洞，人们说从东门可以扔个烧饼一直扔到西门，就这么小

的一个城，但是非常安静。日本飞机无论如何不会来炸这个小城的，我的第二个戏是在江安写的。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依据的材料是宋史的《文天祥传》和文天祥本人的诗集《指南录》。《正气歌》的规模就比较大了，年代的跨度也比较大。写这戏我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国立剧专能演，看来演不了，因为这个戏人物也比较多，场景也比较多。在江安的物质条件是绝对不可能演出的。那时，远处华东的上海已形成了一个孤岛，上海被日本包围了，但上海的租界，日本还没有打进去，暗地里还有各种抗日活动，和外地也还能够通信通邮。我的剧本只要写好了，就寄到上海，由当时在上海从事戏剧工作的喜剧作家李健吾代我经营。李健吾先生是著名的喜剧作家，又是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专家。那时上海有一个叫《剧场艺术》的刊物，正在举行剧本评奖，李先生把这个剧本送去应征，大概是为了鼓励新人吧，我得了个一等奖。接着就在上海演出。最轰轰烈烈的演出就在上海。

当时文天祥扮演者是由三个演员轮流演。因为天天上演，负担太重。这三个演员是石挥、张伐和白沉。后来他们告诉我，因为天天演，一连演，演期超过了半年，服装都穿旧了，再做新的。这样第二个剧本我又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在后方重庆，大约是在1941年的时候才演，是由陈鲤庭导演的。主演的是魏鹤龄。

我的头两个剧本的写作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动力就是爱国主义、民族感情。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中国，从我懂事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始终是处于被异族侵略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异族的侵略，另一方面，就是军阀的横行，民不聊生。我记得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进军北京的时候，北伐军的队伍开进了北京城。我至今记得那一天我母亲说的一句话。那时我很小，但是这一句话我一直记着，那时我母亲还是年轻的少妇，她才30来岁。那天她高高兴兴地从外面回家来，她说：“我看见刚进城来的军队了，买东西还给钱呢。”她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新进入北京的军队，一个普通战士，买东西居然还给钱。那就说明过去军阀队伍

买东西是不给钱的，就像日本人坐车不给钱似的，你向他要钱，要急了他还打你，而中国老百姓都是忍气吞声的。假如反抗，只有吃更大的亏，倒更大的霉。这种奴隶生活，在我年轻的时代，是普遍现象。抗战一开始，中国人的心情不用说是多么的愉快了，所以很自然的我写的头两个戏，都是写民族感情的，写爱国主义的。在这之后我写了一个独幕剧《孩子军》，也是写的抗日题材，是一个儿童剧。下面我谈谈我写的第四个剧本《风雪夜归人》的情况。

《风雪夜归人》是在 1942 年写的，但是我想写这个戏比较早还是我在国立剧专工作的时候。国立剧专是在南京创办的，由于抗战的原因，从 1937 年起，第一站搬到长沙，第二站搬到重庆，这时还保留了一种优越的条件，就是长沙和重庆都有大学，都还可以请到一些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到中国戏剧学校来兼课，后来搬到了小城江安就没这个条件了。这时余校长就把我叫去，说：“祖光，你兼点课吧。”我说：“兼什么课？”他说：“教国语发音。”我没想到，这口北京话也值钱了。当时招来的学生确实也是南腔北调，这个“国语”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于是这门功课就自然落到我的头上，教北京话有什么不可以呢，会点拼音就行了。所以我就毫不客气地教“国语发音”了。那时我的年纪小，所以有很多学生都比我大。我们的校长得寸进尺，过了不到一两个月，他说：“祖光你再加一门课吧。”教什么呢？教“国文”——那时叫“国文”，现时叫“语文”，这是由于消灭大汉族主义的不合理现象而做的改正——教国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困难，于是我又教了国文。可是再过不久，余校长又来了，说你再加一门，教一门“文艺概论”。“文艺概论”是什么连我都不太清楚。那怎么办呢？因为是长者，他说话带点命令性，同时我自己也的确想多长点本事，于是我就到图书馆去找书。居然被我找到了一本《文艺概论》，我就拿了这本书去教“文艺概论”。可能那时学生好说话，不像现在那么难对付。你讲什么他们都听，也没有发生纠葛，所以我就又教起了“文艺概论”。谁知不久，他又来了，他说你再加一门，教

“中国戏剧史”。这就更离谱了，真使我目瞪口呆。但反正有“文艺概论”之前例，我就胆大妄为地教了起来，当然首先还是到图书馆找书，结果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本是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剧史》。仗着我的口齿清楚，也能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我讲到清朝末年，有一个秦腔的演员，名字叫魏长生，这个演员在当时红极一时，迷住了很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为魏长生的声色所倾倒，是那时风靡朝野的名演员。但他老年的时候，晚景凄凉，非常悲惨，虽然已经声败色衰，还得在台上卖命。一次上台表演他年轻时的拿手戏《背娃入府》后，下场即死去，死后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这种情况在旧社会不稀罕。在课堂上讲魏长生的事迹之后，我忽然想起学生时代在广和楼看戏的情况，回忆中有两件事。我说过看戏的人看到一定程度就想和演员交朋友，我那时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唱花旦的，名叫刘盛连。他唱戏不像一般的男旦逼成女声小噪，而是用他的自然声，演刁妇、泼妇，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都演得非常精采。我是一心一意地跟他做朋友，我曾经约他到我们家来，只告诉母亲说这是同学，母亲非常高兴地做菜给他吃，虽然后来被母亲发现他是演员。有一次，在演戏前我跟他约好，散戏后在剧场门口见面，一同出去走走。散戏后他刚刚走出来就有一群街头的流浪儿把刘盛连包围住了。他们用一些最下流、最难听的话骂他、羞辱他，因为他演过一些坏女人。等到我把这群孩子轰走以后，看见刘盛连满面流泪。这使我完全惊呆了，只好说：“别理他们，别难过。”别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只感觉到做朋友无能为力，他没理我，掉头就回家了。我也带着一种非常阴沉的情绪回了家，久久难以平静。另一件事就是我前面提过的看后台。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乐趣，我常常在看戏的当中扒在木板墙缝处看后台。但有一天看后台看出了一场祸事。那天台上演的是一个小丑和小旦的戏，那个小丑只有十一二岁，完全是一个孩子。脸上画了一个小豆腐块，演得非常好，不时引起观众的哈哈笑声。戏

演到中途，他下场时，正好我扒在壁缝看后台，见到他刚进后台，他的师傅不由分说，上去就打了他两个耳光，打得非常狠。当时这孩子就流泪哭了起来，还没有哭出声来，师傅用手一指，孩子就用袖子擦擦眼泪，不敢哭了，紧接着催场锣鼓二次上场，又是满面笑脸继续演戏，台下观众继续哄笑，谁也不知道后台刚刚发生一场祸事。作为一个小孩演员，要做到上面这一点需要多大的克制自己感情的力量呀！又需要具有多么强烈和庄严的责任感呀！直到现在，这情景依然如在眼前，永远也忘不了。这两件事长时间引起我的思考，我想，生活真是复杂，人活着也真是不容易。另外对于是非的观念——同样一个人，一件事物，有的人肯定、赞美、喜欢，以至崇拜，有的人却否定、蔑视乃至仇视它。同一个人，由于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他的价值也会改变……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什么是真正的卑贱？根据这些想法就写了《风雪夜归人》。

曾经有年轻的观众带着迷惘的神情来问我剧本要表达什么东西，我说实在没什么东西，我不像当代的一些大师学贯中西，深不可测。我只是自己摸索，自己试着爬行，把自己的一些混乱思想写出来与广大青年朋友共同研讨。朋友们越是认真，越是开心，就越使我从内心感觉惭愧。所以说《风雪夜归人》也只是抒发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当时年轻幼稚的产物。因为幼稚，所以一些问题得不到解答，写出来可以和观众一起思考。这个剧本我着力写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曾经熟悉过的戏子，一个是妓女出生的姨太太。这两个人的品质、性格、身分里面包括了双重性质：一方面是豪门贵妇、艺坛红伶，博得人人称羡，但她们实际又是别人的玩物，出身卑贱给人看不起。但是，生活里人人都认为最卑贱、最为人不齿的人却有着高贵的品质，而有些身居高位，受人尊敬的人，却是品质低劣。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会有，是一个具有长远生命力的主题。我在《风雪夜归人》40年代初版出书时，在扉页上引了丹麦伟大作家安徒生的四句诗：

“高贵和光荣埋在尘埃里，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显出来的；这是一个极平凡的故事，但这些语句是一天天重复着说的。”所以戏的开头我就说：这是高贵蒙受着耻辱的时代，是黄金埋没在泥沙里的年代。因为这个时代过去还不久，也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这个戏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大概这就是今天出现在舞台上还会引起许多共鸣的原因，但却是我预料不到的。

《凤求凰》在我的创作中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奉命写作的，在这以前我大都是写我自己要写的题材，很少奉命写作。因此开始“奉命写戏”时兴趣不高。向我交代任务的是当时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他说他也是奉命，奉谁的命我没有问他。他传达写戏的理由是：我们的历史题材，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卓文君是两千年以来，头一个敢于蔑视封建礼教，追求恋爱自主，争取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中豪杰。在戏剧方面应该大书而特书。接受任务之后，我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我知道过去荀慧生就演过这出戏，而且我还看过。我也知道，前人写过不少这个题材的戏曲剧本。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让我再写一遍呢？那么事先就必须做一些深入了解的工作。我首先去查一下中国戏剧史。我发现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故事写成的剧本从元曲开始，到明清传奇，再到中华民国，直到解放前，也就是我接受任务之前，我数了数，加起来竟有将近 40 个剧本之多。这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震动！这完全使我出乎预料，几百年有这么多的剧作家拿这个题材来写戏。所以第一步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读读这些剧本，我就尽可能找到这些剧本读，大概读了 20 多个剧本。当时我想，假如能发现一个好剧本，那我就不必写了，修改修改，能演就行了。但看下来我很失望，竟没有一个剧本是理想的。后来我想，有一种剧本我可能还没有看到，就是川剧。川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剧种，有很多非常好的、高水平的剧本，我希望在川剧中发现理想的本子。而且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都是四川人，是本乡本土的大

人物。通过中央文化部从四川寄来了两个手抄本，我非常高兴地用一宿功夫把两个剧本看完了。但是读完后又是失望，这两个剧本用油腔滑调的态度来写戏，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手法来对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对才子佳人，这绝对不行。这两个人的恋爱是非常严肃的恋爱，不同于一般的一见倾心，私订终身。所以看完两个川剧剧本后，我才死了这条心。但在这几十个剧本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剧本，这个剧本不是戏曲剧本，而是一个话剧剧本，作者是郭沫若。郭老曾经写过中国历史上三个叛逆女性，其中之一就是卓文君。卓文君是叛变她的阶级约束，追求恋爱婚姻自主的一个女性。“再嫁不必从父”是郭老剧本的主题，这和我的想法一致。为什么过去那么多戏我都不满意呢？我的记忆力不怎么好了，但是留下了一个普遍印象，就是他们在处理卓文君这个人物时，都尽力回避了卓文君的寡妇身分，绝大多数的戏都是写卓文君“未嫁而寡”。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又得到了一个旁证，就是我们的封建意识不是那么轻易能从人们的脑中消除的。剧本为什么都这么写，因为未嫁而寡就说明卓文君一身清白，卓文君只是一个闺阁幼女，她还没有结过婚，因此，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好像这么处理她就特别洁白，特别可爱。其实这种想法十分封建庸俗。

写《凤求凰》戏曲本，我下了最大的苦功。到现在为止，我写了40来个剧本，其中最用功的就是《凤求凰》。

《凤求凰》写成于1962年，当时计划由李少春和杜近芳扮演两个主要角色。李少春多次来找过我，谈他的一些设想，杜近芳也在准备学习古琴的弹奏，但是不久江青搞起了所谓的“京剧革命”，历史题材都被扼杀舞台，而少春则被迫害致病不治而死。留下永远的遗憾……。

我的求学之路

张志公

张志公先生乃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编辑家；亦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及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座教授、北京语言学会会长等职。本文主要介绍他早年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的情况以及最终选定语言学为主攻目标的原因。

小学——念书和玩，老师和同学

1918年11月，我在北京诞生。在一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的家庭中孤独地成长。但我的父母却是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多，从河北省沧州地区南皮县跑到北京来谋生的。当时，清政府迫于形势，设立了一批“洋学堂”。官宦人家的子弟都不肯去念。为了招徕学生，给予优厚待遇：免费，发给制服和书籍。每月还发给生活补助费，足够养活一两口家属。父亲就进了其中之一：测绘学堂，嗣又升入高等测绘学堂，学测量和数学。我就生活在这个小家庭里。父亲学的颇精。奇怪的是，我的算术偏偏不开窍，一直到五六岁，连极简单的计算和算术题都应付不了。

此后，父亲被派到东北沈阳工作。我与父母同住的院子，只有三家人，虽然宽绰，却无玩伴，就连左邻右舍也找不到一个同我年岁相仿的孩子。环境把我造就成一个不会说话、害怕说话的孩子。记得那时家中来客，我必溜之乎也。语言，同样不开窍。父母为生了这么个笨孩子很着急。

7岁开始就读于沈阳第四小学，不久又转到第一小学。大约读到二三年级时，级任（班主任）韩老师指定我当班长，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因为那时我极少跟别人说话，更不与别人玩！这如何能当一班班长！但韩老师对我说：你功课好、品行好，同学们都能佩服你，当吧，他们会支持你的，有问题来找我。在他的鼓励下，我答应了。由此与同学们慢慢地熟了，也玩到一起了。

不久，韩老师又指定我为班级代表，在学校举行的演讲会上讲话。我又是害怕。韩老师循循善诱地说，演讲，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口齿清楚，而这正是你的长处，何不尝试一下呢？他亲自帮我选题、修改讲稿，我终于鼓足勇气上台了。没想到，演讲比赛我得到名次，还得了奖品。

经过这两件事，我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遇事总是畏畏缩缩的，慢慢变得比较开朗了。就在此时，韩老师又交给我一个更重的任务，让我在学校排演的《麻雀与小孩》那个儿童歌舞剧中，扮演其中的小孩！他说，你不用担心，剧中的小孩舞、跳都极少、极简单，只要活泼自然，表现出对小麻雀的喜爱、同情就行。你本来就很自然，一举一动孩子气很足，不会有什问题。这第一次的上台演戏，让我刻骨铭心。前几年看电影《城南旧事》时看到演唱《麻雀与小孩》的片段，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到现在我仍记得这个小孩的全部唱词。

从语言木讷到与语言终生结缘，这不能不说韩老师的教诲是个关键。有了他的教育才有了我的改变。现在回想起来，我才理解，这位教师深懂儿童心理学，注意随时抓住学生的某个优点来鼓励他，扬其长，补其短，让他建立自信心，决不一味批评他没

出息，打击他，增长他的自卑感。就这样，韩老师利用各种机会从积极方面矫正了我的缺陷。他不愧是真正掌握了儿童心理学的好老师。到今天我都记得他，不光姓氏（小学低年级的老师，我记得姓氏的没有几位），还有他的音容笑貌。前年上海《语文学习》编辑部采访我，要我谈一位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小学韩老师。”说也奇怪，我语言上开了窍，数学也开了窍，高小、初中、高中，在班上一路领先。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使我明白，孩子们在某方面开窍有早有晚，智力是有发展变化过程的。从很小的年纪，一次考试的成败定终身，不是办法。

还有一位老师，我的印象也很深，是我读三或四年级时教作文课的，姓什么不记得了。作文，他从不允许我们动笔之前先打草稿。他要求，看到作文题目，用脑子想，把主要内容，主要脉络想清楚了，下笔就写，一气呵成。回过头来，仔细看看，非删不可的删掉，非加不可的加上，非改不可的改一改。“打草稿其实是鼓励人优柔寡断，而作文的目的是要训练人的头脑清晰、反应迅捷。因此，凡是一挥而就后修改，卷面有些不洁的我决不扣分！”他这样说。当时，这位老师常常称赞我作文手快，能够一气呵成。由于他的教诲，我自小学始，中学、大学，作文从不起稿，一直到当老师，上课只有个简单提纲，从不写讲稿。打腹稿是相当吃力的，但只要腹稿打得好，讲起来效果十有八九不会失败。最大的好处在于，讲起课来能观察听讲人的神情，便于和他们的感情交流，或者说，接受他们听讲时反馈的信息，随时改善自己的讲法，以至增减内容，最低限度不会使自己所讲的对听者太不适应，以至把他们讲睡着了。不过，不写讲稿也有缺点。首先是，讲过就完了，有点什么该保存的东西留不住。其次，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有时显得有点草率。几十年来，我即席讲话没怎么失过言，但是讲得不顺畅、不周全、分寸不大合适的情况还是时常有的。

不少的启迪，还来自同学。我的性格发生变化后，与同学接触渐多。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其中很多是小市民阶层的。比

如有个同学家长是说书的，有次他带我去听《封神榜》，我一下子就入了迷。于是自己开始苦苦攒钱，买了部《封神榜》读起来。父亲是测量员，整天到处跑，有次回家发现了这部书，他说，这书不好，给拿走了，换给我他自己看过的一部《清史通俗演义》。可我却觉得他的书没趣儿，虽然也将就看了，还得另外找别的书看。父亲发现我这么爱看书，索性发个狠从并不富裕的工资（当时叫作“薪水”）中拿钱为我订了《小朋友》、《儿童世界》等，我于是从书中读到了很多引人入胜的东西。近年眼睛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不常看电视。前些天，播放电视连续剧《封神榜》，我看了一部分，好些情节依稀还记得。《雍正皇帝》也看了一部分，情节似乎跟我看过的《清史通俗演义》不大一样。看后颇有些感触。不论这两部书本身如何，反正是它们诱发了我广泛阅读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得感谢它们。今天的孩子们比我的少年时代幸福多了，也聪明多了，他们有那么多好书可看。不过从现代少年儿童的需要来讲，现在提供给孩子们的读物还是很不够的。

这里要插说一下高小的学校情况。高小的刘校长和教国文与英文的赵老师，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开明、先进的。他们认为课本里的东西太少，也没多大意思，于是提倡大量读课外书。学校经费有限，刘校长家里有钱，他从家里拿些钱来给学校买了不少书，主要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学作品，像冰心的《寄小读者》；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叶绍钧的《稻草人》、《倪焕之》、《城中》；鲁迅的《呐喊》、《彷徨》、《华盖集》等等，还从杂志、文集中选了好多篇文章，油印发给学生，像王统照、许地山、朱自清等人的文章。记不很全了，总之，夹七杂八读了大量的东西，有的懂、有的不全懂、有的很难懂。然而，读书的兴趣更浓了。奇怪的是，那两位老师并不怎么提倡读章回小说，如《水浒》等。那些书倒是上了初中甚至高中才读的。

另外一个同学家是演皮影戏的，我同他看了皮影戏，就学着动手做皮影人，皮子买不起，就用厚纸和腊，先把厚纸剪刻成皮

影人，涂些腊在上面，用热烙铁一烫，腊化成油，渗透厚纸，和真的皮影人一样。我做过曹操、猴子等等，都很像，到后来几乎做什么像什么了。

有一位姓陶的同学，大楷写得好，他交的习字作业常常被“留成绩”，挂在教室墙上的玻璃框里供同学们观赏参考。他写的是颜体，临摹颜真卿的《双鹤铭》，的确不错。我本来学柳体，临摹柳公权的《玄秘塔》。见了颜体字，觉得笔画圆润而又粗壮有力，“鹅头勾”之类的笔法很好玩，于是从此改学颜体。随后进了高小，前边说过的那位刘校长善书（也能画），他写的是赵体行书，也写草书，我又跟着学起来。所以从小就写杂了，什么体都没学好，一直是信手涂鸦，不成体。如今老了，腕底无力，手也不稳，写得更不像样了。但我一直喜欢看字，对篆、隶、楷、行、草诸体以至“瘦金”、“馆阁”之类，粗知一二，追本溯源，是陶同学诱使我入门的。

这位陶同学家住郊区，环境开阔空旷，所以他喜欢玩郊野的玩艺儿，一是捉蟋蟀（沈阳也叫蛐蛐儿），二是放风筝。他常约我到他家去玩。捉蟋蟀是在秋天，放风筝是在春天，不冷不热，正是好玩的季节，所以他每约，我必去。从他那里我对这两宗玩法很学到一些本事。别看是玩，这里边可有不少学问，现在要我说也还能说上一大套呢！

我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我从不在家埋头死抠功课。我觉得广泛的爱好，各式各样的玩，对我很有好处。好好玩，并不耽误念书，相反，倒会提高念书的效率。后来慢慢懂得，正当的玩，能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和敏捷度，以及毅力和信心。我国很多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同志，恐怕至今还没有好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小学生让作业压得抬不起头来，每天甚至要熬到 10 点至 11 点，没有时间玩，也不太会玩，有点空闲常常是瞎打乱闹。这哪行！要让孩子玩，并且要教会孩子玩。我就鼓励我的孙女学钢琴，她 5 岁开始学，11 年没间断，每天至少要练一个小时，并

没影响她的功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门功课都很好。她现在是班上的文体委员，专门组织同学们一起玩。

我也有遗憾，因为是独子，父母一直不许我游泳。等我长大了，离开父母了，想学已经太晚了。我在体育运动方面有不少强项，游泳却成了缺门。

中学——为文先理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到河北省立第一中学、后改称天津中学读初中。现在这所学校改为天津第三中学。毕业后，随家到河南开封读高中。

真是幸运。上初中时，遇上了那么些好老师。有位孙彤阶老师，既能教古文，也能教历史、地理，还能教植物学，真是一位全才。他教地理的时候，上课时先一笔画成个“秋海棠叶”，加上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就成了一幅中国地图。然后随讲随在图上画出所讲的山脉、湖泊、城市等，使你印象特别深刻，上完课都记住了，考的时候几乎无需复习。数学老师教小代数，讲得很精练，一堂课他说不了几句话，大部分时间是带领学生操作，不仅要求准确，还要求速度。当时用的是推拉黑板，老师在这一板上写题目，写满，推上去，在另一板上写，写满推上去，把前一板拉下来，就把题目擦掉了。所以必须聚精会神紧紧跟着做，稍一走神就跟不上了。因而学得很熟练，很扎实，那时学的分解因式我现在拿起来就能教。他的教法的特点是：在训练学生解题能力的同时，锻炼学生们如何全神贯注。教生理卫生的老师是位名医，讲课没有一句废话；教英语的老师口语好得很。他们的课教得非常出色，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并且影响到我的一生的工作习惯等等方面。

在初中念了不少文言文。教初一的国文老师，据说是进士出身，坚决主张念文言文，写文言文。有人交白话文的作文，他总

是说：“我不懂，请交胡适先生批改。”一年之内，我读了《古文观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要求《四书》要全背。他讲的很少，更没有“分析”，只选讲一小部分示范，讲得很简要，其余的要学生们自己去读。江希张著的《四书白话解》、《古文观止》也只选讲一部分。初二时的国文老师是专攻词学的，整整一年，我们完全读词，偶尔加写文章或诗。这位老师在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李清照改嫁考》，也油印了分发给我们读，另外还要我们读赵景琛的《中国文学小史》等书。我现在能背的词几乎是那时背下来的。我并不认为这些办法都很好，比如一年完全念文言文，一年完全念词，不是好办法。不过要学什么就需要一定的量。东一点西一点，蜻蜓点水，恐怕也有毛病。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初中学校有个很大的阅览室，《东方》、《新中华》、《生活》、《科学世界》、《科学画报》等种种杂志相当全，另外还有许多报纸。我只要有空就钻阅览室，连下课 10 分钟的时间也不放过。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强烈地吸引着我。于是，自己攒钱买书的愿望也更强了。《辞源》当时有甲、乙、丙、丁、戊几种，甲种版本最大，戊种最小，我就倾己所有买了一部戊种版本，大概也就比巴掌略大吧！上下两册，它跟了我几十年，颠沛流离，所有年轻时的东西早就丢光了，唯独朝夕相伴的这两小本《辞源》尚在，恐怕已经成了孤本或珍本，现已传给我儿子，成了传家宝。

为了买书，我每个星期日都跑旧书店。旧书店集中在法租界的劝业场和天祥市场，都是好几层的大商场，相离不远，各有一层专卖旧书。从我们学校到那儿，必得通过日租界，每路过那儿，便提心吊胆，经常被日本巡捕（警察）拦腰一抱，强行搜身一通。这就是半殖民地中的全殖民地！恐惧、屈辱之感极深，为了书，我不退却，每周照常。

河南开封高中的校长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学生，颇有蔡元培之风，主张兼收并蓄。他认为高中是一个人读书的最好时期，

要博览群书。加上在这所学校任教的绝大多数是北大毕业生，就更形成了读书的风气。国文课指定的课外阅读书有《曾文正公日记/家书》、《饮冰室文集》、《胡适文存》，教历史的老师让我们读《古史辨》、《竹书纪年》；教英语的老师让读了《伊尔文见闻杂记》，这本书相当深，但是很有意思，还有语法书《英文典大全》，以及《莎氏乐府本事》等。

有一位教“公民”课的马老师，他从来不照课本讲，总是离开课本大讲西方的社会思想史那一类的内容，什么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孟德斯鸠、卢梭的自由、平等、博爱说等等，都讲到了，只避开在当时最忌讳的马克思主义，三言两语带过去，不敢多讲。同学们都听得很有兴趣，人人也看了不少他所讲到的书（图书馆里都有。那个学校的图书馆，在当时称得起是藏书丰富的）。

从二年级，我开始投入演戏的活动中。先演南国社的戏，如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后又演抗日短剧、街头剧，如《烙痕》、《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等。在这些戏里，我演主角。演京戏时，就由老师演主角，我给跑龙套了。比如，有位老师会唱老旦，演《吊金龟》，我就给他演张义。

此时，我还成了运动员。田径之外，强项是打球，什么网球、篮球、排球都喜欢。一米八的个头，在当时是第一流的高个子，打篮球是好中锋。可惜投球不够准，近距离还可以，但中远距离都不行。怎么办？只好玩命练。中午同学睡觉，我去投篮，有时候有位姓纪的球友陪我一起练，一投就是几十几百个。后来居然成了一个像样的中锋，中距离接球就投，相当准。另外，篮下翻身投篮也很拿手。打球使我养成了凡事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拼命的认真脾气。一个篮球队，必须团结合作得好，若是你埋怨我，我责备你，或者不顾全局，光想个人出风头，那就非输不可。打球要有打球的风格，自己尽量不侵人犯规，对人要能忍让，要有毅

力，有气度，沉着，镇静，不论输赢，一直认真拼搏到最后一秒钟。打球受到的锻炼是多方面的。

高中二年级实行文理分科。我的选择出乎父母、老师和同学们的意料。

从小学、初中以来好些位老师的影响，中、外、古、今书籍的涉猎，注定我喜欢文科胜于理科。而到了高二文理分科时，我却偏偏选择了理科班。我的想法是，高中毕业考大学时肯定进文科，多半是进中文系或外语系，到那时候，就没有机会再顾及理科了，而小学、初中学的那点数理化等知识，将来不论做什么都是不够用的。要在高中抓紧时间多学点儿，这就是我“为文先理”的观点。

这个学校办法是，一方面分了文理科，同时又设了几门高标准的选修课，文科的是两门外语课，《英文名著选读》、《高等英文文法与修辞》；理科的是物理、化学两门高级实验课，一般的实验课照做，选修课做的是高难度的实验，另外还开了一门钢琴课，选修。每个学生任选，文科生也可以选理科的选修课，理科生也可以选文科的。选修课用的时间并不多，每周两节，只是内容深，要求高。我把两门英语课都选了，实验课只选了化学的（因为理科物理课本用的是《达夫物理》，已经够深了）。选钢琴课的只有几个人，我也选了。上了一个月，老师说，学钢琴要从几岁就开始，高中才开始太晚了，随而我就停止了。就这样，总算跟钢琴沾了一下边，沾沾边也有好处，后来听肖邦、贝多芬等，多多少少能听出点味儿了。

大学——由中大而金大，由文学而语言

高中毕业了，考大学的日子到了。

考试前，我请教父亲学什么，父亲希望我学医或学工，因为实用而稳当。他说，他是个技术人员，本希望我也学工程技术，或

者学医，不过我喜欢文科，兴趣、能力都在这方面，考工科、医科都会考不取的，就报文科吧！我说，我固然喜欢文，但你担心我考不上理工科我却不服气。于是，我决定考给他看看。我参加了南方四大学的联合招生，被录取在中央大学化工系，念了一年之后才转到外语系。

一进中大，我们一些战地去的同学就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我担任宣传组干事，时常组织同学演些宣传抗日救亡的短剧，在学校里演，也到校外居民区或工厂去演。这段期间过去之后，索性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大剧社”，开始演多幕剧，第一个戏演的是田汉的《回春之曲》，接着几个同学自编了一出《大青山》，也都是抗日题材的。此后停顿了一小段，后改名“中大戏剧学会”，连续排演了曹禺的三个剧本《雷雨》、《日出》、《原野》。于是在学校里出了名，同学们戏称为“曹剧团”，称我们这帮搞戏剧的为“中大艺人”。在《雷雨》里我演周朴园，在《原野》里我演仇虎。这两个角色，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不大愿意演，也不大会演的，因而只得我来演，因为我是负责人，别人不愿干的事儿，我当然得干。作为一个大学生的业余戏剧团体，演出还算成功。《雷雨》是在学校里演的，《原野》是在当时的大学所在地——重庆市内租来的剧场演的。不管在哪儿，都是满座。那时候，换布景都是很陈旧的办法，因而很慢，每个戏都演到午夜，然而观众竟绝少中途退席的。从演这些戏，我体会到，文艺工作不容易，演戏更不容易。不过，为要演戏，看了不少戏剧方面的书。恰巧外语系开设了一门《戏剧》课，我选了。另外还有一门《莎士比亚》课。听教授讲讲，总有所得。同时也读了一些剧本，有希腊悲剧；易卜生几个剧本，如《玩偶家庭》、《社会支柱》、《国民公敌》、《娜拉》等；莫里哀几个剧本；莎士比亚几个剧本，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凯撒》、《哈姆雷特》、《麦克白》、《威尼斯商人》、《错中错》等。我自己也试写过一个史可法故事的剧本《梅花岭》。那一阵子，我真的有点想干戏剧这一行了。

在中大外语系，读书多，英文诗、小说、各国名著选读、英国文学史等课，都要求读不少东西。不过没有锻炼口语的机会。教授都是中国人，虽然他们都是英、美留学生，英语说得很好，但是平日不说，上课也不说，只有那位教《诗》的女教授有时说一点。我们同学们自己组织过一个小俱乐部，想练习说话，没人指导，搞了几次就吹了。

第二外语我学的法语，学得不多，总算入了门。

那时候，大学实行学分制，大概要 130 个学分毕业。必修课并不太多，选修学分不少，几乎是对半的样子。你要选什么课，只要系主任同意，任课教授接受，就可以选。我选修过《中国文学史》、《唐宋传奇选读》、《世界通史》、《社会学》、《美学》、《国际公法》、《国际政治地理》，旁听过《心理学》，很杂。此外还加上自己看些小说（新、旧都看），旧小说看得多些，像《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儿女英雄传》，以至《三侠五义》、《绿野仙踪》等，都是这个时期看的。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看书很杂，到了大学选课杂，还看许多小说。于是“杂”成了我的特点。读大学，又是演戏，又是看小说，还加上多了两样玩艺儿，下棋和打桥牌，这些都是很费时间的。但是，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并不怎么好，心里总有郁闷感。闹来闹去，重庆一带流行的两种病——生疥疮和发虐疾（打摆子）都来了，还加上一段很重的痢疾，搞得狼狈不堪。彼时正是三年级下学期之末，就要期考，眼看参加不成，经与学校商量，学校要我暂时休学。

离开学校之后，在先期毕业、已经工作的同学家里休养了一阵，随后教了一段中学，恰逢金陵大学（原在南京，抗战迁至成都，是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大学）招考新学生，我报名应考。

那时各大学绝少招新学生的。成都原有一所教会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从外地又迁来四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通称金女大）、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共五所教会大学。当地

原本还有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国立大学——四川大学。一个城市搞了这么多所大学，生源必然不足。金陵大学于是试图招考点新生，弥补弥补。

他们对转学生要求很严格。考转学，首先要同新生一起参加入学考试，也就是要考高中学的全部课程，这叫“初试”。这一下，我当年“为文先理”的办法可起了作用了。我在高中进了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些课学得扎实，否则，荒废了三年，说一声“考”，岂不抓瞎！我匆匆准备了三天就应试，不久收到通知，“初试”合格，到外语系去参加“复试”，即专业考试。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我在中大先读了一年化工系，只有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等几门公共必修课的学分算数，其余工科必修的基础课，如微积分、基本物理、基本化学等好些门的学分就不算数了。再加我在中大三年级下学期没参加期考，没得学分，所以复试后把我编在三年级上学期，实际上我又读了两年半才读够了学分，毕业。换言之，我读大学总共读了五年半（那时的学制是四年）：中大三年，化工系一年，外语系二年，金大外语系二年半。在中大外语系，我读的书不少，但总有些飘，不扎实，在金大外语系的时间长于中大，而且读得集中、扎实。

在金大外语系，读书并不比中大少。每门课，除了课上讲的以外，教授指定的课后自读、定期交读书报告的很多。例如小说课，教授上一课，讲点概论性的内容，一下子就指定五六本小说，要求在两个星期内读完，写出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很重要，要算成绩的。像这种课有时同时开的有两门甚至三门，那真够呛，两个星期要读十来本书，都是像《骄傲与偏见》（类似巴金先生的《家》）那种分量、那种难度的，就只好拼命赶着看。另外，看书还得会跳读，有些部分只能大致溜一下，跳过去，否则根本读不完，紧张极了。那时书少，教授指定的每种书，图书馆里只有一本，同学们自动组织起来，把指定的几种或十几种书一起借出来，由一位同学集中保管，列出名单和时间表，依次轮流借看，所以

谁也不能把书在手里多放几小时，到了时间就得传出去。好在这种专业课的学生不多，少则三五人，再多也超不出 10 个人。所以还勉强传得过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进了金大跟到了外国差不多，一切布告、通知、说明等等，统统是英文的。外籍教授很多，在校园里，耳朵里经常听到的是英语，自己也得经常说，比如见了外国教授总得打个招呼，有时候碰上爱聊天的教授，还得站住聊几句。学校里有教堂，有唱诗班，经常有活动，无论是不是教徒，都可以参加。外语系更不必说了，教授上课完全说英语，讨论、问答、谈话也全是英语，连两位任教的中国教授亦然。最初，我很不适应。说，常常是“肚里有，嘴上说不出”。听，一是他们说得快，跟不上，再则，外国人也往往各有各的口音，多数是美国人，说美国英语，另有一位加拿大人，一位英国人，他们说的英语跟美国人说的就不大一样。有一位教诗的年长的女教授，她讲话听起来很吃力。还有一位女教授，美籍，有博士学位，教戏剧和作文，课讲得很好，人很活跃，精干而热情，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快捷，走路、写字、说话，什么都快。她说话很好听，也好懂，就是太快，让你的耳朵忙不过来。有一位中国男教授看我口语不行，挖苦过我，弄得我心里挺别扭。但入学一两个月之后就慢慢适应。一个学期过了一半的光景就完全适应了。回顾我自己学英语的历程，觉得得益于三方面。第一，起步早，从小学就开始学。第二，初中，高中、中大，所遇教师都好。虽然对口语训练有所忽视，但诱导读书多。看来多读些书，头脑里装的语言材料多些，到了英语环境中，口语是不难跟上去的。在这中间，初中老师教得好，要求严格，从而学得扎实，起的作用最大。小学开个头，做点准备，打基础主要是在初中，基础打好了，跑上去就容易了。第三，最后进了金大，听、说、读、写一起来，猛攻了一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中大那一小段，我自己懈怠了一些。

念金大可不容易。教会学校处处都讲钱。学杂费收得高。每

学期开学报到，迟到一天罚款若干；在图书馆借书，晚还一天罚款若干；就连考试的卷子也得付钱买。总之，无一不是钱。像我这样漂泊无依的穷学生，实在是念不起这种学校的，我是硬着头皮强撑。入学不久，我即囊中羞涩，闹起金钱“饥荒”。那时我与同学、教师都还不熟，没法求他们帮忙，于是只好走了一条路：进当铺。我离开家进中大的时候，父母看到当时的中国大地动荡不安，做了失去联系的准备，为我准备的衣服很齐全。在中大时，战区的学生（叫作“流亡学生”）都发“贷金”（这是我们的学生自治会闹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补助费，虽叫作“贷”，却是有借无还的），勉强可维持起码的生活，那时家里也还能接济，所以生活问题还不大。中大的后期，特别是进了金大之后，果然断了联系，父母他们自己也是颠沛流离。金大那时还没有“贷金”。生活过不下去了，我就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衣服；夏天，当冬天的衣服，用当来的钱再把夏天的衣服赎出来。这样“周而复始”一阵，钱当然越来越少，很快就出现当进去，到时候赎不起的情况，结果过期不赎，当铺扣了衣服，这叫作“死当”。靠当衣服过日子、上大学，那是什么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过了一年左右，和系里的教师、同学都熟了，他们逐渐了解了我的困难。那时，英语教师不足，系里就把我介绍到金大附中去兼少量的课，又到华西高中，即华西大学附中兼点课，收入虽少，却勉强可以对付了。以后又在华西大学的“比较文化研究所”当秘书，做打字、查找资料等辅助性工作。这样又对付了年把。兼了工作虽然多少影响点功课，但是一边学，一边用，也有好处。在那两所学校兼课是很不容易的。学生们知道了我自己也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时，就有点不服气。这促使我上课前备课十分认真。我心里很明白，上课用英文讲，一点差错都出不得，他们那么挑剔，万一抓出点毛病就没法下台了。这种锻炼于我也是很有益处的。稍后，有个比较固定的工作，日子就好过多了。那时，中学的教学水平在降低，尤其是英语。金大这类教会学校招

生往往出现这种情形：有的考生英语不及格，分数过低，其余各科都还可以。以往，像这样的学校就不录取，可当时因时局的问题，这样的考生越来越多，如果不录取，就招不到足够的学生。于是，校方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只要其他科考得好，英语虽不及格但还不至于太糟糕的，也取，不过入学后先不能入公共必修课的大一英语班，要先读一年补习英语，考试及格才走入正常程序。全校各系招收的学生都有这样一部分人，因而补习英语班的学生很多，而外语系师资也不够用（教这种班是任课助教的事，这样的助教在学校里没有几个），于是就把我用上了。这就是我那份“比较固定”的工作。所以，我实际上从毕业前就开始当助教了，虽然身份还是学生，没有助教的名义。

在金大只演过一次戏，演的是英国一位剧作家写的 *Admirable Cmfon*。我国 30 年代联华电影公司上演过一部电影《到自然去》，由金焰等人主演，实际上是翻译的这个剧本。在这所学校演戏，当然要用英国英语演。这需要费点劲儿。我饰演的是主要角色之一 Crifon。演这个戏对我们的英语锻炼大有益处。演出时，当地五所大学来看的人很多，其中包括许多教授。我们的演出受到普遍的赞扬。

在金大，我又积极参与了体育活动（在中大没有参加），是金大篮球队队员。

外语系全名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但是实际上开的全是文学课，没有语言方面的课。中大、金大都是这样。唯一的例外是语音学，中大外语系主任开过一次“英语语音学”课，金大也开过一班“英语发音”课。文学，我本来是很喜爱的。不过，从演戏，在课堂上和课余做过书面翻译、试着写剧本、也学着写点旧体诗等等的尝试来看，深深感到做文学工作之不易。在我当时的思想认为，从事文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搞创作，而我如果搞创作，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生活领域太狭窄，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事情知道得太少。演戏使我这种感觉格外突出。有了这个缺陷，即使不

搞创作而搞翻译或研究，也是很不利的。再加上打点小算盘，比如，翻译，很辛苦，有时为了一个词、一个成语、一句话，东查西查，苦思冥想，翻得好，人家说是原作好，如果读者觉得不好，会认为是翻译得不好，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后来我自学俄语，主要动机就是想能直接看俄罗斯 19 世纪那些好作品，因为翻译令人不满意，甚至看着十分吃力。

在金大，口头上直接使用英语的机会多，继续学第二外语——法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比较。虽没有专门的语言学方面的课，但是在教乔叟的故事集，教莎士比亚戏剧，教密尔顿的诗的过程中，教授顺便讲了点英语史的知识；也讲到英语吸收外来词很多，尤其是同法语的交流更多，教作文的教授特别强调多用短词，多用土生土长的盎格罗——萨克森词，尽可能少用那些老长的外来词，于是也就顺带着讲了欧洲诸语言都属于同一个系统，都有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来的同源词，讲到了哪些是日尔曼语系的，哪些是拉丁语系的，哪些是斯拉夫语系的这类常识。讲英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少不了也会讲到从中世纪前的拉丁语天下分化为多民族语文的过程。由于直接使用外语的机会多，再加零零碎碎得到一些有关语言的常识，我逐渐对语言发生了兴趣。在中学，尤其是高中，英语语法学得多，在中大和金大学了点英语语音学的常识，这些也起了作用。于是文学兴趣归兴趣，专业方向则逐渐转向语言。开始主要是想学学一般语言学，重点钻钻英语语言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就自己拼命找书读。钻了一阵，小有收获，但感到继续钻下去有困难。身不在英国或美国而要钻英语，终究是隔着一层，又没有专攻语言学的教授来辅导，全靠自己摸索，不免走弯路，事倍功半。接近毕业的一个学期前，转念一想，何不以已经学到的外语为工具，可以多读国外的语言学书，拿外语与本国的汉语作比较，并且运用学外语以来接触到的研究方法，来钻研汉语呢？越想越觉得这个路子对，就这样把方向定下来了。当然，外语不能丢，并且一直要做外语工作（指教外语）。汉语、外

语一起抓，确实够辛苦的。以汉语来说，虽说是母语，中国书也读过不少，然而要把汉语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要把汉语语言学作为专业方向，作为一门学问来钻，则大概要从头做起，而且也是靠自己去摸，这其中的甘苦不是几十句话说得清楚的。且一旦定向，这个苦头就要长期吃下去，不是三朝两夕的事。

方向既定，就想小试一下。于是我自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从〈文心雕龙〉所见的中国文学传统》，用英文写成，从《文心雕龙》里摘引若干重要片段，用英文释义，整理成为系统的几组，说明文学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报到系里，系里不能不接受，因为虽是用英文写的，但讲的是文学问题，没有超出所规定的毕业论文的范围。这可把系里难住了。可以想见，外语系没有哪位教授能对付古文《文心雕龙》的。要找一位既通《文心雕龙》又通英语的人，的确不容易。系里东找西找，终于想到了吕叔湘先生。那时，他在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没任课，关于近代汉语的那些篇精采的论文就是那个时期写的（建国后编为一巨册《语法论集》）。吕先生原专英语，教英语，嗣赴英国留学，英语掌握得极好；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博而且精，造诣极深。系里请他辅导我写“文心”那篇论文。他先要我写了两段给他看了看，答应了。从此，我和吕先生建立了师弟之雅。原来，他就是在精通英语的条件下专治汉语的，后来他也曾自学过俄语，达到能够阅读专业书的水平。总之，正是我自定的专业方向的先行者。他辅导我的论文，不但指导整体方面的设计安排、对若干问题的看法和研究方法，以致动手修改、润饰写出的文章本身，着实费了不少心血，花了不少时间精力。随后毕了业，我继续留校任助教。彼时抗日战争已结束，金大迁回南京，有幸和吕先生住在一幢宿舍，达三年之久。我受到吕先生的指点教导之多，受到他治学路径、方法、态度影响之深，是难于形容于笔墨的。于此，我的治学方向也就愈益坚定，一直走了下来。

（惠兰 整理）

张大千在青海

贾永琢

本文着重介绍了张大千先生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友谊及作者与张大千先生接触期间的所见所闻。

大千先生之名，早随其画斐声中外，被誉为中国画坛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他毕生广交游，在国民党的西北军政头目中，与护送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特任官赵守钰将军甚友好。

大千先生去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开发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古代艺术宝藏时，赵曾函电当年绰号为河西王的马步青，保卫大千先生的安全，支持大千先生的壮举。1940年，赵又充任护送班禅灵榇回藏专使，驻节西宁，对大千先生在莫高窟的艺术寻摹工作，更多关注。1941年，大千先生功成东返，特专程绕到西宁看望赵老将军。赵亲至东郊相迎，逐住于专使行署二楼赵的卧室与办公大厅之中。赵无论冬夏均露宿院中，人称“露宿将军”，卧室形同虚设。当时我是专使行署秘书主任，大千先生的幼子年方15，与我同住在秘书处的内屋。相处20余天，甚是融洽。他曾画帧“藏女图”赠我。赵老戏称其为张小千，我们也以此称之。

赵老酷爱书画和古玩，鉴赏水平高，收藏甚丰盛。每至一地，常拜访当地著名书画家并常派车迎接他们到家里作客，还常到古玩字画书店观选珍品。因此，古玩字画商也常带佳品登门求售。由

于早年曾上过“以假乱真”的当，“吃一堑，长一智”，谁也休想拿假的当真的来欺骗他。说起来，这要从赵老和大千先生由一“以假乱真”事件而结成“知交”讲起。当赵中年失意在北京小住期间，适大千先生也去北京。当时大千先生为提高画技，曾用仿宋之纸，临摹宋代之画，维妙维肖。画商“以假充真”，廉价买进，高价卖出，日本人上当者多，北洋政府下台在天津作寓公的也不少。那时，赵的鉴别能力差，亦误假为真，买了一帧，悬于室壁，沾沾自喜。有一天，他请刚识的大千先生来家进餐，还洋洋得意地夸说他以廉价买得此幅珍品。大千先生仔细一看，认出是他仿摹的假品，弄得赵既扫兴，又高兴。高兴自己结识了大千先生这位才华达到足以“乱真”的青年画秀。后来在西宁他俩旧话重提，逗得哄堂大笑。在座的甘肃名士、书法家王剑平戏曰：“在此抗战期间，谈论大千先生早年就以‘以假乱真’的绝技，戏弄日本鬼子浪人，很有意义。这是给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企图掠夺我国国画瑰宝的小日本的一当头棒喝。”又引起一阵笑声。

赵为官廉正，但很好客，并甚讲究吃喝。大千先生亦有同好，并会烹饪几样佳肴，尤以“四川白肉”为拿手。大千先生和名书法家于右任，均美髯，赵称他俩为朝野两美髯（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大千先生不做官）、书画两美髯。他对大千先生做的“四川白肉”，常赞不绝口。在西宁专使行署，每天晚餐，赵常邀当地老书法家、诗人姚钧、魏传贤等陪筵。后来，赵又电邀甘肃名士、书画家王剑平先生来与大千先生会晤，二人均有维摩居士的风度，朝夕共处，谈古论今，互相观赏对方挥毫创作。大千先生费两天时间，为赵老精工绘画的美妙超群的“金碧山水”画，曾留空请剑平先生在上面题诗书跋。真是珠璧并辉，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大千先生每与剑平先生外出寻胜访古，我与其子常陪侍。有时，赵老亦陪游。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们同往黄教圣地塔儿寺之游。该寺法台（即行政事务负责人）事先得到通知，邀同大金瓦

寺，小金瓦寺等处活佛，率领喇嘛摆队相迎，并设盛宴款待。赵因身为大员，受礼制约束，不便任意行动，特嘱“法台”指派寺内主管画塑艺术的喇嘛画师，陪同大千先生到各处参佛观光。大千先生因而得以看到一般人难以看到的奇观珍品，尽兴地观摩了寺内的精美壁画，在壁画较多的小金瓦寺和大经堂里，观摩较久，留连忘返。他详细询问了藏画技巧。他对喇嘛画师以石质矿物作染料，久不变色，绚丽如新的画技，赞不绝口。他曾兴高采烈地宣扬过这样的观感：“塔儿寺既是喇嘛教、黄教的六大寺院中最雄伟壮观的寺院，又是藏族绘画和神州珍品荟萃的艺术宝库。”后来在历次展览会上曾展出过他此行所作的诗和画。

大千先生衣着俭朴，喜穿长袍、便鞋。去塔儿寺时，只比日常多顶别致的古学士帽，多串念珠，走起路来，美髯飞舞，飘飘然有居士之气，大儒之风。对迎接的喇嘛，合十答礼，回献哈达，神态温雅而庄重。归来，谈到藏胞列队迎客的礼仪，他说：“清朝年羹尧率军入青平乱，不懂得‘吐舌’、‘瞪眼’、‘屈腰’、‘举剑’为迎宾大礼，竟诬为野蛮不驯、意图杀己，而下令全给屠杀。真是愚残之极。”

大型“水笔仕女”，是大千先生拿手画品。但他不多画，每至一地，才画一幅。而且以此开笔；然后才画它品。据悉这已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种定规。大千先生一到西宁，行署同仁就想求其赐画。但是一因须让先生休息休息，二因当时的西宁市面萧条，文化闭塞，连质次的宣纸也买不到。因此，未便启齿。后虽托人由兰州买来宣纸，但大千先生认为仍不适用。后来，大概由于大家招待殷勤，情不便却，就以他自带的佳宣，为大家画画、写字。那天，我们在其子张小千的指挥下，做好了准备工作。大千先生看了名单，叫小千取出四张宣纸。指示一副用整张，其余裁成对开两张、四开四张，第四张裁成三副对联和两块小张，然后即下楼挥笔书画。赵老和数位同仁均围案观画。大千先生不出所料先在整张纸上画了一个浓发淡体、娟态喜人、秀色可掬的“水墨仕

女”。不落款，即接连把其余的纸张画完、写完，简单着些色彩，大小九幅画，平均每幅约用 10 分钟，三幅对联，平均每联仅用 5 分钟。事毕，方才搁笔休息。这时大伙交头接耳，窃窃议论，猜想整张大型“水墨仕女”一定是画给专使赵老的。赵老捋髯微笑似亦认为非他莫属。讵料，大千先生执笔给各帧落款时，对赵老说：“早先已给您画了帧仕女图，此帧给永琢好吗？”赵老答曰：“可以，可以”。我高兴极了，大家亦为我贺。此情此景，现在仍记忆犹新。此外，这天大千先生还以一小幅山水画赠我爱人张俊秀，以一幅对联赠给我，上书“万松春不老，千竹夏生寒”十个大字。每忆及此，甚感高谊。

·人物述林·

范汉杰的人生历程

李以勤

范汉杰曾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前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本文较详细地介绍了他解放前后的生平经历及思想状况。

前　　言

范汉杰（以下行文为了简便称之为范）原名其迭，以字行，生于1894年9月25日，卒于1976年1月16日，终年82岁。

范系广东大埔县三河镇浒梓村人。1912年在广州优级师范理科肄业，被选送入广东陆军测量学校五期学习三年，1924年6月进入黄埔军校一期，1928—1931年在德国深造，并在德军各兵科学校见学及在德国军队中实习，1944年在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一期进修。范的主要经历，曾任过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最后一年（1945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为黄埔生最高军职的第二人（第一人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当时在各战区以下任集团军正副总司令的有杜聿明、李默庵、宋希濂、王仲廉、丁德隆、李铁军、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夏楚中、何绍周、桂永清、李及兰、黄杰、关麟征、王耀武、陈大庆、张雪中、俞济时、郑洞国、梁华盛、陈沛、李

范汉杰自印

楚瀛、王敬久、孙元良、罗奇、陈针、张耀明等 20 多人。抗战胜利，黄埔毕业生已逾 10 万。范任官陆军中将，曾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二等宝鼎勋章及胜利勋章。

我自 1933 年 11 月“闽变”中开始认识范，范当时任第十九路军副参谋长，我任第十九路军总部军士教导队队长（即负责警卫总部的警卫营长），是在一个单位的同事。范与我是广东同乡，是不同期的黄埔同学；三年内战中，被解放军打败作了战俘，又同时成为战犯；1960 年 11 月 28 日同为第二批特赦战犯；同年同日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又是同居于北京和平街 11—21 楼上，相互扶持甘苦共尝 14 年。今逢范老百岁冥诞，特就记忆所及写述出来以供世人参考并借资纪念。

戎马岁月

范汉杰的峥嵘岁月由 1912 年（民国元年）肄业于广东陆军测量学堂第五期三角科天文测量班，参加广东第一次海空军运动大会获冠军开始，迄 1948 年 10 月任“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止，历时 36 年，由一个测量队长升至陆军副总司令，中间经过援闽认识蒋介石，后来成为黄埔学生，经历东征陈炯明、南伐邓本殷、北伐中原、八年抗日战争，屡建殊勋，后来参加反共内战，率大军攻破沂蒙山区、绥靖冀热辽边区而兼任热河省主席，乃名副其实的一位国民党名将。

范在 1913 年毕业于广东陆军测量学校后即出任广东测量局三角科科员，从事测量于广东各地。自 1918 年孙中山得广东省长朱庆澜之助，拨亲兵 20 营，编成援闽粤军总部，以陈炯明为总司令，进占闽南，范被派充漳厦线测量队长，不久，调入总司令部任委员（尉级副官）。当时蒋介石在总部任上校参谋，备受参谋处长谭家骏的歧视（谭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蒋乃日本士官学校肄业）。当时范与蒋因同在总部，彼此相识也间有过从（1933 年在福

建时，范曾对我讲过，今日蒋委员长威风凛凛，当年他在闽南时却虎落平阳被犬欺呀！粤军总部的高官多看他不起呢！）。范凭着这点人缘，后来得到蒋介石的提拔，扶摇直上做到陆军副总司令。1919年蒋介石出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所部约3000人。当蒋率部进袭福州失败后，又辞职赴沪，大有怀才不遇、壮志难伸之感！范也于是在年离闽回粤，但这次来闽工作也算他一生中极其宝贵的奇遇，认识蒋介石于微时。

1920年春，范回抵广州，适逢国民党元老广东大埔乡亲邹鲁（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多年）任两广盐运使，由堂兄范其务（同盟会员，时任粤军总部军需处长，后来历任广东、福建的财政厅长）之荐，任缉私舰长，逡巡于广州至梧州西江水域，与当年盘踞粤省的桂军莫荣新所属部队的军官有交往，其中驻梧州的桂军师长刘震寰就是其中之一。1921年，孙中山派粤军进攻广西，但据守梧州的刘震寰师坚守不退，粤军熊略攻梧多日未克。范的堂兄范其务令范利用与刘的交情只身潜入梧州，策动刘震寰停止抵抗、归顺孙中山，几经策划卒告成功。

1922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平定桂系军阀之后，公然提出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与北洋政府勾结，被孙中山免职。是年，6月16日，陈炯明悍然叛变，派其心腹叶举率兵攻打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号召北伐军回粤讨陈，又联络在桂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于白马结盟（组织讨贼联军），率军来粤讨伐陈炯明。桂军抵广州后，范被刘震寰延入桂军总部，参与讨陈机要工作。不久，在总统府江门办事处长邹鲁的推荐下，刘同意将陈军的败兵收容编成两个支队（团），编为桂军第六路，派范汉杰任司令，驻防三水附近整训，并委范兼任三水县长，就地筹措补给。由于军饷久欠、军纪废弛，范实际上有职无权，深感难于统率这些乱军。迨1924年春，孙中山开办军官学校于黄埔，蒋介石任校长。范决心随孙干革命，辞掉司令不干，毅然于是年6月考进了军校作为黄埔生，从头干起。6月16日开学，年底毕业，随即参加第一次

东征战役。范毕业后不顾当年曾任司令，安心充任教导团第四连少尉排长，三个月之后升为该连中尉副连长。当年的教导团长即是该校总教官何应钦。黄埔军校开办初期财政困难，教官不足，缺少地形学教官，范因出身测量学校，精通数学，被学校当局选派兼任地形学教官。

孙中山由沪回广州，整顿讨贼联军，各军均冠以“建国”两字，如建国粤军、湘军等番号，并彻底整编粤军第一师，任用忠于革命不附陈逆的干部，以李济深（继梁鸿楷）任第一师师长，下辖两旅四团，第一旅旅长陈铭枢，辖第一团张发奎、第二团蒋光鼐；第二旅旅长陈济棠，辖第三团邓演达、第四团邓世增。1925年3月，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以许崇智为东征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一师第一旅陈铭枢部、粤军第四师许济部、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东征，向东江兴宁进攻。李济深、陈铭枢此时从教导团调回范汉杰充第一旅旅部参谋主任（由中尉晋至中校），范随即踏上征途。是年春末，该旅攻占东江兴宁神光山，进占兴宁城。陈炯明属下骁勇战将林虎（原护国军第六军军长）连夜溃逃，留下文件甚多，范在林虎军部清理文件获悉驻广州滇桂友军与陈炯明、林虎有联络，并有勾结。陈铭枢向蒋总指挥（校长）条陈此事。东征军克复潮汕后，蒋介石即奉大元帅府令率部回师广州平乱。是年夏回抵樟木头（属东莞），蒋召集各部少校以上军官会议，宣布杨希闵、刘震寰企图叛乱，下令各部回师广州，分途向逆军进袭。不足五天时间，全部滇桂军被消灭，稳定了局势。范有幸参加了此役，从此投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平定杨、刘之乱后，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在粤桂各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七军，以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等分任军长。不久，陈铭枢、刘文岛策动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率军投诚，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以唐升军长。1926年7月间即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分东路、中路、西路三路进

军。原粤军第一师改编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因兼后方司令不能出发，派副军长陈可钰率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及一个独立团叶挺部出发（该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第十三师徐景唐部留守广东）。是年8月间即进占湘东。第十师的作战序列是：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朱绍良。辖二十八团蔡廷锴、二十九团范汉杰、三十团戴戟。第十二师的作战序列是：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辖三十四团许志锐（此团留在琼州，北伐初期未归建）、三十五团缪培南、三十六团黄琪翔，另配一个军部独立团叶挺部归该师指挥。总司令蒋介石随西路前进，以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左翼队，向岳州攻击前进，以第四军陈可钰部任右翼队，向平江、通城攻击前进。8月中旬，总攻开始，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向平江中洞岭北洋军阵地攻击时，蔡廷锴团长手部重伤退下，职务由中校团附沈光汉代理，中洞岭由二十九团范汉杰部攻克。第十二师各团先后攻占平江城，守军司令旅长陆云自杀，残部向鄂南通城溃退，全军尾追至咸宁附近，继续攻击汀泗桥。8月底攻克该桥，第十二师黄、缪两团及第十师范、戴两团血战竟日，伤亡颇大，三十团团长戴戟负伤，至此第十师已负伤团长两人，只范团长尚健在，二十九团营长张世德、连长张炎兄弟（此两人后来成为十九路军勇将）立功特大。8月30日我军主力攻克贺胜桥，敌军前敌指挥宋大霈率残部溃退，北洋主将吴佩孚督师无功，坐铁甲车退走。9月初，我军攻抵武昌城下，进行围城作战。吴佩孚令刘玉春为守备总司令，令湖北督军陈嘉谟佐之，并电孙传芳进军湘鄂，联合抗拒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第四军、第七军、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城，以第八军攻下汉阳、汉口，堵击南下增援敌军。围城各部多次攻城未下，乃进行包围封锁，守军粮绝，守军师长吴俊卿乃派旅长贺某出城洽降，打开通湘、中和、保安三门。范汉杰从保安门入城，协助友军解决未降的守军。是役第四军成为铁军，范在北伐战役立下汗马功劳。1927年1月，援赣回师后，第十师扩充为十一军，陈铭枢任武汉卫戍

司令兼军长，辖第十师、第二十四师两师，以蒋光鼐升第十师师长，范汉杰升副师长，以戴戟升第二十四师师长，以蔡廷锴升副师长。是年3月，蒋光鼐升第十一军副军长，范即升代第十师师长。此时第十二师扩充为两个师，张发奎升第四军副军长，以黄琪翔升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为副师长，以朱晖日升第二十五师师长，叶挺为副师长。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升任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

1926年冬，北伐军击败北洋军阀吴佩孚及孙传芳部以后，武汉政府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当时（1927年春）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被迫离军，先后率同该军的副军长蒋光鼐、第十师代师长范汉杰、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赴南昌投蒋。蒋抵南京之后即发动上海“四·一二”清党反共事件，宁汉分裂。范本人为蒋介石器重，发表为浙江警备师师长，为黄埔生第一个任将军的，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此时胡宗南任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同在此时任团长者尚有蒋先云、方日英、孙元良、俞济时、李延年等人）。蒋介石迁北伐军总司令部于南京后，桂系第七军与第一军于8月间击退孙传芳的反攻后，便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被迫辞职。范所带的警备师也于当年冬解散，所部分拨给驻浙、苏各师，也有千余人分给驻在福州的第十一军第十师补充。（范曾在第十师代理过师长，故北伐军总部才有此计划。）

蒋介石下野后，范结束浙江警备师师长职务，即回广州追随李济深（原第四军军长，此时升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省主席），被派赴日本及东南亚各国，代李济深慰问两广籍侨胞。1928年夏，取得李主席之助赴德深造。他在德国的3年，先在德军下级军队（营连排级）实习，特别是连排级野外演习及战斗教练的实习与指挥，然后回到柏林，在各兵科专门学校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五校见学，最后阶段则在军事高层学习欧洲战史及对战略、政略与军制的研究。1931年，因奔父丧及“九·一八”国难回国，回国不久患吐血症，乃上庐山休养治疗，并乘机在山上翻

译德军战斗教练小丛书与图解，后来这些书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印发全国各军队作为练兵资料（“九·一八”后，国民党军队教育逐次放弃日本教材）。

1932年“一·二八”，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时，范在庐山养病，战后第十九路军调福建，时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特邀范回第十九路军工作，先在福州绥靖公署，佐蒋光鼐，任该公署参谋处长及第十九路军副参谋长。陈铭枢乃第十九路军前身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蔡廷锴等均以上级待之。1933年由于陈铭枢被蒋介石排斥，陈乃领导第十九路军联共反蒋。1933年11月，通电成立“中华共和国”，脱离国民政府另成立人民政府，蒋即以大军将第十九路军击败，并将该路军黄埔军校出身军官一律开除学籍并通缉。范当时乃被通缉者之一，因是黄埔一期出身，故被取消了学籍。另一方面，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由于范系黄埔出身，在战事逆转时特派他亲至厦门，与蒋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洽商和谈及处理第十九路军之事，范未能达成任务，后来又发觉总部机要科长逃亡将电码失密敌军，范身兼参谋处长，于是被疑为通敌叛变出卖第十九路军，这些都非事实。范在闽变失败后心情殊感痛苦，自认为对团体是忠实的，并已尽到最大的努力仍无补时艰，亦属无可奈何，若云出卖团体诚乃冤枉。

1934年1月闽变结束后，第十九路军番号取消，除保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师四个师番号，部队人事彻底更换外，部队调苏、豫、皖训练，其将校级军官经过考试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尉级军官300多人考试后进入洛阳军官训练班受训。范本人1934年3月赴南京求见蒋介石未果。后经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黄杰等多人力保，蒋介石才接见范于南昌行营，发表为少将参议，以观后效。迨是年秋进入庐山军官训练团接受考核后，乃发表范为第二师参谋长；随后黄杰调税警总团长，范也发表为总团参谋长。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件”，范被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保荐为该军副军长。1937年抗战开始前，发表兼任中央军

校高等教育班主任，召训将校级军官 500 多人。“七·七事变”全面抗日，黄埔军校本校及各分校大批招生，范升为军校教育处长，综管全校教育重责，后又兼任第十四期学生总队长，把在德国所学的那套战斗教练方式方法施诸黄埔员生，受到全校员生欢迎。在校两年，造就军事干部达数千名之多。

1938 年秋，范从中央军校教育处长任内调升第二十七军军长，该军辖有第四十五、四十六、预八师 3 个师，其中第四十六师是由军校教导总队改编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前任军长系桂永清）。1938 年秋，守备陕东河防，1939 年即北渡黄河，进驻山西晋南的太行山区，配合庞炳勋的第四十军、孙殿英的新五军，一方面归一战区卫立煌指挥，同时也归第十八集团军朱德节制，在敌后作战，马不停蹄，企图阻敌南下。日寇称中条山、太行山为盲肠，深为畏惧。

在 1939—1940 年的两年中，在敌占领区大小战斗数以百计，特别是在 1940 年 5 月间于长治、高平之役，日军被范部痛击，斩获特多。日军曾以一个大佐名字伪说与范在东京相识，空投信件观范投降，许以高官，范接信后一笑置之！（据范的侍以参谋罗剑乔告我，这封信是由当时留学过日本的西陵县长张震宇翻译出来送呈范军长的。）抗日战争国共联合作战，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曾带随从数人到第二十七军军部慰问，并赠锦旗一面，文曰“太行屏障”。范接受后引以为慰，并印发全军以资鼓励。

1941 年春，日军抽调关东军入关，加入晋南大扫荡，企图消灭中条山军队，卫立煌决定避免决战，将晋南各军南撤，并令第二十七军总掩护，向长治方面急进袭击日军侧背，因而被日军包围，全军损失惨重，军部被冲散，范只率少数部队突围脱险，随即在南岸收容后，重率各师回驻中条山。胡宗南闻范无恙，特电嘉慰。不久，范调升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1941 年底调充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2 年再升为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三军、五十七军、四十二军等 3 个军，守备陕甘宁边区，执行

封锁任务，归第八战区朱绍良指挥。1945年春，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从八战区将范调升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直至抗战胜利止（此时曾当选国民党六届中委）。是年8月中旬日军投降。9月3日，中央指示第一战区在郑州地区接受日军的投降，范随即和胡宗南至郑州接受日军驻河南的某军司令官的投降。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野心勃勃，建议蒋委员长派出所部的第三军罗历戎部、第十六军李正先部，交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领取道山西进至华北石家庄、北平地区，以防止共军势力的发展，又推荐范汉杰进入中枢。1946年春参加整军会议，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范被调任为参谋次长（即相当于副总参谋长），佐参谋总长陈诚统帅全国军队，有关编制、装备、训练、运用的戎机参赞，企图将共产党军队纳入国民党军队的轨道，将国民党军队编为60个师，共产党军队编为20个师。1946年6月间，国共和谈宣告破裂，内战爆发了。八年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在士无斗志、民无战意的状况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坚决反击。不到一年，国民党败相毕露，深感兵员不足，训练不足，范在中枢运筹帷幄也无补时艰。部队整编复员后，高级指挥官逢官降一级，如抗战后的总司令降为整编军长，原任军长变为整编师长，原任师长缩为整编旅长，将领不想恋栈，对指挥作战心理上不利；再国民党征兵困难，物价高昂，货币贬值，造成士气低落，因之对击败共产党军队，各级无必胜之心。范深以为忧。范曾建议陈诚停止使用全面进攻的战略，因各条战线均须用兵，处处攻，处处要守，这样会被敌军各个击破，应改为重点进攻战略才能威慑解放军，这一计划被蒋介石、陈诚采纳了。1946年秋，范又被调为陆军副总司令，专司督练新兵的重任。上级认为范对训练有本领，当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前线指挥，范接任后即策划在全国各省成立十多个督练处，进行督练新兵工作。范在中枢工作不足一年，深感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与参谋总长陈诚之间矛盾重重，所谓权与能之争，采取美国的一套编制在中国行不

通，时有“大厦将倾”之感！

1947年2月间华东战场，李仙洲率领第十二、四十六、七十三军三个军（整编师）进攻山东莱芜时被陈毅部所击败。同年4月，在汤恩伯指挥下的整编七十四师（即七十四军）张灵甫部在临沂孟良崮又被歼之后，蒋介石改变战略为重点进攻（即集中力量攻破解放军的根据地），采取两个重点，在西北战场进攻延安地区，在华东进攻沂蒙山区。范从副总司令调郑州指挥部主任，甫到职即被调任第一兵团司令官（继汤恩伯缺），于1947年6月率整编六十五、二十五、八、十一、九等师（即黄国梁、黄百韬、李弥、胡琏、王凌云各部），并配以国民政府主席特派战地视察官李觉随兵团行动执行督战任务，开始进攻。解放军方面先包围山东日照刘镇湘旅，数日未下；继又强袭诸城之张家集整编六十四师黄国梁部，三日未下；后来又围攻整编十一师（即第十八军）胡琏部于南麻，两日未下。于是陈毅、粟裕，即率解放军撤出沂蒙山区，北渡黄河，范兵团占据沂蒙山区。

1947年秋，攻克沂蒙山区后，范即改任胶东兵团司令官，继续率领各军在胶东扫荡，获国民政府颁发二等宝鼎勋章，调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兼热河省主席。范将李弥的第八军在胶东征补兵员整编地方团队扩为第八、第九、第三十九军三个军，从海运进驻冀辽边区。1948年2月，兼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是年夏，取消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名义，调充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9月间，解放军围攻锦州。10月14日，锦州被攻破，范被俘。查锦州战役，范所指挥的部队只有第六兵团卢浚泉部第九十三军（辖暂十八、暂二十、暂二十二师）及直属第一八四师，范以暂二十师守义县，以三个师守锦州，后经范请求才调来新八军所辖暂五十四师、暂五十五师，最后又空运来一个不足人数的七十九师。9月中旬，解放军向西移动，将锦州与义县交通切断，锦州兵力支援不了；范拟调第八十六军回锦州支援义县，而卫立煌不准。在锦州战役中，蒋介石亲乘灵甫号兵舰来葫芦岛指挥候镜

如兵团所辖的第九十二、三十九、六十二、五十四、八十六各军增援；解放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法，死守塔山，而侯兵团各师屡攻不下，直至锦州失陷，10月16日范汉杰被俘乃告中止。锦州战役不下，从苦战多日，外无援兵，可说是全军覆没。不久东北均告失败。从战略言，无东北即难守华北，无华北即无华中与华西，没有华中与华西即没华南。所以说，东北之败乃是国民政府无可解救的败局。

锋镝余生

1948年10月16日锦州失守，范化装后依照国民党空军指示的方向，向松山、塔山逃出，中途被共军查获，被俘后即被解往佳木斯，与先后被俘和同时被俘的李仙洲、杨文瑔、马励武、韩浚、廖耀湘、郑庭笈、卢浚泉、杨宏光、盛家兴等军长以上战俘关在一起。本来共产党对待战俘政策也是按国际公法，不杀不辱的，全国四个野战军，第一、二、三野战军都是宽大战俘的，唯有林彪属下的第四野战军采取酷刑虐待办法对待手无寸铁的战俘：（1）带脚镣（分重、中、轻三种），范汉杰、廖耀湘、卢浚泉三个兵团司令即带重镣；（2）战俘不准交谈；（3）大小便要先报告，经警卫兵许可才行；（4）白昼只能坐着看书，不准睡（有病者除外）。

1957年8月，范在东北参观，问我改造情况时，我告诉他，我在山东军区（三野解训团）改造学习，没有见到如四野那样对待战俘办法，也没有劳动，的确受到优待。范听后慨叹地说：“被俘时我心中曾想，四野司令员林彪乃黄埔同学，可能会不杀不辱，谁也没有想到有此虐待！”相反的，不是黄埔出身的野战军司令员，对黄埔出身的俘虏却如此。“文革”后期，林彪叛逃摔死后，范对我说，林彪有如此下场，凡属存心不良的人可为殷鉴云云。

1948年10月被俘迄1955年底的七年中，范在专政下所抱的

态度是，采取明哲保身与逆来顺受的态度，把个人的过去当作已死了，千万不可发牢骚讲怪话，否则自取眼前亏，自讨苦来吃。他一再劝我不可乱说乱动，要规规矩矩。集中北京后，范认为有重生可能，可能不致死于非命，把过去长期所留的长胡子剪了，把过去带镣的伤痕忘掉，保持写日记、看书的习惯，除床头几本新书如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还托人买了高等代数、微积分来消磨时光。他确信一条古谚，“国家兴亡有数，人的成败有命”，所以在专政改造中听天由命。范平日爱讲笑话，曾多次对我说过，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这些被俘将领，败兵之将，释回国民党去，抬不起头，生不如死。在共产党专政下，如不被杀也有重生希望，届时可以告老归田，这也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云云。

1956年元旦，共产党颁布“加速改造”政策，由于解放以来经过镇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之后，加上抗美援朝的胜利，社会秩序日臻稳定，对原国民党政权接收下来的几百万改造有了决定性的成绩，对被俘军官上校以上的专政改造也有一定成绩，于是颁发加速改造政策，将人民解放军华东、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解放军官训练团结束，军管移交地方接管，我原来所在的华东军区训练团移交地方后，改名为山东解放军官管训处。将其中武官中将级者、文官省主席、中统军统特工省一级的头头，则集中北京公安部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范与我便是在此政策下得以在北京一起学习改造的。集中不久，北京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如张治中、翁文灏、邵力子、程潜、傅作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刘斐、卫立煌，先后都来探望过这些战犯，当时集中人数约百余人，后来精简不足100人。民主人士张治中传达毛泽东的话，我们这些战犯不判不审宽大处理，将分批释放，分别安排就业等语。当时范表示我们这些人有重生希望，皆大欢喜。后来分派至秦城公安部农场劳动，参加种植果树及葡萄一年多，至1959年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

释放第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 30 人，却没有范的名字。范于是终日不语，认为一批 30 人不知何年轮到，深感不安。后来得悉范原在第一批名单中，由于民主人士蔡廷锴等反对才搁下来。蔡的反对理由乃由于范当年出卖过第十九路军的劣迹云云，范闻之大为伤感，认为这是一宗冤案，是一宗难于伸雪的历史冤案。事过不足一年于 1960 年 11 月 28 日，特赦第二批战犯时，范列为第二名被特赦了，我也是第二批特赦的，我们两人从此得到重生，殊堪庆幸！

范在第二批特赦后批准留京参观，共有十余人，属民国集团的有范汉杰、李仙洲、罗历戎、胡临聪、陈金城、李以勤、宋瑞珂、庞镜塘、沈醉、董益三、夏建勋、许长林，伪满的有溥杰、王子衡等人，住在崇内旅馆内，参观北京工农业及科技单位、名胜古迹。范于是年 12 月间得到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的通知（我们这批人当时是受市民政局长及市委统战部长领导的），要我陪同范到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及任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鼐家去负荆请罪。我们到达蒋、蔡两家时，范当即表示过去在第十九路军相随时，未能尽忠职守招致团体失败有咎内心等语。当时蒋、蔡均表示中央领导人都原谅你，特赦你出来，我们乃老袍泽当能见谅，望今后多多立功图报国家云云。1960 年 12 月 4 日这一天，算是范最难忘的一天。

1961 年 1 月，我们两批特赦人员由北京民政局长、殷科长及统战部廖部长把我们编成一个劳动锻炼组，下北京市南郊红星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向该社工人、农民学习，以求建立劳动观念、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这一组人我年纪较轻一点，被指定任组长，下到红星公社（地点在东高地旧宫）安排在旧宫果树队管理梨树、苹果树，及种植葡萄，整整一年。除溥杰留在景山公园，其余的均在旧宫。这一年，范汉杰、王子衡、许长林、罗历戎、董益三、沈醉、李以勤等多人，和工人师傅配合得很好，并学到一点栽植与管理果木的初步技术。这一年是自然灾害年，我们要劳

动，饭量大，粮食定量不足，我们之中，我与沈醉、罗历戎等曾采野菜补充。那时，我们一个月工资 60 元，范为了改善伙食，收入悉数用光无余，其他各人则有点剩余。如今追念这一年生活，颇有幸运之感，尤其对民间疾苦有进一步认识。

1962 年 2 月，我们锻炼期满回到北京崇内旅馆等候安排工作。2 月 21 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接见我们的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等人。会见时周、陈二人对我们诸多鼓励。午餐时甫坐下，李仙洲、范汉杰与周总理同席，李、范首先起立向周总理致敬，并表示向老师请罪，对不起老师，我们走错了路，对人民加深了灾难。周总理报以一笑，并说是老师未教好你们，是老师之过也。短短数语，感人至深！在会餐中，吃的是水饺，厨师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劳动回来的人油水不足，遇见水饺大吃一顿，结果不够吃，最后加一些饭、面才解决问题。我记得在席间周总理说他与黄埔一期生分别了几十年，但对李、范两同学尚记得起，你们当时都比我这个老师年纪大些，你们两个个子高，记得清楚。现在我们殊途同归，又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之路了。你们要感念共产党对敌对阵营过来的人采取如此宽大的政策，今后应尽力多做于人民有利之事。第二批特赦人员经此次接见后，在新社会做人感到有了面子，逢人低一等的自卑心理，从此便减弱了。

1962 年 2 月，在北京的第二批特赦人员计有范汉杰、溥杰、沈醉、董益三、罗历戎、李以勤等六人发表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许长林、王子衡则发表充任北京市政协文史专员，工资一样都是每月 100 元。而第一批特赦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等六人则任文史专员已近一年矣。范任专员后，分配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负责审阅东征、北伐、抗日方面稿件。1962—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范审核稿件数十万字，自撰亲历资料则有数万字。范的写作很慎重，当时虽已年

老，尚能尽到责任。范是1976年1月辞世，担任专员14年之久，其中任过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至1976年“四人帮”被擒，计时10年，范则只经过9年多未足10年。范在这一过程中只受冲击并未遭殴打亦属幸运了。1966年8月27日，政协宣布文史专员停止办公，一律回家候命。8月30日黄昏，北京第四中学红卫兵光临各家，在和平街宿舍中只打康泽一人，其余各家没有殴打，在范家中抄查一番，搞得满屋狼藉，痛骂一顿后勒令各人写一份悔过书，限3日内送达西城四中红卫兵总部，如有逾期即严惩等语。范遵红卫兵之命办妥后，抄家这一关就过去了。范当时已被委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工资虽有200元，但当时只发生活费60元（只扣发一个月，以后就恢复了，听说乃是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很快纠正了）。1966年冬，范了解“文革”斗争目标，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自己乃国民党残渣余孽不过是陪衬而已，于是惊魂定下了，常到市内看大字报，并邀我作陪到工人体育馆看群众斗走资派大会。1967年秋最突出一次，我们两人到北京航空学院参观斗争彭德怀、张闻天大会。看到彭元帅被斗的惨状后，范恍然大悟地对我说，元帅功高尚被斗，我们来自国民党只有低头认罪，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1969年“文革”高峰已过，红卫兵纷纷下乡向农民学习，机关干部大都到各省干校去劳动改造。政协的干校设在湖北沙洋，机关派有军代表接管。我们文史专员大都年纪老迈，留在机关留守排，我被派充为专员班班长（因我年纪轻一点有些体力），全班中计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牟中珩、李佩青、杨伯涛、溥杰、杜建时、罗历戎、李以励等（那时溥仪、廖耀湘、王耀武、康泽等已逝）。从1969年至1972年每周在机关学习文件、时事三次，其余时间参加机关劳动，主要任务是打扫政协机关大院（地址在旧顺承王府内）的清洁，管理机关树木、果木，搬运干校物品，接待外调人员的访问，写证明材料（那时沈醉、董益三两人已再度

拘留未释)。范年纪最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每天只让他扫扫地。杜聿明有技术，搞修理机件、树木嫁接、打杀虫药保护果木等，弄得两手发炎。牟中珩曾任过山东省主席，此人打扫厕所七间，很干净，受到表扬。大家看到“文革”暴风雨过后，心情比前几年好多了。

范 1976 年初病逝于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时间是 1 月 16 日黎明前。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全国政协已次第恢复了业务，为范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由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参加追悼会的干部达百余人，这可算是光荣的了。作为特赦战犯的骨灰能进入北京八宝山纪念堂，实属难得。所遗憾者，范的子孙众多，多学有所成，俱在海外及台湾，临终无一人回国送终。在追悼大会时只有一个同父异母的胞妹送终，在会上有人感叹地说：“满门多学士，全家无孝子”。

下面谈谈范的身世及家庭状况。我只认识范的如夫人林剑峰(林则徐重孙女)，过继出去的长子改名童本深，及在美定居的儿子范大胜，其余不详。最近我得到范的小同乡、随范多年现在广州工作的罗剑乔来信，进一步了解范的家庭状况，兹记如下：一、父母亲：父名海门，首创办梓里公学造就人才不少的一个名儒。生母邓氏，生子 6 人。继母生女两人。二、兄弟及妹妹：大哥范其通，少年往马来亚谋生，后来跟孙中山革命，曾经随孙中山至夏威夷檀香山向侨胞筹款。年仅 24 岁死于星洲。二哥范其逵、三哥范其适年轻时即赴印尼(荷兰东印度)谋生。范本人排行第四。五弟剑江，在广州进过大学，曾随范当过第三十八集团军后方办事处长，其子范大悲黄埔军校第 17 期毕业。六弟范作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在粤系军队任过团长。1950 年随军赴台，以上校退役病逝台北。妹碧辉，现住贵州，适一个退役军人。另一妹名不详，现去新疆乌鲁木齐，在人民银行工作。三、子女：范有一妻一妾，妻童氏，广东大埔人，生子女 9 人；妾林氏，福州人，生子女 3 人。范当年在改造时曾向同学话家常，自我介绍家庭情况

曰：“妻妾一双，儿女一班”（按：国民党军队班的编制，每班12人）。这一班儿女，一个儿子过继给童家（因妻童氏娘家无后）改名童本深，在原籍务农。范患病时曾来京探视过。在美国有一子名范大胜，任工程师；一个女儿叫范大蓉，在南美任工程师；一个在台湾基隆港务局工作，名叫范大潮；一个在台北工作，名叫范大英；一个在欧洲梵蒂冈工作；其余均大学毕业，具体情况不详。满门学士乃是实情。至于范临终无一人回来办丧事，住台湾的有客观原因，当年难于出境情有可原，而在海外的却无一人回来诚属憾事。范临终时我在旁，他老人家久久未瞑目，生前心有苦痛可以断言。“追悼范汉杰先生大会”开完之后，范的骨灰盒即放置于八宝山纪念堂。过了相当时日，旅美的儿子范大胜代表全家人回北京，将放置在八宝山的骨灰盒的一半骨灰带回台湾安排，所谓埋骨两岸者即指此而言。范作为特赦人员、作为一个败兵之将，不死于非命，辞世后得到人民政府的追悼，亦可算是得到了一个光荣的归宿了。一代儒将如此归宿，亦无憾焉！

解放前夕的李汉魂

承纪云

作者曾为李汉魂的新闻发言人。本文主要介绍李汉魂在解放前夕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及内政部长期间的种种政治活动。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广东地方军人李汉魂在李宗仁代总统期间由美返国，参与国民党上层的政治活动。我在这段时期里担任他的对外新闻发言人，多少涉猎和知悉一些内情，现将所见所闻写出，仅供参考。

李汉魂的生平和政治态度

李汉魂是广东吴川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6期。辛亥革命后一直隶粤军林虎部，任连、营长，因得旅长何彬赏识，渐露头角。陈炯明失败后，改编入许崇智军。大革命前期，在粤军中表现得十分进步，得破格擢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李汉魂即任李济深统率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经翁源、始兴、汝城、资兴、茶陵、攸县，为右翼军主力前锋。大革命失败，汪精卫继蒋介石判变时，总指挥张发奎即策动李汉魂部脱离革命，拥兵自雄。以后李汉魂一度失意，被迫投身桂系，参加了两次蒋桂战争。失

败后白崇禧退归广西，李汉魂则重返广东，依陈济棠，驻军潮汕，成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骨干。抗战前夕，蒋介石收买粤军倒陈。余汉谋、李汉魂、缪培南、李扬敬均通电拥蒋。抗战军兴，李汉魂在潮汕通电请缨，刚好迎合蒋介石杂牌地方部队打前锋的政策。于是李汉魂部队在1938年3月北开，4月进驻郑州、开封，在开封东的罗王砦一带与日军十四师团鏖战。这次战役，李部士兵英勇奋战，伤亡枕藉，一度阻敌前后达18天，后因李部伤亡过重，撤回补充，战局逆转。罗王砦争夺战为李汉魂提高了声誉，一时传为骁将。7月武汉外围战急，李汉魂部驰援武宁、瑞昌，担任南浔线正面防守，先后在马回岭、箬溪一带与日军血战，并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在各路军事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李汉魂部的战绩就极为蒋介石、白崇禧所赏识。武汉撤退，广州沦陷，华南情况混乱，广东地方对吴铁城（广州沦陷时的省主席）的张皇失措、弃城先逃十分不满，对粤军外调地方空虚的情况也有烦言。为了平息地方派的怨怼，蒋介石接受白崇禧的推荐，任命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李对这次擢升，虽很得意，但弃军旅而改从政治，也不无遗憾。抗战期间，李汉魂就在广东韶关一带做了几年半壁省长。不料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对广东毫不放松，命令罗卓英代李为广东主席。李汉魂被迫下野，军政两失意，只好远渡重洋，去美医治耳疾。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李汉魂突从美国飞回，通过桂系关系，一任参军长，再任内政部长，在桂系内部纵横排闼，十分显赫。1949年11月蒋介石撕去退休的伪装，入川顽抗。李宗仁和李汉魂遂自重庆出奔昆明，转至南宁、香港，前往美国。李汉魂去港之日，还发表了一通电，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的抨击。

南昌起义前夕，李汉魂率第二十五师驻防马回岭。武汉传来了“清共”消息，张发奎就和李汉魂约定大家跟汪精卫走，决定把第二十五师掌握好，不让共产党拉走队伍。当时第二十五师里参谋长张云逸、独立团团长周士第都是中共党员。武汉叛变消息一经传开，第二十五师内部革命同志立即主张听党的命令，集中

南昌，高举红旗，继续革命。于是就在张云逸和周士第的领导下，全师起义，向南开拔。李汉魂原想分化笼络张云逸和周士第，凭借第二十五师做个人资本，完全落了空。他闻听部队向德安开拔了，立即偕张发奎乘铁甲列车尾追，被起义部队包围，只好跳车逃跑，才免于被俘。

抗战胜利后，罗卓英走马换将，把他从广东省政府主席位置上拉了下来，这件事也是李汉魂恨恨不已的，就借治疗耳疾为由，远走美国。

尽管如此，李汉魂在桂系圈子里却大有市场。

1929年9月张发奎在宜昌宣布反蒋后，就同李汉魂进军广西，曾合作倒蒋，历史渊源很深。李汉魂在抗战中的升迁，白崇禧的引荐也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李汉魂常对左右说：“天下惟白总座最为知我。”对白推心置腹，堪称莫逆。因此李去美以后，与白崇禧函电往还，仍然很密。他俨然像桂系派在美国的一员代表，在美国曾和院外集团的诺兰、周以德等议员常有酬酢。李汉魂不仅是桂系的入幕之宾，而且也还是广东地方实力派里的重要骨干。广东军人借着四军袍泽关系，互相结成一个小集团，彼此通声气，彼此相卫护，依然把持着广东地方基层。这一集团包括邓龙光、李扬敬、吴奇伟、缪培南、叶肇等军人，还有林云陔、刘纪文、区芳浦等政客，力量也并不弱。这样李汉魂就成了粤桂合作的桥梁，在桂系心目中更加重要。

在欧美的活动

李汉魂耳聋经医治后，听觉恢复。于是在1947年他就偕其妻吴菊芳访问欧洲各国。他首先在英国作了两周的逗留，和英国工党首要有过几次私人接触，对工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一套十分激赏。从此李汉魂一谈政治改革，就提社会福利。以后他又到了法国、瑞士、西德、捷克、瑞典、丹麦等地，作了一番游览，对瑞典的资产阶级政治十分称赏。有关他欧洲周游的情况，后来由

我为他整理后在南京《中央日报》分段登载过，并且编成小册子，题名《欧游散记》，在香港出版。

1948年李汉魂再度离美，访问拉丁美洲。他先后到过墨西哥、委内瑞拉、秘鲁、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特立尼达等地。根据他的日记记载，在墨西哥时，他曾和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将军会谈两小时，卡德纳斯向他了解了国内解放战争的情况和李个人对开发广东及海南岛的见解。他们认为墨西哥和广东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可是李汉魂自称他对经济建设是门外汉，他没有什么能够满足对方要求的见解。他在委内瑞拉曾参观了马拉开波湖畔的石油工场，会见了许多华侨，他认为委内瑞拉是华工待遇最高的地方，但也承认华工的工作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当地华侨十分关切祖国。他们表示如果李汉魂回到广东，建设广东的话，他们都愿意尽力资助。侨胞的爱国热情，确是十分可敬的。有关拉丁美洲的访问，后来由胡耐安和我根据他的日记，写成《拉丁美洲纪游》初稿，携往香港出版，成书我未见到。

李汉魂在美国前后三年多，曾先后到过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底特律、布法罗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城，主要是和当地侨领联系，争取侨胞支持他复主广东。

淮海战役后，胡耐安一天到我家里来玩时，谈起李汉魂，说大局立即有重大变化，李汉魂马上就要回国。他拿李的信给我看，其大意是：“国内局势将有剧变，美国态度必将随之有重大转变，在此中原板荡，国事蜩螗之际，再不能隔岸观火，现正摒挡一切，准备就道，新年前后即可与兄把晤一堂，幸为我预筹一切。”他在那次邀约我一待李汉魂归国，就立即前往投奔。从今日看来，他当时所指的剧变，也就是蒋介石的引退，李宗仁的代政。

如意算盘

1949年2月李汉魂回到了香港，接着来了一个电报敦促胡耐

安南下。但不到三天，第二个电报又来了，内容却是暂缓南下。

原来，李汉魂归国后对时局的总估计是“南北朝”。美国将全力支持桂系力保南部中国，使长江变成一道“三八线”。因此他的政治打算是先找地盘立足。

李汉魂和李宗仁、白崇禧会商后的第一步棋是经营海南岛。当时蒋介石控制台湾，把它作为海上巢穴；桂系为了万一，也想经营一个“第二台湾”。因此李、白就想设法控制海南岛，可是李、白担心广东地方势力不肯轻易放手，于是认定李汉魂是最适当的人选。李当时虽觉得海南仅弹丸之地，有些屈尊，但作为一个立足点来说，毕竟还是相当理想的，所以也就同意了。任命刚发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就立即尖锐地呈现。首先蒋介石通过CC的党部势力，反对李汉魂。他们攻击李、白想一手控制两广；同时又痛骂李汉魂甘心把广东人的地盘奉献桂系。李汉魂一归国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心实不甘，马上使了一个花招，答应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而把海南岛让给广东军人邓龙光。在CC导演下曾三省领衔发表了反对邓龙光的电报，邓龙光吓得不敢上任，桂系的计划落空。这样在折衷条件下，陈济棠做了海南长官。

参军长是一个有职无权的闲缺，在李汉魂看来自然是鸡肋。但参军长可以亲随“总统”，参与机密，李汉魂可借此在幕后活动，发挥作用。因此他飞到南京后，电召胡耐安进行密商，胡劝他全力争和谈代表，作为政治资本。于是，李汉魂追随李宗仁，唱起和平调，暂时与白崇禧的主战派分道扬镳。桂系和谈代表的提名是黄绍竑、李汉魂、刘斐。黄是李宗仁提名的；李是白崇禧提名的，他虽然过去也曾参加过内战，但解放战争时未直接参加，地位比较超然；刘斐也是白崇禧提名的，但一直参赞机要，对战争有一定责任。从革命一方来看，李汉魂可能被接受，但是从蒋介石一方来看，蒋对李汉魂意见甚大，还是刘斐为宜。所以在桂系和谈人选方面，当时也是煞费踌躇的。

就在这时，孙科内阁垮台。国民党东拼西凑，急于想组成一

个新内阁，才可作为和谈的又一方。在各派系矛盾交织，人事角逐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桂系为了把势力打入行政院，也希望掌握一两个部，于是决定提名李汉魂入阁，让刘斐担任和谈代表。何应钦虽与李汉魂并无特殊关系，可用了李汉魂一人，就可以讨好广东、广西两方实力派，也就表示欢迎了。这样，李汉魂就由参军长改任内政部长。

李汉魂对内政部的新任命是一番计算的。首先内政部表面虽是清水衙门，但根据新组织法，归并社会、卫生两部，掌握了大批美援救济物资；其次内政部有两个警察总队都有 2000 人的编制，也算是一支武装；再次内政部名义上还统隶一个特务机关——调查局。从这三者着眼，李汉魂走马上任，接掌内政。他上任后的三把火就是派亲信林维珍赴沪，接收旧社会部存沪仓库的全部物资，准备全部运往广东；调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长汪业洪为专门委员，简派其亲信廖琪统率全队，集中广州待命；通过李宗仁，力争派张益民为调查局副局长，插手调查局。（张益民原系中统特务，过去曾在李手下做过乳源县县长。其兄张导民曾任李手下的财政厅长，是李、白的一员大将。）调查局方面季源溥虽有异议，但禁不起压力，最后终于让李汉魂如愿以偿了。

1949 年 4 月 20 日李汉魂私下告诉我说：“和谈破裂了，除了李宗仁赞成和平外，其他委员一齐反对，连白老总也反对 8 条 24 款。”他让我注意解放军军事行动消息，随时和他联系。当天下午南京听到炮声，胡耐安告诉我：“美国看来不会插手。”第二天，李汉魂就开始动员遣散，准备回广州老家去了。

在广州期间

李汉魂到了广州以后，开始为桂系把持政柄大肆活动。他首先把政务次长军统特务唐纵排挤出内政部。接着就拉拢广东地方实力派所有袍泽，协调粤桂关系，排挤蒋介石在粤势力。他坚决

反对把各部会迁台的主张，声言中央政权决不应离开大陆，同时也竭力反对蒋介石重新出山。他当时的做法十分露骨，蒋介石很快就知道了。7月，何应钦因通货膨胀无法收拾而辞职。蒋介石乘机飞穗，住在狄道路，亲自发号施令，蒋桂冲突开始表面化。

蒋介石授意薛岳，主张行政院各部会立即迁台；主张立法院开会寻找由蒋重新掌政的途径。这样，国民党中央党部首先就行动起来，接着国防部所属单位也纷纷迁台。李宗仁、白崇禧、李汉魂、余汉谋联络了西南川滇军政首要，力主迁渝，同时又制造舆论，声言总统引退后不能复任。双方对台戏唱得十分热闹。原来何应钦倒台后，大家都准备去职，李汉魂听到我自请遣散，大为不满，叫胡耐安通知我自行收回。这时，李汉魂突然不到部办公，躲在东山新河浦家里，他叫我每天下午4时到东山新河浦联系，决定对外发布新闻内容。我当时不明究竟，后来才知道，风传蒋介石在狄道路官邸曾拍桌子大骂说：“看你李汉魂有几个脑袋？”从此李汉魂就深居简出，警卫加成两个，总是一前一后跟随保护。李汉魂躲起来以后，他开始表示倦勤，但他通过胡耐安暗示我，叫我安心，如果他下野，对我也会有安排，不要先行异动。后来他又征询我是否愿意随他赴衡阳，暗示他不干内政部长，可能到白崇禧处任兵团司令（后来这一缺由白崇禧的参谋长徐启明兼任）。我当时未作肯定答复，只推托个人有家眷拖累，要首先作好安排。经过了10天的倦勤，蒋介石返台了，这样，李汉魂才出头露面。接着，在多方拼凑下，阎锡山做了最后的送终行政院长。阎锡山从山西逃亡，是光棍一条，到此全靠桂系和各地方势力帮衬。这样，李汉魂继续留任内政部长，衡阳之行也就打消。

华中解放军前锋直指湘边。当时，白崇禧把主力龟缩在茶陵、莲花、酃县三角地带，准备伏击。这一计划在白崇禧看来，十分有把握。当时，我每天要为李调整军用地图的战局态势一次。记得那一天早上，李汉魂问我莲花在哪里？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图上画了个圈说，白老总计划在这里决战。可是，接着湘中传来消息，

说是程颂云将军开始与中共商谈局部和平，情势不稳。李汉魂立即奉命去长沙，把李宗仁的亲笔信送交程。白崇禧为了加强压力，也赶到了长沙。第一步是劝程潜立即来广州，出任考试院长，如果程不就范，第二步就准备通过陈明仁，推倒程潜，把他软禁起来。总的说，也就是先礼而后兵的做法。

李到了长沙以后，立即会见程颂云，力劝他全始全终，去广东就职。同时还强调美国必将干涉，国内局势还有变化。但是程的态度很“暧昧”。李、白研究再三，正准备走第二着棋，突然程透露了准备同机去穗的消息。为了对程施加压力，李汉魂就飞电广州，把程潜的新任命立即见报，造成既定局面，使他骑虎难下。谁知这都是程的金蝉脱壳妙计，第二天他却已微服离长沙到湘乡暂避。等白崇禧发觉，慌忙执行第二步，却已来不及。接着陈明仁将军和程潜将军联名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李汉魂的说客全盘落空。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的侧翼完全暴露，于是他不得不放弃“三角”计划，把重兵移到湘江两岸。他的战略部署至此完全被打乱。

长沙解放后，战局急转直下。今后究竟怎么办？这成为桂系内部的主要问题。

大体而论，李宗仁仍有倾向于有条件和平，但白崇禧则一味迷信武力，主张顽抗到底。李汉魂回粤以后，态度很暧昧，开始脚踏两条船，摇摆起来。

李汉魂对白崇禧的计划很赞赏，认为白崇禧有张淦、夏威两个精锐兵团为核心，再辅以徐启明、鲁辽源、黄杰三个兵团，可以固守广西，万一战局不利，还可退向海南岛或越南。为了配合白的部署，李汉魂在8月中命令内政部第一警察总队全部集中南宁待命；同时又派亲信总务司长李敏为柳州办事处主任，并命令所有亲随人员将来以柳州为第一撤退基地。

另一面李汉魂也接纳了胡耐安的意见，开始向第三方面试探。为了待价而沽，李汉魂还为胡耐安活动了一个蒙藏委员会委员的

空衔。他首先写信给他的老上司李任潮（济深）将军，就国内形势问题向他请教，同时又写信给旧粤军袍泽吴奇伟、蒋光鼐进行试探，又和余汉谋、张发奎交换意见，商量广东自保。后来他还和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交换意见。但李汉魂的和平试探在这一时期还是表面形式，主要还倾向于白崇禧。

最后挣扎

1949年10月10日解放军向广州疾进，李汉魂在当天下午飞桂林，与白崇禧会商，临走前通知我们17人，在翌日飞柳州待命，不必去渝。当时他确是准备和白同进退的。

谁知11日柳州有雷暴雨，飞机无法降落，于是大家都到了重庆。李汉魂也在12日到渝，但接着他又奉命飞柳州，转海南岛，商量粤桂联防，奔波了一周才再回重庆。

在这一时期，李汉魂很少到内政部来，总是在神仙洞街理事，因此我也每天去那里候他。这样，就经常和胡耐安、林祥珍在一起闲扯。胡耐安算是李的唯一智囊，到渝后常常和李彻夜谈心。胡又和我关系最深，为了前途也总和我一起商量。据他谈：李汉魂海南之行扑了个空，他原想拉拢陈济棠，搞粤桂联防，把海南岛布置成为桂系的海上巢穴。但结果薛岳赶到，一手拒绝了白崇禧的计划。因此，李汉魂归来后十分苦闷。

李汉魂自广州解放后，对白崇禧的武力政策开始动摇。他虽然认为衡阳战役第7军李本一部能够突出重围，战斗力的确不弱，但独立难支大厦却是事实，因此他试探和平的倾向强烈起来。这时，西南酝酿和平的空气甚嚣尘上，惹起了蒋介石的担心。于是蒋命令川东孙元良兵团、宋希濂兵团加紧控制后方。为了在万难中打出局面，李宗仁又派李汉魂同白崇禧最后协商，希望白全师出马场坪，向四川靠拢，以便用实力作后盾，进可以战，退可以和，更不怕蒋介石的掣肘。当然，这计划几乎是个全盘更改，白

崇禧以难以执行作为推托，拒绝了这个计划。李汉魂从此心乱如麻，再无定计了。

他虽然还和熊克武、但懋辛、杨森、邓锡侯等不断交换意见，但手里没有兵，既难战又难和，确实进退两难，智穷力竭。胡耐安看到桂系万难打开这一局面，就在取得李汉魂的同意后，先行飞蓉，间道赴港，一走了之。

11月中旬，解放军已长驱入川，大局便转入最后决定局面阶段。突然，陈立夫、吴忠信微服抵渝，为蒋介石的出山重作安排。那一天，李打电话叫我下午7时去神仙洞街。我到他家时，他不在，于是我就和林维珍、李家骥一起坐候他。直到9时，他才返家。当时李汉魂神情沮丧，不断叹气，看见我还在等他，他只说了一句话：“和陈立夫谈了一个下午，毫无办法。”

第二天听林维珍谈，原来李汉魂和陈立夫在会谈蒋、李易位问题。结果李宗仁径飞昆明避风头，留李汉魂在重庆折冲。这时美国议员诺兰来了。诺兰被李汉魂招待在求精中学，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会后又和李进行了会谈。诺兰当时一味诉说“中国人民反共任务的艰巨”和“美国的友谊”，希望国民党坚持到底。但对李汉魂要求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和对华政策、态度的明朗化，却支吾其词。诺兰承认大陆上的战争是无望的战争，国民党已不太可能在大陆上再行立足。但他又强调坚持的意义，认为美国需要国民党争取时间。诺兰来后，李汉魂就更加沮丧，甚至有点暴躁。

接着，美国旧金山侨领周锦朝从台湾飞渝，代表美国上层侨领向李宗仁献剑。李汉魂和周锦朝私交甚密，他亲自到机场迎接。归来后他对我说：“明天我到昆明去，陪周锦朝去看李代总统，大概三天回渝。在这三天里你快些把《拉丁美洲纪游》初稿全部结束，以便回渝时立即带香港付印。”这样，李汉魂就离渝了。他当时也没有料到再也不回来。同样，我们所有亲随人员也没有这种准备。

李飞昆明的第二天，突然蒋介石亲自飞到了重庆，而且立即

亲自部署一切，公开声言国民党将作战到底，他誓不放弃四川。接着蒋经国还驰赴彭水前线劳军，想设法阻止宋希濂兵团的后撤。在蒋介石、蒋经国、张群、陈立夫和美国诺兰以及美国顾问团雷厉风行的控制下，桂系在西南的政治权力完全被排除。蒋介石电召刘文辉、邓锡侯、卢汉来渝，逼迫他们保证效忠，同时命令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控制所有航空机位。李宗仁虽仍然名为代总统，李汉魂仍是内政部长，却在昆明也无法立足。在蒋、李关系完全恶化的情况下，李等狼狈飞往南宁，托庇于白崇禧。经与白进行会商后，白崇禧仍然拒绝任何和平试探的做法。这时李汉魂对军事抵抗也已不寄以任何希望。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两李逃往香港。抵港后，李发了一函给常务次长何彬，嘱咐他把所有亲随人员设法安排，送返香港。他表示即将随李宗仁去美，一切已无能为力。第二天香港报纸就登载了李宗仁、李汉魂飞美消息和他们的一封痛斥蒋介石的电报。

我们所知道的戴季陶

徐晓林 陆雅乾

作者为戴季陶的部属及生前好友。本文较详细地介绍了戴季陶一生的主要经历及生活轶事。

戴氏名博贤字季陶，早年从事记者职业，用天仇（或戴天仇）笔名；1922年后皈依佛门，法名“不空”。祖籍浙江吴兴县戴山，其祖父迁居四川金堂，经营磁器。其父以行医为业。戴于前清光绪十六年农历 11 月 26 日（1891 年 1 月 6 日）出生，排行第四，故侄辈均称其为四叔。戴幼年天资聪颖，随家人常往返于长江上下，一度落水，经人救起，成年后再度投水，也被救人救活，因而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自高自傲之感。他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校；14 岁私自离家去沪；16 岁（1905 年）赴日留学，在日本大学学习法律。由于他勤奋学习，且精通日语，在校时被推为该校留学生会长（当时同学有原《大公报》主编政学系的胡政之等）。在日留学期间，戴氏阅读各类书籍，甚至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因而其思想也较激进，但当时并未加入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 年）夏，戴大学毕业归国返上海，开始为一些报纸投稿；后自己上书江苏巡抚瑞徵（当时巡抚府在苏州）求职，被派到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官，并兼在中外日报社任职。后因故离教官任，专使记者。1910 年初，《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招考各省新闻编辑员，月薪 30 元。戴往应试，陈出题面试，限 1

小时交卷，题论及时政，并多次质询，为陈氏所欣赏，被选为编辑。戴进入报社后工作努力，且文笔犀利，使报社声誉剧增，不到一个月，即被升为总编辑。

戴氏在苏州任教时，常往返于苏沪之间，一次偶然机会，戴与钮有恒在火车上相识。钮氏在当时属稍有文化、思想较开放的妇女，由于同系吴兴人，对戴当时之处境深表同情。戴氏系记者，与宋教仁、于右任、陈其美所办之《民呼报》等有联系。当时吴兴籍人士在沪颇多，常集于陈其美等周围，适有高氏（吴兴人）与戴、钮俱熟，从中撮合。于1911年初春，戴氏与钮有恒结婚。

此时，戴氏暂离《天铎报》，未几返任。由于戴著文屡攻击清廷，文笔锋利，使清廷甚感不安，逐下令缉捕戴氏，并封闭《天铎报》。戴氏经人相助逃往日本，后转到马来西亚西北部岛屿槟榔屿，在槟城（亦称乔治市）《光华报》任编辑，该报为南洋华侨陈新政所主办。因戴自任《天铎报》主笔后，他的革命思想早已显示，因此到槟城不久，即由陈新政介绍，黄金庆主盟（黄是他的另一介绍人）在槟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戴即由槟城返沪，在沪与周浩共同创办《民权报》（该报为当时同盟会内自由党之实际负责人李怀霜所主办，实为自由党之报），戴任主笔。

在这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戴在苏州之时（1909年），正值陈病、柳亚子等于苏州创立南社，戴与他们熟悉，其后亦加入了南社。后戴氏与先后加入南社的邵元冲，叶楚伧，沈定一，陈布雷，于右任，吴稚晖，邵力子，钮永建，陈去病等常有往来。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返沪，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戴以《民权报》记者身份参与并请见。他对答流利，思想敏捷，次日内容刊于报上，轰动沪上，遂为孙中山所器重。

戴氏主笔《民权报》，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袁世凯，文笔锐利，立场坚定，深受革命党人的欢迎。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改由袁氏担任，并派专使到北京迎袁南下就职。其时戴亦以《民权报》记者身份作为随员参加。结果袁玩弄手腕，指使曹锟兵变不肯南下，

后南京参议院允许袁在北京就任。专使返宁，戴亦随返。返沪后在《民权报》上发表反袁文章，遭袁所忌，曾买通租界对戴给予逮捕，后为张静江所保释。戴氏仍任该报主笔。

袁氏就职后，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戴为同盟会员，且与陈其美、张静江等为同乡，就被聘为孙之秘书，从而一直追随孙之周围，而成为国民党内的核心人物。

1913年2月，孙中山作为铁路督办，赴日考察日本铁路工商情况，戴作为秘书随行，并兼任翻译。袁世凯派人在沪暗杀宋教仁后，孙即停止考察，率团返沪。戴氏随孙此行，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因而更为孙中山所器重。

戴氏随孙中山返沪后，与孙中山、陈其美、居正一齐到黄兴家中讨论对宋教仁被刺案的对策，当时黄仍企图以法制办理，要冷静对待，而戴认为对袁无法施之以法，而应提倡推翻袁。戴之发言引起黄之大不满，痛斥戴为何许人，不应在此多嘴。

戴氏由日归国后，因孙委以他任，即辞去《民权报》主笔。当时国民党在沪创办《国民月刊》，由戴氏及王宠惠、邵元冲等主办，由孙中山及黄兴选文。

与此同时，戴氏受孙氏之命从事反袁活动。7月份李烈钧宣布独立，爆发“二次革命”，其后上海、广东、福建相继宣布独立。此时戴去东北发动兵变，但未成。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由胡汉民陪同由福州经台北赴日本，在日人掩护下转移到东京（当时亦称江户）。后大部分国民党员遭袁通缉，戴亦为被通缉对象。由东北返沪后，戴氏即携家属随革命党人流亡日本。

戴氏在日本时，仍任孙中山之机要秘书，负责中华革命党内的机密文件保管，同时兼任孙之翻译和必要的会议记录，加之孙常外出需人保护和陪伴，此亦常为戴氏之任务。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组织讨袁军，由陈其美、居正、许崇智领导其事；邓鎧、蒋介石等参与。一些党中军事人员如邓鎧、蒋介石等陆续离日返国，为了使他们返国时能安全在沪租界上岸，

孙、戴曾到美驻日使馆联系，给予协助。1914年春，孙中山令居正在东京发行《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为主编，戴亦常为选稿。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各地反袁护国声势猛增；袁被迫废帝，各省陆续独立。在此形势下，孙于4月27日由日返沪。戴亦携眷属随孙中山返沪。

戴偕妻钮氏于1913年到日本后，当年末，即生子安国，并雇佣一日本下女为保姆，帮助钮氏抚养安国。此下女名雅安（译音），钮氏在日本多年，学习日语仅能说不能写。戴氏与保姆雅安有私，生过一子，戴氏返国时，钮氏和日妇携安国及此子同归。

孙中山返沪后重点在修书立著，而戴氏则协助孙中山写《民权初步》、《中国存在之问题》。同时孙亦考虑中华革命党改组及筹集活动经费等。经费方面，孙曾考虑申请办交易所，此事发展到后期成为事实，而孙已无力进行，由陈果夫等经办。

戴那时亦为孙中山派遣作一些调查等。在1916—1917年戴就受孙中山委托去过日本三次，以国民党代表资格向日本解释党的政策动向。例如，1917年，田中义一任参谋次长（实权派），他关心中国当时之局势，曾在该年四五月间到徐州会见张勋，他回国后大谈中国复辟风。孙很关心此传说的意义，特派戴去日了解此情况。戴到东京后即会晤陆军田中中将和海军秋山中将。当时秋山囿于当时日本政情不能直言，而以各种神奇比喻暗示戴可能会出现复辟，但不日可平（戴氏与我们谈此事时气氛颇神秘）。戴在此情况下，迅速由日返沪，到沪后恰张勋复辟，未几日“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张勋逃跑，复辟丑剧结束。戴返后向孙氏汇报。

是年7月，孙中山离沪去粤，当时护法恢复国会之声颇高，大部分议员南下，成立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并成立军政府。其时戴亦去粤，仍为孙之秘书。主要为孙中山选举写有关策略性文件（戴氏自1916年由日返沪后即搞政纲起草，经孙中山修改过四五次），并多次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去日向日本人士解释护法等事项。戴后任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末期曾兼任过大元帅府

秘书长（先为汪精卫、古应芬、章太炎所任）。在林森任外交总长时，戴曾在后期出任过外交部次长。

1918年5月末，军政府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孙携家属返沪。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与戴氏均随孙返沪。

孙中山返沪后决定著书立说，同时令党人进一步筹划经费，扩大宣传。戴氏则与其妻钮有恒商定，举家迁居湖州潜园。

潜园在湖州城内，又名陆家花园（现为湖州开放花园，正名为陆家花园）。此园是陆雅乾的曾祖父陆心源（号存斋）的私家花园。陆心源是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在园内建有多个藏书楼，最有名者为皕宋楼。陆心源死后，皕宋楼藏书为日本人岩崎子爵购去，现存于日本三菱集团所属静嘉堂文库。抗战时期全园房屋多遭日本人及汉奸破坏。陆家除陆家花园外，另有私宅二处，一处由其长媳周氏居住，其门楼楼房曾租给革命烈士钱壮飞的家属居住；另一处为他房所住老屋。陆雅乾的姑母陆秀清与戴妻钮有恒系同学好友，因此戴氏征得陆家同意后租赁潜园内侧五开间房屋居住。戴、钮还认陆秀清的母亲周氏为寄亲。从此戴、钮就一直租居潜园，到1928年迁居南京后仍继续租用。

戴氏举家迁居湖州潜园，主要是便于他安心在沪及它地工作，二则张静江亦常往返沪湖之间，张家居南浔，有时常到湖州后再返浔，因而有时亦能由沪同伴相返。

戴氏安置好家眷后，即常往返于沪、湖。在沪时，开始常追随于孙先生之侧，并为沪地一些报刊选稿。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戴由于在日本时曾看过不少共产主义的书，凭藉其文笔与口才在推动工人运动方面起过一定的影响；当时他还与社会主义研究会人士相熟并介入劳工及学生运动。

1919年6月8日，孙中山派戴氏及沈定一等三人主编《星期评论》，对劳工问题进行研究，并鼓吹社会主义不遗余力。8月初，孙氏命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氏5人组织建设社，并由胡、戴、朱、廖四人主编《建设》月刊。戴氏在《星期评

论》和《建设》月刊上发表过不少鼓动人心的文章，其中也包括与康白情的笔战。4月，中华革命党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而戴一方面仍在孙之左右主编刊物，另一方面仍与劳工运动不断接触。当时常约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为《星期评论》等写稿。时值共产国际成立不久，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辛斯基来沪找陈独秀、李汉俊等讨论共产党建党问题时，沈定一及戴氏亦参加。戴因跟随孙中山而不愿卷入太深，于1920年6月偕同胡汉民同返湖州潜园。胡、戴离沪事曾遭朱执信著文批评。

胡、戴在湖州未住多久又俱返沪。时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开展得十分活跃，国民党因为进一步活动需要经费，因而酝酿开号子介入交易所投机事业。戴为此事常往返于湖、沪，与张静江等商量筹建“恒泰号”。是年末，由陈果夫为经纪人，以张氏家族及一些湖州人为主开办。时戴氏、陈果夫、蒋介石等均以国民党基金入股，戴以小恒记入股。这样，张、戴常协助陈果夫涉及交易所事，蒋因常往返于闽、粤、奉化，而间断去沪。戴除与孙、胡等保持联系外（时孙、胡已在粤），偶为报刊写稿，与共产党人接触减少。1921年交易所股市看好，张等获利不少，除给粤军支助军费外，戴等亦在沪过着奢侈生活。到1921年末1922年初，股票市场猛跌，恒泰号亦深受其害。张、戴、陈纷纷离沪返湖避债。由于张家底雄厚，回南浔逍遥自得。戴则躲避于潜园，为避索债人，装疯卖傻。其时一切经济开销均靠孙氏由广州寄供。

在这个阶段，就戴氏的私生活讲，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由于戴氏此时生活颇需人照料（因戴氏为避债等装疯卖傻），常用钮氏及其内侄女赵文俶协同照料，未几戴与赵发生不正当关系，于1923年生女赵戴子（即戴家祥）。另外，也是在这一年，戴氏在日本之保姆雅安（译音）因在日本生活艰难，因而于1922年夏天到湖州寻戴氏，亦居潜园。雅安在湖州之时，戴氏仍偶有装疯之举。雅安在湖州潜园住了数月，为钮氏所忌，给钱令其返日。

由于这一些情况，戴在1922年中精神状态极为沮丧。且此时

赵文俶之母已将赵许配他人，因而戴内心处境更为苦闷。适孙中山在穗曾催戴氏去粤襄助，戴亦作携眷去穗之准备，家属均备新衣。后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于8月中率党人返沪另寻新出路。适四川督军刘成勋派向育仁、吕超到沪谒孙中山，拟依附于孙。孙派戴随向、吕赴川，赵氏之弟赵之田陪同前往。戴氏此行一方面为工作之需，另一方面为摆脱家中之窘境，再者戴氏离川多年均未返过，此时戴母仍在川，戴亦想返川探母。当乘船沿江而上之时，获知川军又开始混战，船航行于宜都附近，戴氏投水，后被人救起，乃仍随诸人同去川。关于这次投水之原因有多种说法，戴氏公诸于外界之说是由于川军混战，将使其到川组织革命部队之事增加困难。而赵文田在《江苏文史资料》上介绍，是由于当时赵文俶将出嫁，戴氏为此事内心极为不安和矛盾而寻此短见，因被人救起，才向赵氏诉说心病。戴氏以后只说是不慎失足落水。戴氏抵川后，在1922年冬被川省议会选为省宪起草员，赴渝就职，受到重庆军政界欢迎。戴解释孙中山对时局的主张，希望川军间避免混战，并介绍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戴氏在川期间，建立了四川支部。后由于川地局势多变，戴较长时间在成都，并皈依佛门。1923年，国民党改组工作将进行，孙中山派代表团去苏联。戴氏也奉命返沪，唯因川地战事交通受堵，花了两三个月绕道而行，在12月上旬抵沪。

年初时，在沪召开党务改进会议上，戴亦被推为参议。后来，孙中山又返粤任大元帅，策划改组国民党，戴氏又被委派为五名改组委员之一，于1924年元月初去穗参加国民党一大。

国民党一大时，戴氏先后担任宣言、党章、宣传问题等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上作宣言审查结果的报告。会议中戴被选任为一大中执委，并在一次中执委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会后中执委、中监委（包括候补）分成中央（即两广）、北京、四川、上海四个分部，戴氏被留在中央，而胡汉民、张静江、叶楚伧、沈定一等在上海分部。戴虽为中央分部执委，但会议结束

后，即借口由川方返不久，家中需安排而返沪。戴返沪后原想在沪搞收集整理中国近30年政治文献的工作。这一工作的经费已在上海执委会上批得，后因戴又被黄埔军校任命，只好去穗任教。是年4月末，孙任命戴为大本营参议。5月，黄埔军校开办，戴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戴氏在穗期间，亦尽其宣传部长之职，创办了中央通讯社。但是戴在黄埔军校为时不久，因与鲍罗廷关系欠善，不久即返沪，常往返于上海、湖州之间，其政治部主任由邵元冲继任。

戴氏返沪后，除与沪地执监委有往来外（当时胡汉民已去穗），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州阅读书籍。由于戴对国共合作及联俄有不同看法，但又有别于国民党右派的一些极右做法，因而想从书本上寻求这方面的协调，建立他自己的一些系统的认识。

是年9月初，适逢江浙军阀战争爆发，湖州受战事影响，戴氏携家眷逃往湖州戴山乡下，其时蒋纬国随姚氏一齐来湖州共住戴山。10月上旬，江浙战争结束，戴氏再返湖州潜园。是月，冯玉祥发动“反直”的北京政变，并提出邀请孙中山北上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应允北上，一行于11月中旬起程，由沪取道日本赴津转京。孙中山抵沪后，即命戴氏陪行，并兼任去日时之翻译。12月初，孙中山到天津，因患感冒不适，加之北方军人组织临时执政府拥段祺瑞临时执政，孙中山对去京效果颇忧虑。戴因经日本的任务已完成，征得孙中山同意，与邵元冲由津返沪。孙中山为表示诚意于年末抱病抵京，1月份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检查证实罹患肝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京召开紧急会议，戴氏为政治委员，即又由沪返京。当时党人中汪精卫、宋庆龄、何香凝、孙科、戴季陶、张静江、邵元冲均待于孙氏侧外，后于右任、吴稚晖、宋子文等亦来京照料。2月中旬，孙中山因无法治疗而出院，居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家。孙中山在病中，时与戴氏谈有关问题。3月11日孙中山先生已不能进食，于12日晨9时许逝世。当时遗嘱签署人为汪精卫、戴氏等9人。戴氏对孙中山的逝世颇为悲痛，

自 15 日遗体大殓，到 23 日哀祭，一直到 4 月初接待各界，戴均参加，且发表以“孝”为题的专文纪念孙中山，并在 23 日哀祭时宣读祭文。

5 月初，汪精卫、戴氏等陆续回广州。在穗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会议之宣言及训令均出于戴氏之手，他还在会上发表了《民生哲学系统表》，深得国民党右派的欢迎。戴氏自以为是国民党的理论家，会后即离穗返湖州写书。是年 6 月抛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亦称《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7 月抛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两本书实际上成为各类右派的理论依据，由于戴以往的经历和打着是孙中山追随者的幌子，迷惑力更大。此时戴氏的一些观点不仅受老的右派（如后来的许多西山会议派人士）的支持，而且在 6 月中的中央全会上胡汉民、许崇智等均给予支持。戴氏之书在黄埔军校所起之作用亦极坏。当时鲍罗廷对戴氏痛恨之极，骂他是戴季陶魔鬼（第五个魔鬼）。戴氏自己对鲍氏亦始终有看法。7 月初，原政治会议改组，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于广州，选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为常务委员，戴被任为委员。此时戴一直在上海中执会机构中，因上海中执委有不少人支持他，同时戴与蒋介石亦通过陈果夫仍有间接联系。

此后因“西山会议”之事，戴氏演出了一出闹剧，使戴氏之一生也出现一定的转折。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就不满。在成立国民政府后，当时在穗的一些右派如胡汉民、邹鲁、谢持等对有些事本亦有异议。8 月，廖仲恺、陈秋霖被刺。胡汉民由于其堂弟涉嫌而被迫辞职，并出使苏俄。而在廖案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的“三人特别委员会”控制政军一切权利。邹鲁、林森等人则认为国民党实权为鲍罗廷所控制，心极不满。此时，国民党中央派邹鲁、林森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他们认为是被有意排挤。因而在邹鲁过上海时，与上海中执委谢持、叶楚伦、邵元冲及戴氏等协商，决定在北京开中执委一届四次会

议。但因遭北京中执委于树德反对，开会地址无着落，于是林森等决定在北京西山借总理北上一周年纪念之机开会。这样，上海中执会就陆续抵京，戴氏也与邵元冲、沈定一等同往。到京前，大家对会议内容有所协调，故而戴来京参加。但到京后，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弹劾汪精卫，清除共产党；而第二种意见，实为戴氏之看法，主张采取缓和态度，即对汪为劝告，而对共产党的处理与李大钊相商而定。因而在 11 月 18 日参加的预备会议上，戴就其看法发表了意见，吴稚晖也同意戴的意见。不料，戴之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于当天晚上在西山戴的住处，一些人绑架并殴打戴氏和沈定一，而后又架到同志俱乐部威胁戴氏，让他讲沈定一是共产党，戴仍为沈定一辩解。因被绑架后无人前来劝慰，甚为气愤，决定不参加会议，并发表了书面声明，且于 19 日乘车返沪。由于在声明中曾提及在一定的主张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因而西山会议纪要中也俱有戴之名。实际上戴并未参加正式会议。其后，国民党右派在西山召开了一届四中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戴觉得此时国民党左右两派之间已不能弥合，而他自己是变得左右不逢源，殊为懊恼，一气之下遂于当年（1925 年）12 月中旬向中执委（广州、上海部分），中监委等机构提出辞职，表示今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于发电之次日即返湖州。

回到湖州，戴氏心境及情绪上极不平静，开始似有精神恍惚之状，潜园的一些熟人亦常劝慰。

1926 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大，当时汪、蒋联盟控制局势。由于蒋等对戴的照顾，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给以训令处方，不准戴氏再写文章和活动。戴未参加此次会议，一直在湖州养性。时值朱家骅（湖州人，原在北大任教亦失意）由北京返湖州，终日至潜园与戴氏谈心、奕棋，并陪伴读书，讨论国内外事。其后戴的儿子安国即由朱家骅通过留德同学会之关系到德国读书。

是年 4 月蒋排汪成功，5 月控制广州局势。张静江被选为中常会主席。由于戴与张、蒋以往的关系，戴氏有去广东之打算。适

胡汉民由苏联返粤后抵沪，戴与胡相商去穗之意义。大约6月初，顾孟余辞广东大学校长职，国民政府命戴氏继任。当时戴氏仍在湖州。8月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后，戴氏才与朱家骅一齐去穗。当时中大内派系斗争激烈，为形势之需改校长制为委员长制，戴为委员长，朱为委员，而校中之事均委朱氏处理。朱氏通过整顾，于次年恢复校长制，戴仍为校长，朱为副校长，一直到1930年9月戴辞校长职。看上去戴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中大任职，其实并非如此。戴抵穗后，常参与张、蒋之政事，为张之座上客，并任中执委之职。中大的一切工作均由朱代理。

1926年7月北伐军陆续占领武汉、南昌等地。此时蒋介石已作好下一步的各种控制政府的准备工作。委派戴氏为国民政府代表于2月15日坐日本山城号船去日，与日本外务省官员会晤，要求日政府在外交事件上先向南方政府商议，并以国民党同志资格求得日本朝野谅解。但戴氏此行收效不大，日本人尚持观望态度。不久，戴即由日返沪。

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张静江、陈果夫等偕同辞职。惟戴因无实职，未受波及，在沪、宁间居。9月，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在中监会临时南京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政府，戴属公推委员，并委为宣传委员。

11月蒋介石由日返国，南京政府复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命戴氏、邵力子、陈果夫等办《新生活》月刊，其后蒋通电复职。1928年2月，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基本上由蒋所操纵，会议之宣言均出自戴氏之手。会议选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将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执委常委，戴氏亦为中执委常委。3月，中常会任命戴为宣传部长。7月，又任戴为建设委员会委员。

6月中，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完成，决定7月初在北京公祭孙中山，然后召开军事整编会。会上决定在五中全会上主要议项为裁军和取消地方政治分会。此议项遭到各派力量之反对。因此，8月的五中全会进行欠顺利。戴氏本身为该会议

的主角之一，但在会议期间却陪李济深游莫干山。此次会议中推出戴氏等 46 人为中央政治委员。

9 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再次合作。胡提出五权宪法，设五院制。戴氏参加五院组织法工作，同时任组织法起草委员兼任审查委员；10 月戴被任命为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并担任外交委员会委员。

早在五院成立之前，各院分设筹备组。考试院负责人即为戴氏，筹备处设在羊皮巷 15 号，羊皮巷邻近于当时的总司令部的三元巷。筹备处地址的选择是由当时总司令部副官处办理，其中张一宽副官专管考试院筹备处事，他后来就调至考试院秘书处任总务工作。

在筹备处时期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是：制定有关考试和铨叙的规章制度。首先聘请了一些研究我国历朝考试制度的专家和教授进行这方面制度的制定。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考试院办公大楼及考场，地址选在南京鸡鸣寺旁台城附近的武庙（即现在南京市政府的办公地址）。其初步建筑规划由建筑师卢毓骏主持，由戴氏核定。这项工程是先以武庙的大殿作考试院的大礼堂，大殿后面造了一层宫殿式的新楼叫“宁远楼”作为考试院的办公处所。在大殿左廊为考选委员会办公处，右廊是铨叙部办公处。后来在鸡鸣寺和武庙之间又造了考场叫“明志楼”，也是宫殿式，共有四个考场，上下各一，左右各一。后来又造了“衡鉴楼”，楼后又造了“公明堂”。“衡鉴楼”由考选委员会进驻，“公明堂”作为阅卷处。而原来武庙左廊让给铨叙部办公。靠近鸡鸣寺一带是考试院高级职员的宿舍，院长办公室就在最前头，有大门出入叫“待贤馆”。

考试院成立时，孙科任副院长，不久即由钮永建继任，其后朱家骅、周钟岳、贾敬德也担任过。院部设有秘书长，下设秘书、总务、议事等科，另设有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首任秘书长是陈大齐，秘书处总务科长许崇灏，后陈大齐调任考选委员会委员

长，秘书长由许担任，而秘书处议事科长为魏重阳。在院部另有参事室，首席参事是桂崇基。

考选委员会设正、副委员长及若干考选委员，下设各处。它的职责是筹备和负责考试法规的拟定及负责办理各类考试事务。首任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为邵元冲，副委员长王用宾（山西人，系阎锡山的属下，其子当时在蒙藏委员会工作）。

铨叙部长最早为钮永建，钮升任副院长后，部长调动颇多。贾敬德（阎锡山手下人）、石瑛、李培基均做过铨叙部长。铨叙部主要负责国民政府各级机构及各地方行政机构工作人员资格的审查、考核及公职等级的评定调迁工作。

抗战时期在重庆，五院秘书长升格为特任，考试院秘书长改由原立法委员史尚宽担任，另设主任秘书，由原铨叙部司长宋湜（宋香舟，戴之外甥）担任，另设人事处，由考试院参事刘光华兼任处长。

考试院的一项主要工作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同时任命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等。这项工作由考选委员会考试选拔，由铨叙部任命。考试主要分高等考试及普通考试两类，另外还有特种考试。参加高等考试必需有大学文凭或通过同等资格检定考试，参加普通考试需有高中毕业文凭或通过检定考试。第一次高等考试于1931年在南京举行。考场设在前中央大学（现南京工学院）大礼堂及体育馆，时间自7月15日开始。在进行考试前选邀一批专家学者或教授任典、襄试委员。典试委员长为主考官。在临考前十天，主考官、典、襄试委员提前就职并陆续进入候府前的江苏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进行出题阅卷等工作。当时为了杜绝流弊，待有关人员进入后即对大门进行封闭，停止一切与外界的联系。由于戴氏为第一届高考的主考官，亦被禁闭于内，院长办公室人员也只好奉陪。直到发榜之日（前后约月余）才允由该校出来。

第二届高等考试于1933年举行，是在新造的考场（明志楼）进行。

但是第二届起戴就未担任主考官（典试委员长）。

戴氏主要精力是在主持考试院的工作，但是鉴于他在党内的资历以及他与蒋介石和一些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他经常被任命为各种机构的委员、部长等挂名职务。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有争，将胡汉民扣压并软禁于汤山。徐晓林当时在戴之考试院院长办公室工作。按当时的惯例，每天早晨由中央党部组织部总干事张道藩来电，告知当日需向戴汇报的有关事项。3月1日晨六七点钟，突接张道藩来电，告知昨晚胡汉民被蒋介石所扣留了，要徐晓林立即去呈报戴氏。当徐放下电话想去上房（当时院长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戴氏家居住的五开间平房为上房）面呈，即看到胡汉民女儿胡木兰穿着长袜和旗袍，面带愁容，匆匆向上房走去。她的来意很明显是诉述其父被扣的情况，因而徐无法去上房面呈，仅能将张道藩电告情况书面呈报。胡木兰在上房谈了不到一刻钟就离去。随后戴即乘车去中央军校（当时蒋住在军校的一座楼房内）。半小时后，戴氏即赌着气板着脸回来，蒙头睡觉，连公事都不办了。因他被蒋训斥，怪他多管闲事了。下午，戴又急忙乘车外出。后来得知他和吴稚晖到汤山去劝胡汉民，又被胡讲了一通。由此可见戴氏当时的协调和为难的处境。

1931年末，在国民党的四大上，宁沪粤再次合作，蒋介石再次下野。戴氏、于右任也辞院长职。戴氏未参加四届一中会议，反而偕钮有恒同返湖州潜园，并带二排卫兵同行，一时湖州传为佳闻。戴氏不参加此次会议之原因是与蒋之退让有关，同时也觉得自己无实力去竞争。这次会上戴氏未被选为中常委及国府委员，但继续被留任考试院长。

1934年，戴与诸民谊、居正等在上海发起“时轮金刚法会”，推段祺瑞为理事长，戴氏、诸民谊、王晓籁、王一亭等为副理事长。于4月28日在杭州正式开展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在杭州灵隐寺设道场，引起沪、杭群众之反对。1938年4月，戴氏代表政府

到甘孜与藏族宗教上层分子联系。1940年到缅甸及印度访问，拜谒了佛教圣地。在此期间，戴氏先后提出祀孔制礼、中小学课本中增添“四书五经”、“新生活运动”等。

自1935年国民党五大后，戴又兼任中常委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1945年国民党六大上，又续任各职，直到1947年六届三中会议为止。

从这一段时间看，戴一方面皈依佛门，一方面尊孔制礼，但有时却又为蒋筹写有关会议宣言等，作蒋的忠实的助手。这样一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戴氏的身体变差而更甚。

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后改组政府时，戴仍为考试院长。其后为了使青年党、民社党以及社会贤达人员平衡，加之戴氏之身体极弱，在6月改任戴为国史馆长，而离考试院长任。考试院长由张伯苓继任。戴表面上对此无反映，但心中是不愿的。当时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均未调动，因而戴对蒋颇有看法，彼此关系逐渐欠佳。因不再任院长，戴迁到南京五台山私宅，对国史馆事较少顾问。

1948年初戴氏生日时，蒋介石偕经国前来为戴祝寿。戴知蒋车已到，借故推托讲“天大地大不如佛大”而到佛堂念经拒见。后为赵文俶等所劝方出，蒋氏送上祝寿蛋糕，但相谈极为客气。

还有一次，蒋带纬国开车到五台山戴宅。按通常情况，纬国先进内宅通报，蒋在汽车内等候，戴外出迎接，陪蒋一齐进内宅。但这一次，纬国进内通报，戴不外出迎接。原来蒋拟约戴一齐参加某会议，结果使蒋候在门外车内，十分狼狈。足见当时蒋戴之关系已较差。

1948年底，南京政府迁穗，戴氏携家属赵氏（时赵氏腿略瘫）由宁迁穗。因当时广东政府接待他欠礼遇，加之他当时的精神状况欠佳，于1949年2月11日晚吞服大量安眠药，因抢救无效身死。死后遗体运沪，由上海湖州同乡会为其举行追悼会，骨灰由继室赵文俶运蓉。

·工商经济·

〔编者按〕本组史料，较详细地介绍了旧中国审计、税务、邮政等方面制度、人事安排、组织状况、职权范围及创办、发展的过程，对当前我国经济大潮中，如何建立、健全审计、税务、邮政等制度，有着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抗战前的国民政府审计部

季树农

导语

中国有审计制度，不自国民党开始。如果追溯历史，《周礼》所载西周官制，在冢宰（天官）之下设有司专司会计，按年、按季审查各项财政收支；天官之下，还设有小宰掌握财务，其下有宰夫，掌理财政收支有无虚报，接近近代的稽察工作。秦、汉强调中央集权，加强政治经济的监察，设置御史大夫职司其事。隋唐统一，东晋南北分裂，这三朝都加强了审计工作。如唐代在刑部下设比部，成为独立的审计机构，中央官署一切财政收支与京师仓库钱物出入都要按季审查；地方财政收支，则按年报审，是我国审计制度的雏形。宋太宗赵光义淳化三年（992年）在太府寺内设审计司；南宋初期改设审计院，使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审计”这一词汇。

元、明、清三代均未设独立的审计机构。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为了向国外借款，在国务院下设审计处，后改为审计院。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时，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始正式在监察院下成立审计部，这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内容。

一、审计部的组织与职权

国民党政府实行五院制，即国民政府下设五院。它们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院长选任。各院设部，部长特任。行政院下管辖九个部和几个委员会，是五院中组织机构最大的一个院。监察院机构最简，下辖一个部即审计部。监察院设监察委员，委员人数由宪法规定：各省 5 人，直辖市各 2 人，蒙古各盟旗共 8 人，侨民 8 人，共约 200 人。审计部设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各一人。

审计部部长、次长以下是审计，约有 10 余人，均为简任。审计来源从各部委和大学教授中遴选简派，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技术官员。审计之下为协审和稽察，级别为荐任。所谓简任和荐任，采自古代职官制，简是古代以竹制成的书简，由最高统治者以竹简下颁的即指由国民政府直接任命的文官；所谓荐任是各部部长推荐经考试院铨叙部（相当于人事部）同意后，报由国民政府任命。审计部共有协审 20 余名，稽察 10 余名。前者以内勤工作为主，后者以外勤工作为主。

审计部设第一、第二、第三厅，各厅厅长一人，由一名审计兼任；另设秘书处和参事室，以及国民政府直属主计处派驻的会计处。秘书处处长由秘书长兼任。各厅设若干科，科长荐任，有些由协审或稽察兼任，有些是专职人员担任。

1936 年审计部为了充实基层审计人员，曾委托考试院举办一次审计人员考试，报名资格只要求大专或同等学历。当时失业情况严重，报考人员大都是大学毕业生，报名者千余人，最后录取 108 人。这一批素质较好的基层干部，为后来在各省组建省审计处准备了基层骨干。

依照当年《审计法》的规定，审计部的职权范围有下列各项：

1. 监督预算之执行；
2. 审核收支命令；
3. 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决

算；4. 稽察财物及财政上不法不忠于职务之行为；5. 考核财务效能；6. 核定财务责任。

以上各项职权分由三个厅主管，第一厅主管第1、第2两项；第二厅主管第3项；第三厅主管第4项；第5、第6两项逐案由部次长派定。

二、审计部的人事安排

我于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当年参加国家举行的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后，由考试院咨请铨叙部分发到审计部为荐任实习员。一年实习期满，提升为“试署”的协审。1936年正式荐任为稽察。当年经高考分发到审计部共有三人，除本人外，另外二人为：陈幼兰，贵州安顺人，北平朝阳法学院毕业；蒋明祺，南京人，学历已忘却。当年监察院院长为于右任，审计部部长为李元鼎，政务次长为陈之硕，常务次长为童冠贤。李元鼎是陕西人，系西北国民军总司令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和于院长一样，豪爽敦厚，朴素，布袜素衣，公正廉明，为国民党政界中独具一格者。李元鼎的前任是茹欲立，我未见到，据说也是于右任的西北国民军旧部。在我供职审计部的五年中，最高技术职称的审计有林襟宇、张承桓、黄友郢、闻亦有、王文海、常云湄、王培源、周增奎、王籍田、雍家源、曹颂彬、沈藻墀、李文伯。他们大都是经日本留学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其中张承桓是留英的，娶了一位英国太太；曹颂彬、雍家源是留美的；沈藻墀是留德的。直接领导我的有沈藻墀、曹颂彬和蔡屏藩。蔡是秘书长，我实习时即在蔡直接领导下，此公去台湾后当上了审计部长。

在我供职五年内，审计部部长、次长有过多次变动：李元鼎部长和于右任院长是老搭档，也可能都是陕西三原人，在部里很有威信。1938年的一天，礼堂挂了一幅立轴，是李元鼎告别全体同事的。据说他早已写好，裱好。这天他拂袖而去，归隐山林，不

再出山。立轴是一首五律，相隔半个多世纪了，记忆不全了，现在还记得开头几句：“积愤真销骨，负疚久负心。一朝成放鸟，千里趋归林……”李元鼎别去后，暂由政务次长陈之硕代理，常务次长仍为童冠贤。不久童冠贤辞职，由审计张承桓提升。童冠贤是中大法学院院长，雍家源是中大经济系审计学的教授，都是我的老师。

审计部业务逐渐增加，受审的单位成倍增加。中国幅员广大，外出查帐和稽察工作不易周至，人力也感不足，于是开始在若干省市成立审计处，又在津浦铁路成立审计办事处（凡企业、事业单位的审计机构均称办事处，地位与审计处相同）。首先成立的是上海审计处，由林襟宇审计出任审计处长，后成立河南省审计处，由常云湄审计出任；江苏审计处由黄友鄂审计出任；陕西省审计处由王籍田审计出任；以后次第成立，审计部的人员编制相应扩大。凡有审计处的省、市，审计部不必再派员出差了。各审计处主持人由部的审计外派，下面的科长部分由部里的荐任官员外调。前一年已录取了 108 位审计人员，可以外调充任。每个办事处或审计处人员都不多，大概分四科，总额不足 100 人。部调人员不足时，由各处自行召募。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节节进逼。华北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华北已濒临亡国，蒋介石在抵抗还是退让问题上徘徊。首先想到的要安内。南方民主势力抬头，蒋介石为了搞权力平衡，说服了于右任让出审计部给予广东势力的愿意出场的人物林云陔。于是审计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由林云陔任部长，一度当过南京特别市市长的刘纪文为政务次长，原政务次长、代理部长陈之硕呈请辞去本兼各职，让出位置来安排南方政客。广东来人中派任审计的有谢云洲和高方。高方是江苏人，说起来还是我的学长，长我四五岁，是中大前身——东南大学毕业的。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时他已转业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审计部原来有大批陕西人，广东帮主政后无法裁去任何一人。因为我们是高

等文官考试分发或普通文官考试录取的，即不是陕西人，也不是广东人，游离于“东”“西”之间。我们经常自我调侃为“不是东西”。

我担任过协审、稽察和驻外稽察三个名义，均为荐任职。和我同寅的协审稽察先后有四五十人，能记得起的有以下各位：王其昌、范士屿、安维泰、汪康培、张训坚、陈祚荫、潘培敏、邵遂初、黄仿欧、陈盛兰、蒋明棋、唐博铭、方文冕等人。其中邵遂初是邵力子的儿子，留法的。另有宋教仁的儿子宋××，是留日的。张训坚是英国留学生，脱离审计部后担任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总经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潘培敏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亲信，台湾光复后，随陈仪去台北，为省政府副秘书长。

审计部的领导更换多次，而旧有的各级审计人员除本人自动辞职者外，均未变化。不是各领导不想安置亲信，确因当年法律规定：审计人员包括审计、协审和稽察“非受刑事之处分不得免职或调职”，以保障审计人员独立秉公执法，不受失业或调离原职的威胁，也可以说是终身职。在日军南犯近浦口时，我任驻津浦铁路审计办事处第二组主任，处长高方于津浦路后撤时，随部长林云陔去汉口，最后到了重庆，由我率领同事一路撤到昆明。因遇到一位中学同班的留德博士，他正在筹建兵工厂，劝我投笔从戎。我就辞去了所谓终身制的稽察职务。

三、当年审计工作是怎样实施的

依照审计部组织法，业务部门分为三厅。第一厅职掌事前审计；第二厅职掌事后审计；第三厅职掌稽察事宜。各厅厅长一人，由审计兼任，不设副职。

第一厅职掌的所谓事前审计，主要根据国家通过的年度收支预算，分部委，分省市，分月度审查和会签财政部国库署所填发的支付命令。第一厅核查相符时，由审计部予以会签，代理国库

的中央银行方得拔款。如遇重大灾情或紧急军事行动，必需紧急支应者，由主签部门呈准行政院转呈主席批准，饬国库署签发紧急命令拔款，仍需报送审计部会签。如属各机关未按原报的月份分配表而超支者，审计部得拒签之。

本人参加审计部工作，第一年是实习，其实业务没有什么难处，唯一要学的是文牍。中国传统的文牍非常繁复，上行下达，文件如果层次较多，常会出错。如1935年在上海举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需款28万元。上海市政府出资11万元，门票收入预算5万元，请求国民政府补助一部分。因此项款未列入预算，故要经过教育部上报行政院。后来行政院批准了7万元，还需转报国民政府交主计处审议同意后，再由国府咨请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然后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核发，同时令监察院转饬审计部签署支付命令。一笔不大的拔款，要经过层层行文。

第二厅职掌各级政府机关的决算，此外国营事业企业机构以及公私合营公股在50%以上的报销，均需审计，审毕后将公股部分汇总列入国家总决算。民营企业或官股极少的企业的年报，审计部不过问。当时，各主要城市设有会计师事务所，是财政部核准的民间企业；会计师由财政部核发执照，是一种自由职业，不得干预政府机关的财会事项。

各机关年度结算要编造资产负债表，企事业机关还要编造损益计算书，连同全部原始凭证（发票）上报审计部，帐本则留在机关保存，一般由厅长批交承办人员进行审查。总的说来，中央机关会计主管水平较高，单据表报上出现问题较少，每每从各单位内部密函揭发，审计人员据以追踪，以明真伪。如确有问题的，就进行实地调查。

审查一个预算单位完毕后，由审计部发给一份《审核通知书》，通知书内容有：（一）补送事项；（二）查询事项；（三）注意事项；（四）剔除事项。如该单位表报单据全部合格，以上四项均空白不填，只填写预算数和决算数，作为核销的凭证，收支有

余的，转作下年度应领经费的一部分，称之为“坐抵”，兹将上项《审核通知书》四个事项的事例举例如下：

(一) 补送事项：一般是工程漏送合同，印花税票少贴或漏贴，单据表报有短缺。

(二) 查询事项：实际上已发现问题或有人揭发，为了保密，由审计部出面对某一疑点查询，请该单位答复。是一种先礼后兵的作法。此外如对会计科目不理解，也常查询。

(三) 注意事项：如会计问题上有些小小差错经过纠正，希望该单位今后注意改正；有些单据或传票未加盖主管人员印章等。

(四) 剔除事项：发现并证实有浮报支出或进行不必要的请客、送礼、超支出差费用等等，应从支出中剔除，扣减核销金额或允许该单位抵扣下年度预算，其金额须由该机构赔补。

以上指正常审计，如发现有严重问题时，审计部经过审计会议通过后呈报监察院，作为纠举或弹劾的证据。

审核各单位决算发给《审核通知书》后，如有不服，可以申辩，但以一次为限。

表报和原始凭证由审计部长期存档。

第三厅掌管稽察工作，都系外勤性质。审计部初期各省尚未设审计机构，一应调查事宜需要到实地稽察。举凡建筑工程的验收；中央或地方发行公债的抽签还本；对某些单位群众的纠举进行调查等等。由于稽察人员名额有限，稽察人员常年在各地奔波。本人就是常年出差在外的人员之一。以下介绍当年比较频繁的稽察工作：

关于建筑工程：机关建造办公大楼；交通、铁道部兴修公路、铁路；军事机关兴建营房、军事工厂等，各建造单位提出图纸核定预算后，再进行招标、投标、决标（或比价）各程序。审计部则参加决标一道程序。投标承建人全部在场，当众拆封唱读，予以登记，然后承建公司人员退场。建筑单位和审计部依据各承包商的资信、标底价与底价权衡、讨论，一般以符合或接近底价者

入选，但不拘于最低价。决定后，由稽察在中标单上签名，然后发包。

关于监督公债抽签还本：当年各省呈准，可以发行公债的有江苏水利公债，湖南公路建设公债，他们每年抽签还本一次，均咨请审计部派员监督。性质十分简单，无非请中央机关参加以示征信而已。

关于建筑完竣后的验收工作：试以军工为例，国民党军政部设营造司专司其事，工程完竣后，报请军政部和审计部派员验收合格后才付清最后一期造价。审计部验收的根据是营造合同施工说明书和工料计算书等。这类工程验收事项，每年数以百计，非常繁忙。

关于专案稽察：在各单位送审中发现疑虑不解时，由第二厅经办人亲往查问，不属于稽察范围。只有当别人揭发，言之有据时，才派稽察前往。本人曾经历一件案子，是庐山海慧寺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陈诚（辞修）忽将营造司司长欧阳端木逮捕。原因他视察训练团工程时，向工地劳动农妇询问：敲碎一立方石块得工价若干？答：每立方8角。陈诚查阅承包合同所附原材料估价表，每方由军方付给2元。他认为欧阳端木有贪污行为，于是率人将其逮捕。本人是当时验收这一工程者。案发后，审计部派我再度前往。我与罪犯无一面之缘，但按常情，他如要贪污，也决不会在石子上打主意。我是抱着闹清楚原委而去的，先找到多批农妇，均称每立方得工价8角；追问小包头，则称他的上面转包来的每方给1元2角，以8角转雇给农妇；接着再向上追，追到大包头，大包头说我从承包人上海陆根记手中包来，以每方1元8角计价；最后我找到陆根记驻山人员，承认此事。本人层层取得书面证明，说明这是一桩层层剥削的勾当，与营造司司长无关。本人回南京后，又找营造司当时同往验收的人员，了解司长为人。他们认为司长为人清廉，也不可能直接向基础短工身上打主意。本人据实附入各项证据呈报审计部，转呈监察院。不久，这位司长无罪释放。

放。

本人另外办过一件与上项相反的案件。当年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是刘峙，此人是蒋介石的亲信，是河南土皇帝。公署在开封郊区修缮一座清末或民初兴建的营房，营房可容近万人的一个军。原址被严重破坏，门窗大都拆下盗走。修缮的承包说明书很简单，一要门窗能关严，二要入室抬头不见天光。审计部派本人会同军政部一名技术员同往验收，这位技术员也是中大建筑系刚毕业的同学，年龄二十五六岁。大家都是初出毛庐的小青年。我们接受任务后约同去开封，由绥靖公署营房处主管和承包商接待。他们把我俩接到一家餐馆，布置了10人一席的圆桌。入席后，背后来了10个不三不四的女子，为客人点烟斟酒，我们感到骇然。偏偏我和那位同学均不接触烟酒，令主人有点难堪，匆匆餐毕。第二天，把我们从“青年会”（宾馆）接往工地。我们检查了30多幢，约为全部的1/10，发现门窗有一半左右因劣质木料已经变形，门窗关不紧，关了也插不进插销；抬头看屋顶，大约有10%见得到天光；如果下雨，室内士兵如何躲避？这显然是营房处和承包商有情弊。我们二人用英文说“终止进行”，即结束验收工作。承包商来到“青年会”，卑躬屈膝，希望我们放宽，并从口袋中掏出两个厚厚的信封说，是程仪。我们当然拒绝，当晚即回南京复命。我代拟了一个审计部呈监察院的呈文稿，饬河南绥靖公署重行全部检查返工，经公署负责验收合格后，再报请审计部验收。半年过去后，来文称已遵令饬承包商补修完竣。审计部又派我前往，我说明不能由我再去的理由，结果由部咨函绥靖公署免验结案。

四、国民党政府审计制度之我见

国民党政府审计制度的立法比较周全：（一）《监察法》中规定审计权地位高于各部委；（二）《审计法》和《审计法施行细则》保障了审计有章可循；（三）机关营缮工程及购置、定制、变

卖财物稽察《条例》详细规定招标、比价、或议价、决标、押金、验收以及驻国外机构受托代办购制的处理，军事机关因高度机密自行采购、营缮的办法等等。审计人员执行公务时比较有章可循，有权办事；而且抗日战争前公务人员待遇不薄，物价平稳；审计人员半数以上是考试录用，素质比较整齐；更由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审计部部长李元鼎个人端正廉明，影响了部下。在我工作五年内，未发现有违法事例。这不能不说优点。

至于审计制度的缺点则可归纳为下列几项：

(一) 年度决算拖延太久，有时可达一二年，失去决算是下年度预算的参考价值，也影响了下年度施政方针的厘订。之所以如此，有不少客观原因：1. 机关太多，不能及时催送报表凭证；2. 国库常常拖欠经费，迟作报销，还理直气壮；3. 审核中查询补送、剔除事项文书往返稽延时日。由于报送不及时统计工作特别是年度统计出现多年并列的现象。

(二) 报送表报凭证的笨拙。国民党政府审计部未成立各省审计处时，全国的表报凭证要全部送交审计部，审讫不发还，由部归档。我在南京审计部工作五年，增建了三座档案库，极少调阅。后来，成立审计处，部只管中央机关或直属企业的表报凭证，仍然满坑满谷，实在没有必要。审毕应该发还，责令自行保管，若干年内不许销毁。这也是审核年度决算不能及时的一弊端。

(三) 审计人员的素质逐渐降落。成立之初，人员引进审考很严，除国家考试合格分派外，推荐用人一般人员由部长亲自过问，高级职员则于右任院长面加考察。但卢沟桥事变以后，审计部扩充编制，许多省和大型国营企业建立审计处，用人考核就不那么严密，有些有称职的人鱼龙混杂，审计部的威信就不如从前了。

旧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人事制度简述

谭子新 张森

一、前 言

自清末民初屡次倡议的所得税，直至1936年7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才设立直接税筹备处（该处于同年10月1日改称所得税事务处），派赋税司司长高秉坊兼主任职，总理其事，积极筹划，正式开办。10月1日先开征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及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在1936年年度结束即行开征。从倡议到实际开征，经过了历届政府30多年的时间，来之不易，在中国财政史上可以说是件大事。

以前倡办所得税，完全着眼在筹款上，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单纯的计算税款能够收入多少？开支多少？是否划算？顾虑重重，患得患失，所以屡倡屡停，始终未能办成。1936年国民党政府创办所得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肩负筹备重责的高秉坊有其中心要求，眼光放得远，绝不计较一时的得失，目标明确，毫不动摇。总括其主要目的有二：

第一，贯彻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废除苛杂，改革税制”的重要决议。从改革税制和顺应世界各国税收发展的潮流来看，这次创办所得税，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自“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势在必战。预见到战端一开，我国沿海口岸以及铁路线上重要城市，将无法坚守，会暂时被日军占领，我们的主要税源将会遭到重大损失。在战前早日办起所得税，作为战时财政的措施之一，

战争期间可以利用新的税制，在广大的后方地区全面开展，用以抵补因战事而损失的关、盐、统等税收收入。从这一点看，创办所得税又具有筹措战费的现实意义。

高秉坊认为创办所得税，首先要建立新的人事制度，绝不能因袭旧的一套。揭示办新税，用新人。打破用人唯亲的老传统，改办公开招考，不讲私情，厉行考训制度。同时鉴于所得税的稽征业务技术性强，涉及到很多专门知识，必须由有财经专业知识的青年来办，方能胜任。所以坚定不移地实行新办法，招收大学财经、银行、会统、商学、法律等系毕业的青年作为开办所得税的基本干部。这是吸收历史上唐朝刘晏理财，重用士人，取得成功的经验。尔后六七年时间内，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陆续制定了一些章程办法，诸如招考训练、实习任用、薪给待遇、职务保障、考核奖惩、考试提升、轮调休假、开展学术研究等，分别制定有成文的规定办法，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形成了一套人事制度的雏型。

二、考训经过及成果

1936年7月所得税创办之始，即拟定财政部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规则及财政部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任用规则，报经财政部核准施行。1940年12月又经考试院公布了《特种考试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分为高级税务人员考试及初级税务人员考试两种：

(一) 中华民国国民在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经济、财政、会计、商业、法律各学科及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得有证书，年龄在35岁以下者，得应高级税务人员考试。(二) 中华民国国民在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修习经济、财政、会计、商业、法律各学科一年以上得有学校证明文件，或高级商科职业学校、高级中学、后期师范学校毕业得有证书，年

龄在 25 岁以下者，得应初级税务人员考试。

1936 年 7 月在南京举行第一期招考，只招高级税务员。财政部组织考试委员会，负责办理，聘请部内外专家学者为考试委员，公推陈长蘅为主任委员。当时报名的有 500 多人，结果只录取 68 名。委托主持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为训育主任，并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部内实施训练，定名为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训练班。生活作息，均按军事管理的要求，极为严格。学科课程，则由财政部聘请专家学者及直接税筹备处各组负责人员前往讲课。两个月的训练期满，分派到各省去筹办所得税。此为高级税务员考训第一期。学员分派后，有三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满，经长官考核，认为成绩优良，确能胜任工作者，即予补实。成绩低下者，得展期实习三个月，期满考核，仍认为不能胜任工作者，即行开去职务，不再延长。

当时，行政院为了救济全国大学毕业生，在南京设立大学生就业训导班，帮助学生安排就业。财政部遂商由训导班就合于规定学历、年龄者选派毕业学员若干人，另由财政部令饬各省印花烟酒税局、统税局等税务机关，就其职员中合于规定学历、年龄者保送若干人，仍由教导总队代为训练，此为高级税务员考训第二期。嗣又由大学生就业训导班分来合格学员若干人，因人数不多，即在财政部内自办短期训练，授以税务技术等知识，此即高级税务员考训第三期。1937 年上半年各省所得税已逐步开展，到处需人，曾商请考选委员会同意举行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特种考试，并登报分别在南京、北平、广州、汉口四处招考，准备大批招收学员。正办理间，卢沟桥抗战开始，“八·一三”淞沪战火又起，南京遭到敌机轰炸，形势紧张，迫不得已，此一招考计划只好停止。在南京只办了三期训练班，全系高级税务员，共计 115 人。

1937 年 11 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所得税事务处亦随同财政部迁往重庆。沦陷地区的考训税务人员，追随政府，不畏艰险，跋涉入川。在撤退途中，所得税事务处注意罗致有志青年参加所

得税工作。当 1938 年春，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实际开征时，工作头绪纷繁，在在需人，乃将撤退途中所罗致和开办所得税时就部内所调用的合格人员集中在重庆青年会，施以短期实务训练，是为考训第四期，共计 26 人，全系高级税务员。

自上海撤退，南京沦陷，武汉撤守，那一年多的时间，战事变化，动荡不定。早开办的重要城市，多已陷敌，后方各省的所得税工作刚刚开展，各方面的内外条件基础薄弱，可以说是所得税困难最大的阶段。而主持人高秉坊对考训用人制度信念坚定，绝不动摇。各级负责人员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税事业苦力支撑，风雨同舟，尽到最大的努力，终使后方各省的所得税这一优良税种，从小到大，逐步打开局面，顺利推进，站稳了脚根。

1938 年 11 月，财政部设立财务人员训练所于重庆川东师范。经商准考选委员会转呈考试院颁布《特种考试财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财务人员的范围要宽些，事实上除增加会计人员、银行人员外，仍以直接税税务人员为主，公开招考，一切办法完全按照南京孝陵卫第一期税训班的前例办理，仍请军委会干训团（团长仍为桂永清）调派军事教官来所担任军训。业务课程由财政部聘请教师到所讲课。学习期间每期为三个月。为求考训期别划一起见，财训所第一期毕业的高级税务员及各省分别招考实习的高级税务员合称第五期，财训所第二期毕业的列为第六期，财训所第三期毕业的列为第七期。又财训所毕业的初级税务员共两期，因第二期人数较少，即与第一期合称考训初级税务员第一期。从此，考训税务人员有初级税务员之始。至 1940 年，重庆空袭频繁，川东师范又在市区，因此，财务人员训练所办了三期，就暂行停办了。

所得税在忧患中诞生、发展，初具规模。自 1939 年 1 月 1 日又开征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1940 年 7 月 1 日复开征遗产税，并兼办印花税，1942 年 1 月 1 日再接管原属各省市之营业税。从此，先后计有所得税、过份利得税、遗产税、印花税、营业税，共五

大税种，构成直接税体系。所得税务处亦于 1940 年 6 月 1 日改称直接税处，各省所得税办事处也于 1941 年元旦改称各省直接税局，以符名实。1943 年直接税处又改称直接税署。几年来虽处在空袭频繁的情况下，直接税业务仍能逐年扩展，各处迫切需要增添人员，不得不根据需人缓急情况，分别在外地招考，临时设置讲习班，就地集中训练，讲授业务和技术。结业之后，亦即就地分配各地工作，以资方便。如江西、浙江、陕西等省局都曾代总处办过几期讲习班。关于考试办法，经商准考选委员会转请考试院于 1940 年 12 月 29 日颁布的《特种考试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作为法令依据，同时，考虑非常时期非常问题，不能一味拘于形式，有关考试事务，即委托直接税处代为办理。嗣又因在战争情况下，有时连集中考试都有困难，乃依照上项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由财政部商由考选委员会呈准考试院，依本条例规定的学历、年龄，举行登记，分发实习；登记时应举行口试及体格检验。1942 年 2 月 11 日直接税处又颁发《保举税务人员暂行办法》，想方设法以解决合格人员的来源问题。此项保举办法规定，负责保举人必须在直接税继续服务三年以上之长官或是高级税务员，始能有效；而被保举人之学历、年龄必须完全符合于特种考试条例规定，才能录取。

1942 年春，财政部第二次又在重庆歇台子举办全国财务人员训练所，凡是财政部所属各单位，根据需要均可抽调人员入所受训。首先是抽调各税务机关的人员，直接税方面，第一次调训的为新接管各省的营业税人员。第二至第五次除抽调现任人员作一般的训练外，新登记实习的合格大学毕业生亦即分别参加受训。根据过去训练班的办法，由直接税处派高级负责人前去讲课，并指派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考训税务人员在财训所担任班主任，辅导新学员学习。上项参加训练的新学员，按其学历、年龄分别编入直接税高级税务员及初级税务员各期之中。

1936 年至 1943 年的短短七年中，高级税务员共有 12 期，在

职的共 2694 人；初级税务员共有 11 期，在职的共 3201 人。高、初级合计 5895 人，占直接税在职人员总数 15596 人（其中大部分是新接管各省的营业税人员）的 38%。成绩斐然，大为可观。

从年龄上来看，高级税务员的平均年龄为 27 岁；初级税务员的平均年龄为 23 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

从高级税务员的学历来看：

经济系毕业 1891 人，商学系毕业 381 人，会计银行系毕业 215 人，法律系毕业 187 人，其他 20 人。学用上可说基本一致。

三、人事制度的具体内容

（一）考试训练

所谓考训，包括两个方面：一要经过考试，二要经过训练。考训人员有高、初级之别，都要具备合格的学历和年龄。既要学有专长，又有年龄限制，这是报考直接税的两个重要条件，丝毫不能变更。从考试及格人员中，依次录取。录取后，施以两个月至三个月的训练，使全体学员经受严格的军事管理、法令讲解及技术讨论等指导测验。训练结业，还要到基层单位去实习。

（二）实习任用

考取人员经过集中训练，先行分派在直接税基层单位实习，实习尚非正式任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直接税处订有直接税税务人员实习章程，规定实习科目共四项：

1. 法令讲读。将所得税法、过份利得税法、遗产税法、印花税法、营业税法连同各税法的施行细则、征收须知及解释令等，均应于两星期内全部读完；法令中重要部分，由主管指导员讲授，命题考试，给予分数。

2. 法令试验。包括以下试验题目：各类税率表（附计算公式）、纳税程序图、查账报告、估计报告、纳税理由书、复查报告、诉愿答辩书、营利事业单位登记簿、商业调查报告、各业逃税方

法。各项试验题目，须于两星期内逐一做成，并缮正订册，由主管指导人员核阅，分题给予分数。

3. 查账试验。查账为直接税的基础工作，由主管指导人员选定各行业 10 家商号，指导实习人员查账，应于两星期内编制查账报告，由主管指导人员审阅，给予分数。

4. 基层单位见习。实习人员于前三项工作实习完结后，再指定一个基层单位前往见习。主要把该单位的图、册、表、报等资料，每人绘制一份，缮具报告，由主管指导人员核阅，分别给予分数。

以上四项实习工作完毕，主管指导人员应缮具实习报告，并填具实习期满成绩考核表，上报直接税处备查。直接税处根据实习成绩，研究分派正式工作，俾能展其所长。

（三）职务保障

旧中国的机关中，除海关、邮政、审计人员工作上有保障外，其他机关用人多系私人延揽，“一朝天子一朝臣”，随长官的更动而更动，毫无保障可言。独直接税的情况有所不同，税务人员都是经过公开招考而来，无私人关系在内。他们的职务工作是见诸明文有保障的。财政部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任用规则第四条中规定：“已经补实之人员，应照另表所列等级，分别叙筹支俸，并递年考核成绩，循资推升”。第五条中规定：“已经补实之人员，除贻误公务，情节重大，曾记大过至三次以上及有非法营私行为经调查属实，分别惩处者外，不得免职或降级。”不枉不纵，规定明确。此外，还有一严格限制，即税务人员，未经直接税处核准前，所有各级长官，均不得予以停职或撤免。以上这些规定，是直接税税务人员的根本保障，也是直接税人事制度的基础之一。

（四）考核奖惩

青年人有勇于进取不畏困难的优点，也有其缺乏经验办事急躁疏忽的缺点，初参加工作，不能求全责备。在使用上，应注重积极教导帮助，考核时，多看其平日表现，从根本上掌握其长处

和短处，恰当安排工作。直接税处每年考核两次，分别于6月底和12月底举行。考核内容，以品行、学识、能力三者并重，由各级长官分层负责，转报直接税处，作为奖惩的依据。总的精神，着重平日教导，促使其本人认识缺点，自觉改正，非不得已，不轻予惩处。

（五）官职划分

高级税务员和初级税务员的名称，在直接税人事制度中，把它看成是一种法定资格，其意义实与官衔相合。它和军官中的将、校、尉等军衔有些相同。这项资格，必须依照《直接税税务人员考试暂行条例》规定的学历和年龄，经过考试、训练、实习等“三关”，方能取得。先有了此项资格，然后才能取得组织法上所规定的各级职位。高初级税务员的薪俸，系依照其资格，按年功晋加，并不因职务高低而影响其薪俸，同一期的税务员在薪俸上是相同的，主要体现其工作年资。故高、初级税务员薪俸之规定，亦即称为官俸。各人担任的职务不同，所负责任有大有小，为了体现工作上付出的劳动差别，在人事制度中实行一种支给职俸的办法。大家虽同为高级税务员，但有的任科长、审核员，有的任分局长、股长，个别尚有任省局长的。工作繁简，责任轻重，各不相同，以此作根据，规定其应支职俸数额，由直接税处统一研究，每年核定一次。在其任职时，才照支职俸；不在职时，即停支职俸。实行官俸，可以鼓励其埋头苦干，安心于本身工作。实行职俸，则可以鼓励其积极钻研业务，争取担负更大的责任。这样把工作和薪给报酬结合起来，对提高工作效率，开展税务新局面，是有一定作用的。

（六）考试提升

为了鼓励工作人员在专业上能够坚持学习，始终不懈，在技术上能够继续钻研，有所创新，不致受原有学历的限制，无法取得高一级的官衔，直接税处特订有财政部直接税处工作人员考升规则。其目的是想通过考试，以成绩为依据，提升为高一级的官

衡，借以扩大考训干部的队伍。此项考升规则主要包括下列范围：

1. 税务生考升税务助理员（即初级税务员）；
2. 初级税务员考升高级税务员；
3. 高级税务员考升税务司；
4. 会计、统计练习生考升会计、统计助理员；
5. 会计、统计助理员考升会计员、统计员；
6. 未经考训人员考升税务、会计、统计人员。

此项考升规则包括的范围比较宽，只要学历、年龄符合考升规则的规定，而且在直接税服务的年资够了，即可申请逐级转报直接税处核准，分别参加考试。

凡经税务生考升为税务助理员的，不得再考升高级税务员，暂以考升一级为限。

应试人员如第一次考试不及格，得再继续应试第二次，其第二次考试成绩仍不及格的，即取消其应试资格。

（七）轮流调迁

各税务人员于派用工作后，经过一定时间，即实行轮调，这是人事管理制度的一种特别规定。轮调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同一单位内的职务轮调，使税务人员有多方面的学习机会和实践经验，以增强其全面工作能力。一是工作地点的轮调，凡在一地工作较久了的，即无其他原因，也予调迁，使其改换环境，增长见闻，扩大适应工作能力，避免在一地工作日久，与当地人士渐熟造成的诸多不便。还有因工作性质不同，例如所得税审核员一职，担负审定查账报告、核定税款的职权，在直接税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职位。为了爱护干部，防微杜渐，特别规定审核员每年一调，而且于元旦就由直接税处公布各局审核员名单，以示郑重。

（八）轮流休假

直接税的稽征，大部分都有季节性，开征大忙季节过去后，工作就比较闲，在此间隙，即安排轮休。所有税务人员分三期轮流休假一个月，用以调剂劳逸，恢复体力，为下一次的紧张工作，做好准备。《财政部直接税处所属工作人员休假暂行办法》规定，凡到职满一年以上者，才有享受此项休假的权利，如请有事假，则

按日扣除。又规定服务满三年以上又无事假者，在第一次休假时，公家可给予回原籍或国内游览之往返舟车费。此项休假制度，用意良善。但因抗战期间，交通条件不便，加之工作日繁，多未能普遍实行。

(九) 树立税训

1936年在南京孝陵卫第一期直接税税务人员训练班毕业时，特提出“廉、能、勤、毅”四个字为税训，作为直接税工作人员持身服务的准则。这四个字的含义，对于税务人员来说，鲜明贴切，针对性很强，应当终生信守，始终不变。“廉”就是洁身自爱，处污泥而不染。办税工作，经常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检查工厂、商号账簿，核算应纳税额，要求税务人员自己站稳脚跟，公忠体国，涓滴归公，绝不贪婪分毫，建立纯洁的、新型的税务机关，一洗过去旧税机关的积弊。

所得税凭税法、账簿核算应纳税款，税务人员首先得熟悉税法，其次要精通会计，再次要了解经济变化，正确掌握市场动态，加强税源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因之学术上不断提高，技能上不断熟练，才能适应日益繁杂的工作需要。所以第二要求一个“能”字。

“勤能补拙”是我们一句古训，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道理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才能纵有不逮，而能奋志以赴，人一已十，人十已百，勤勤恳恳下一番苦功，亦能期其有成。所以第三要求一个“勤”字。

新税初创，税法宣传尚不普及，困难迭出，阻力必多，从事新税者要有坚贞勇毅的志气，百折不回，方能克服艰险。所以第四要求一个“毅”字。

“廉、能、勤、毅”四个字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要求直接税税务人员高举此四字税训作为座右铭。

(十) 提倡税风

所得税的创办，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主要目的还

是为了引进发达国家均已实施的优良税种，实现税制改革。既然是新税，既然是改革，必须转移风气，绝不能再因袭旧税机关陋习。首先，用新人，用年青人，一新耳目。招考大学生、高中生，施以短期训练，然后委以新税基干。大学生、高中生在学校当学生，主要是读书学习，投入所得税之后，即将平日所学技能实际应用。所得税机关自应有其适合工作要求的新风尚。第一，要保持读书学习的风气，应把机关视同学校的延续，等于大学中的研究院或实验室一样。故所得税所提倡的风气，第一即为“学校之风”。其次，青年学生初转入社会，热情奔放，咸愿为国家建树业绩，根本区别于旧税机关的官僚税吏，同仁相处，职务上不同，存在着长官与僚属的关系，但彼此相处，应以真诚相待，如同家庭中的父兄子弟，推心置腹，毫无隔阂。此即“家庭之风”。其三，税务机关担负着国家的税收任务，年终必须完成，不能欠收。直接税是向有钱有势的人征税，征税纪律如同军队冲锋陷阵的军令，全体税务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人人服从，团结一致，向着共同目标，奋力前进，完成国家赋予的税收任务。此即“军队之风”。其四，所得税、遗产税都是新创办的税种，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并参照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税制而分别制订的税法，不仅税务人员本身需要不断学习，对社会上更需要广泛宣传，反复讲解，不厌其烦，使广大工商界人士及社会贤达都能了解，才能得到他们的赞助，顺利贯彻。为此，提倡税务人员要具有牧师传教一样的精神，不惜舌敝唇焦，尽上宣传之能事，以使群众乐从。此即“宗教之风”。

（十一）组织进修会

人事管理中的考勤、退休、养老、抚恤等事，除依照政府法令办理外，直接税同事间尚筹有互助之法，此事归直接税处工作人员进修会主持。进修会不属于行政组织范围，但可以说是人事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做些辅助教育工作。

进修会以砥砺学行，共策共勉，抱定改革税制决心，以奠定

中国财政制度之基础为宗旨。组织章程规定，凡财政部中央直接税税务人员训练班、财务人员训练所及直接税处历次考训的直接税税务人员而现为直接税服务者，均得为该会会员。而未经考训的工作人员，则由会员二人介绍，经干事会通过方得为该会会员。

1939年直接税处成立进修会，各省局及分局设分会及支会。直接税处工作人员进修会设干事会，下设总务、研究、组织、调查四个组，各有专人负责。另设指导委员会，下设学术指导、生活指导、工作指导三个组，也各有专人负责。该会工作，主要是为了贯彻直接税人事制度的严守考训、吸收青年、学用一致、政教合一四个要素，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如对考训税务人员的通讯联络；督促会员开展读书活动；鼓励会员根据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体会写文章、编书，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帮助会员解决工作和生活困难等，进修会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进修会比行政上过问，更容易解决问题。

（十二）设置直接税讲座

1942年直接税处接管原属各省的营业税之后，机构人员骤然增加。虽然经过了整顿归并，但比起接收之前，机构增加了七倍以上，人员增加了五倍以上。因而，人员素质方面，较前有所降低，亟需更多的增加考训人员。但直接税处限于经费，甚难大量招考；碍于战时交通条件，集中训练困难也很大。经反复研究，决定在各大学财经、法律科系三四年级设置直接税讲座，由直接税处选荐对直接税业务富有经验的专门人员驻校讲授直接税有关理论和具体业务实践经验。此项办法，经向各大学联系洽商，颇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直接税处特制定《派员赴各大学讲授直接税实务办法》，自1942年至1943年7月，已有湖南、大厦、交通、广西、重庆、复旦、朝阳、广东、国民等大学及湖南商学院等十所院校设置了直接税讲座，并且广东、国民两所大学还代办初级税务员讲习班。实行这种办法，大学可以有目的地为国家培养专

门人才，学生毕业后绝不至找不到工作。从直接税来说，既作了税政税法的宣传教育，又有了可靠的人员来源，为考训用人制度奠定了广阔的基础，向学用一致、政教合一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对国家、对青年学生都有好处，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措施。可惜只试行了三年，到 1945 年，因高秉坊被诬陷而去职，此项办法也就随之停止了。

四、结束语

所得税一开办，就遇上抗战，时势动荡，历经艰辛，1936 年度所得税收入预算仅列 500 万元，是年实收数达 640 余万元，此后，所得税收入逐年增加；1943 年度，所得税收入预算列为 17 亿元，七年之间，已增至 340 倍，成为国税收入主干，由此可见所得税创办初期之进展。

旧中国直接税的回顾

倪 镇

一、中国直接税的诞生

我国所得税的创办，始於清末，然屡倡屡辍，虽曾一度实行，但旋即废弃，实际创立则是自 1936 年起。1934 年 2 月，旧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废除苛捐杂税及减轻田赋附加以纾民困案》，交财政部办理。该部遂於是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会议议题，是以整理地方财政为中心，对於我国以往赋税的不公平、不合理以及压榨贫民的种种弊害，揭露甚多，群情愤恨。会议后即由财政部设立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负责执行财政会议决议。该委员会工作，主要为废除苛杂，减轻田赋附加，建立市县预算及土地呈报。该委员会负责人以当时赋税司司长高秉坊兼任。该会委员均由财政部派往各省执行职务，督促废除苛杂，计废除的有 7100 余种之多，预算数达 16000 余万元之巨，成绩较好。

该会另一主要职务为改革税制，所得税即由该会创议兴办。财政部 1936 年 7 月 1 日成立直接税筹备处，筹办直接税开征事宜。所得税暂行条例亦于是年 7 月内公布，并定於 10 月 1 日起先开征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中的公务人员薪酬所得和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中的公债利息所得。

财政部直接税筹备处在所得税开征后，即改为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以高秉坊任主任委员。各省市设所得税办事处，设委员，为事务处派驻各省市办理所得税人员，仍为所得税事务处的高级人员之一，随时可调处工作，亦可调其他各省市处。该处系一集

权委员会，与各省市融为一体，处内委员可与各省市互调。这样可使彼此熟悉内外情形，没有隔阂，相互轮换，对于税务进展、技术改进以及减少弊端等方面，均有好处。

省市以下设区分处，设主任一人，亦非分处之官，仍为省市处内的高级税务员，随时可以调迁，并可轮调。省市处及区分处内部人员，由直接税处集中管理，各省市处无自由用人之权，改为直接税处后亦保留此种精神。此为所得税开办时人事制度的雏型，以后逐渐完备，渐成直接税的一套人事制度。

为什么高秉坊能以赋税司司长兼任所得税事务处主任委员主办新税？这是与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分不开的。据谭庆传说，高追随孔的时间较久，孔器重其工作能力强，又可信赖。1933年冬孔调长财政部后，即调高长赋税司，并付以整理地方捐税的重要工作。

所得税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因为地方割据，各自为政，军费浩繁，苛杂迭出，富强逃税，加重贫弱负担，流离转徙，民不堪命。国民政府为削弱地方武装力量，加强统一，在当时各省表面服从中央的情况下，财政部乃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整理地方捐税，废除苛杂，改革税制，实现量能负担公平合理的租税原则。此其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日战争已开其端，其后又有淞沪抗战，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所得税的开征，实具有战时税的意义。此其二。

二、直接税的成长发展

我国直接税诞生于忧患，成长发展于忧患，而接管营业税遂开没落之端。溯自所得税开征以后，随即遭遇“卢沟桥事变”，平、津、冀、察、晋、绥相继沦陷，虽各省市成立办事处积极进行课征，因受战争影响，税务进行几濒停顿。正在整理措置的时候，又继以首都沦陷，浙、皖、苏、鲁及沪、杭诸大城市均沦为战地，税

区日蹙，产业凋残；加以机关播迁，人员散减，振兴计划屡遭挫折，乃致力于前方税务之稳定，邻近战区各处非至税收完全绝望不轻放弃。如浙江、河南、江苏各省以及上海市，虽仅一地一隅，亦坚守阵地。上海市竟迟至 1941 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始停止税收。对后方税务机构则积极进行充实整顿，将原川、康、滇、黔所得税办事处划分为川康、滇、黔三个办事处，充实人力，积极开展税收工作。在此战火纷飞年代，经此一番整顿，税收虽受影响，而刚诞生的新税生命尚未夭折，虽云天幸，亦属人事。

所得税经 1938 年上半年的整顿，甫有端倪，正图以武汉为中心，积极推进。复因武汉撤退，广州失守，计划又被打乱。由于后方基础已初具规模，亦未因此而受严重影响。撤退重庆，复又精心计划，重振规模。至此由诞生忧患转入成长发展时期。

财政部于 1938 年 11 月，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地址设立财政部财务人员训练所，所长由孔祥熙兼，实际由所得税事务处高秉坊负责办理。仍照南京孝陵卫成例，实行军事管理与学科训练，时间为三月。先后办了三期，均照考试院特种考试办法办理，由考试院派员监考，结业后汇送成绩，由考试院核发文凭，与应高考及格资格同。

财训所共设三个组：（一）税务组。（二）会计组。（三）银行组。结业后，税务组分派财政部所属税务机关，会计组派往财政部会计处转行分发，银行组主要派往中央银行。税务组结业学员只派往自贡市盐务机关两名，会计组只少数派往会计处所属机构，银行组绝大部分派在中央银行。

由于考训人员一般是青年，纯洁、吃苦耐劳，具有进取精神，在继续扩大所得税课征范围，如举办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接管印花税、营业税后，不数年已蔚为国家的主要税收。所得税开征时预算定为 500 万元，至 1943 年度激增至 42.5 亿元（其中有部分是印花税和营业税），占国家收入的 1/4 强。

营业税在 1942 年由省税改为国税，原有机构据接收实数统计

共有 1447 局、所，工作人员 10455 人。直接税处奉令接管，实为一艰巨任务，但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交接完成，除成都、重庆两市保留营业税局名称外，其余全部并入直接税机构。

在接办营业税时，直接税原有机构仅 202 处，原有人员亦仅 2214 人。以少数基础组织，少数干部人员，在短期内管理新接管各省、市、县品质不同、待遇不同、作风不同的人员，其在管理上所发生的困难程度，实有过于开办所得税时期的情形。

三、培育新人新精神

战事一起，征收课税的阻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具有勇气、有毅力、有操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税人。即在稳定地区亦要求具有洁廉自守，娴熟税务，明了情况，勇於负责的人才，方能把新税在困难境地中推向前进。直接税建立的考训、实习、任用、考核升级、考试升级、官职划分、调迁轮调以及奖惩等一套培育新人的办法以及建立修德建业的进修会组织，就是解决以上存在问题的措施。

新人还包括有志于直接税的专家学者，其中以崔敬伯的事例最为突出。崔原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筹办所得税时曾著文赞许和支持。高秉坊在一次会议上偶然相遇，邀约面谈，备极欢洽。根据当时形势，中日战争有随时爆发可能，北平首当其冲。高劝崔勿返北平，并邀请参加创办新税工作，愿聘为专员，月俸 200 元，这当然比大学教授待遇为低，但对改革税制，开辟战时税源，对抗战胜利贡献甚大。崔自愿放弃高薪，就任专员，并负所得税事务处第一科科长责任。自参加创办所得税工作时起直到解放，均全力以赴。

新精神，笔者理解就是税训——廉能勤毅。廉，取其公忠体国，清白乃心，丝毫不染，点滴归公。能，指其在学术上有相当造诣，技术上相当熟练，用其所长，尽量发展。勤，取其补拙增

能，锲而不舍，奋志图功、孜孜矻矻。毅，取其坚贞勇韧，百折不挠，斩棘披荆，克服险阻。直接税新人无论宣传讲习、工作，都必须依此准则，念兹在兹，以自警励。直接税能循所得税演进，顺利推行，税收激增，新精神实为极大的推动力。

四、两信四风学用一致

两信，即直接上级长官与受训学员相互信任，工作人员间相互信任。四风，即学校之风、家庭之风、军队之风、宗教之风。

两信为人与人的认识。即是受训学员与主管长官相互认识和接触，由此发生感情互信进而到工作互信。例如学员们在受训期间，高秉坊除在训练场所寻找机会进行谈话与了解外，还分批约在他家举行茶会谈心。每年召开业务会议时，各地来渝参加的各级局局长带有少数当地土特产赠送，高则约会家中便餐，畅谈工作、学习、生活，彼此不拘形迹，亲如家人。据笔者回忆，高对人态度，平易近人，热情坦率，无官僚习气。崔敬伯对人谦和有礼，有学者风度。因此，大家在工作上精神愉快，积极进取，上下间互相信任，下级有职有权，可以放手大干。工作人员相互间，也因学习、工作、生活、进修上的接触了解，情感日深，由感情上的互信进到工作上的互信。有事开诚布公，有困难大家研究解决，因此各项工作一般都能顺利推进。

四风，首为学校之风。直接税在我国实为前无古人的新兴事业，必须应用最进步的学理与现代化的技术（指严密稽征，细致查帐，控制税源，防止偷漏等等），以进行征课，决不能将机关组织变成普通衙门，必须为学校的延续，等于大学中的研究院或实验室，以鼓励研习，提高技术。因此名为学校之风。

其次参加直接税工作的绝大多数为青年学子，初入仕途，纯洁高尚，热情洋溢，自与一般老于世故的官僚税吏不同。同人相互之间，包括长官与僚属，其关系应与家庭中父子兄弟姊妹的情

谊相等，精诚相待，推心置腹，毫无隔阂。此为直接税开办以来所养成的特有的习惯。笔者在直接税署和江油、绵阳、遂宁、成都等分局工作时，均感到同事间如家人相处，亲密无间。此为家庭之风。

从直接税工作关系上讲，毕竟与家庭不同。征税有如作战，冲锋陷阵，军令森严，虽亲如父子，亦不容有所假借。直接税税务人员为财政上新兴的一支生力军，在推进税务工作上，没有铁的纪律，是难于克奏肤功的。因此必须有军队之风。

新税初办，群众未喻，征收税款，首重宣导。从事新税人员均系拓荒者，无论何种困难地区，均要求具有传教士精神，不畏艰险，深入群众，宣传税政，循循善诱，务使税收政策和征课办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群众衷心乐从，踊跃报缴，不能强之以法，迫其就范。故直接税倡导宗教之风，大家亦能身体力行。

以上四风，皆为直接税无数税人辛勤努力所造成的业绩。在当时实为大家所珍惜爱护的。

学用一致，方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直接税考训有关税务各科系的大学毕业生，授以办理税务的专门知识，并派往直接税机构进行实习，由该处长官指定富有税务知识、稽征技术和实践经验人员负责讲授和指导。

实习课程为法令讲习结合税务实践，进行培育。实习三个月期满，由负责讲授和指导人员结合其操行进行考核，并填具实习成绩考核表，由实习机关长官汇转直接税处凭以核派职务。实习成绩不满 60 分的，得延长一月，但以一次为限。

考核成绩，分工作、操行、学识三大项：

(一) 工作栏包括能否积极负责，能否吃苦耐劳，做事有无毅力，是否忠实服从命令，能否遵守工作时间，工作速度，工作分量、工作内容是否精确，是否有条理系统，创造和判断能力等 10 项。

(二) 操行栏包括生活是否俭约，是否爱惜公物，衣着仪容是

否整洁，对人是否和平有礼，是否热心公益事业等五项。

(三) 知识栏包括学识是否与工作相称，是否勤读有关业务书报，常识是否丰富，公文内容是否精确，文字是否简洁畅达等五项。

以上三栏 20 项，每项最高分数为 5 分。表内还有评语、拟任职务、审查结果等栏。评语要求具体，以便核派职务。

直接税税务人员才识能力的培育，从学校所学到考训、实习、考绩，均以学用一致为核心，即以学用一致原则贯通于培育人才的全部过程，而且还贯穿到终身。人员的擢升、考升、进修等，全未脱离学用一致的范畴。

五、职务保障、稽经分立

经过考训任用的税务人员在职务上有一定的保障。《财政部直接税税务人员任用规则》中规定：对已实授职务的税务人员，应按规定等级叙级支俸，按年考绩，循资擢升。对贻误公务情节重大曾记大过三次以上，或有非法营私行为经调查确实的以外，不得免职或降级。无论免职（包括停职）降级，必须报经直接税处（署）核准，各级长官均无权行使此项权利。这个办法的实行，对于造成直接税税务人员的廉洁奉公，奋志进取，有极大的关系。

上项规定，对于财训所考训人员同样适用。

稽经分立，就是稽征税款与经收税款彻底分开。税务机关负责稽征税款，委托银行、邮局代收税款。过去机关和税收人员常为人所诟病，即在税款的自收自解。而过去重大弊端的发生，多源于此。

为清除纳税人对收税人的不良观感，有利于推行税务，直接的征课制度严格规定，稽征机关只司核定应纳税款，通知纳税人径往经收银行缴纳，银行径列国库帐目，并给纳税人以库款收据。

使用上述方式缴纳的税款，非经财政部长及审计长官的签署

命令，不能支取。此种稽经分开的办法，当时实无先例，同时奠定了以后实行公库法规定税务机关不经收税款的良好基石，涤除了经收税款从中舞弊的恶习。

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所得税自开办以来，即积极考训税人，加强培育，以提高其法制知识、课征技术。这些税人在这两个方面提高较快，一般都能达到正确课征、负担合理的要求。由于纳税人方面多未养成纳税良习，两套帐簿，弄虚作假，多报开支损失，申报不实，千方百计进行偷漏，不少工商大户聘请专门会计为作假帐，企图蒙混过关，逃避税负。虽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际此民族存亡继续之秋，正国人毁家纾难之日”，以激发其良知，使其据实纳税，但仍有不少厂、商爱钱如命，以私害公，偷漏巨额税款。且大的厂、商又直接间接与恶势力有关，往往有恃无恐，蔑视法令，确征之难，可以想见。

为了贯彻法令，正确课征，除在税务法令规定严密的稽征办法和处罚法则外，还实行四管（管理工商单位、帐簿、票证、货运），严厉印花贴用，查实每月营业额以及帐外集证，在工商同业间、工商相互联系上下功夫，以取得课征上有关的资料，使他们在证据面前无话可说，只有遵章纳税。

为了使征纳双方有所遵循，征税者不敢违法舞弊，纳税者能遵章报缴，直接税处（署）还责成主管各科室编写税收实务的专门著作，以期纳税人明晓直接税体系所管各税的课征范围、课征程序、适用税率、报缴办法以及处罚规定，树立纳税为荣、违法必究的思想，做到自动报交。

关于直接税的专门著作，除研究中国直接税的学者的著作多种外，仅内部著作就有高秉坊著的《中国直接税的生长》、《中国直接税的史实》，杜岩双的《中国所得税》，赵佩玺的《中国遗产

税》，包超时、倪镇合著的《中国营业税》，吴仕汉的《中国直接税制度》，孙邦治的《中国直接税会计学》。还有专门便于稽征检查偷漏编写的，如孙邦治的《中国所得税查帐学》，包超时的《中国所得税逃税论》，财政部直接税处（署）经济研究室的《营业税逃税百弊》，作为直接税税务人员征税作战的有力武器。《营业税逃税百弊》为内部资料，其余各种著作分别赠售，以广宣传。

旧中华邮政人事制度一瞥

毛祖培

我是1935年经过三榜考试进入邮局工作的邮政人员。解放前长期在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内地业务股工作，也做过二、三等邮局局长，现就个人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介绍一下旧中国邮政的有关情况。

一、邮政人员分类

邮局职工旧时分为内班（即职员，意即内勤，相当于现在的干部）与外班（即工人，也称差工，意即外勤）。内班（职员）分为邮务长、副邮务长、高级邮务员、邮务员、邮务佐。外班（工人）分为信差、邮差、听差、力伎、局役。

邮务长：旧称邮务官，是邮政人员中最高级的人员，工资待遇最高，地位高，权力大。一般担任各省和直辖市邮政管理局局长、邮政总局副局长（局长是交通部委派的官员，一般不是邮政人员出身）和总局各处处长，要求中文、外文水平高，能讲一种外文（原来邮局是外国人创办的，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多）。初时，邮务长多是外籍人，本国人少，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外籍人（旧称洋员）才逐渐回国。邮政人员能贵为邮务长，可以说是从邮生涯登峰造极了。

副邮务长：旧时也称邮务官，是仅次于邮务长的高级人员，工资待遇高。一般可担任邮政总局各处处长、副处长和各省、

市邮政管理局帮办（分邮务帮办、财务帮办，等于副局长职务）。要求与邮务长相同，邮权未收回前，多为外籍人（洋员）充任。

高级邮务员：也称甲等邮务员，在邮局中也属于高级人员，文化程度要求有大学水平，一般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资深的高级邮务员（指二等一级到一等一级）可派任总局副处长和各课课长及省局各股股长、主任股员及一等甲级（须戴署副邮务长帽子）和乙级邮局局长、或一等局的监察员（也称总领班，等于副局长，过去省局和以下各局都不设副职），其余各级高等邮务员可派任二等甲级和乙级邮局局长与省局视察员。

以上三种人员属于旧邮政的高级人员，他们的工会组织名叫“职工会”。邮务员以下职员及各类工人共同组织的工会名叫“邮务工会。”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当时任中华全国邮务工会常务理事。

邮务员：也称乙等邮务员或初级邮务员，是旧时邮局的中级人员。可担任二等和三等各级邮局局长与省局各股下设的组长以及省局视察员，一等局的监察员秘书长。

邮务佐：是低级职员，做一般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邮务佐也可派充三等甲、乙级邮局局长和一等局下设的组长或邮政支局局长。年资不深的邮务佐，也可派任三等乙级局长。

现再谈谈外班（即工人）的情况：

信差：是邮政工人中最高一级的人员。一般是专任投送城市邮件工作的，也可根据需要派作局备汽车（即邮政汽车，长途运送邮件）邮件押运员，接送轮船、火车、汽车邮件的接件员，或做邮件分拣封发等工作。此类工人，各级邮局不论大小至少配备一人。

邮差：是专跑步班邮路，运送整袋整包邮件的工人。有的步行边远农村集镇和沿途村庄收寄、投送少量邮件（有集镇的地方一般不够设局条件，但大多设置了邮政代办所或乡村信柜，是邮

政的一个网点)。这类工人是邮务工人中工作最辛苦的工种。他们靠肩挑、背负，步行去完成任务(旧时没有自行车邮路，即使个别地区需要，也因限于地理条件只能组织车、步混合邮路，即骑一段车，走一段路)。规定每天负重至少60市斤，行程至少60华里，常年累月，风雨无阻。当时劳保条件很差，没有鞋、帽、衣、袜、雨衣等劳保物品，每年只发一把雨伞(纸伞)、一件背心(印有邮差字样)。为了加快邮运速度，在重要路线上还组织昼夜兼程班(即日夜行走不停，接力行路。我国封建时代的驿邮就是采用这种传递方式)。解放前，我国水陆交通都不方便，多数地区的邮运就靠人力运输来沟通。这些人力就是邮差。旧时邮局多数配有邮差，人数多少，根据所辖步班邮路远近来决定。

听差：顾名思义是供人使唤的工人，属于勤杂一类工人。这一工种有邮局听差与普通听差之分，前者是助理邮件封发工作的工人，后者是供省局和一等局高级官员使用的。除总局、省局、一等局和少数二等甲级局外，一般邮局不配备此类工人。

力役：也称苦力(洋人称呼)，即搬运邮件的工人。除省局、一等局和火车、汽车、轮船通达的地方来往邮件较多，特别是负责邮件转运的邮局外，其他邮局不配备这类工人。

局役：即勤杂人员。一般负责搞清洁卫生、局内传送文件及其他杂务，有的也可助理邮件封发等工作。除省局、一等局和部分二等局外，其他邮局一般不配备此类工人。

二、招工考试

旧中国劳动就业一般是靠人介绍(俗称“八行书”或“背景”)，即使是大学毕业生或国外留学回来的人，不经人介绍是难以找到工作的，而介绍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和关系的深浅又决定工作的好坏。邮政员工则必须以考试为进身之阶。低级工人也可经人介绍，但也要经过简单的识字测试，认为合格方可录用。职员

(内班人员)不经考试合格是不能录用的。

(一) 职员

1. 邮务长、副邮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中文和外文水平，能阅读和使用一种外文，会讲一种外文，懂得邮政法规。未闻对外分开招考过。具体考试科目不详。

2. 高级邮务员：须有大学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方可报考，在职的二等六级以上邮务员也可报考。招工考试由邮政总局主持或由总局命题授权省(市)邮政管理局招考，也可委托国家考试院主办高等文官考试时一并招考，考试分笔试与口试。

笔试科目为：党义(三民主义)、国文(即现时的语文)、英文、数学、宪法、民法概论、经济学、历史、地理、邮政法规。

口试：就上述笔试科目以口头测试。

3. 邮务员：须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的青年方可报考。考试(以1936年为例)由交通部邮政总局主持，分省区组成考试委员会，由交通部委派考试委员长主持考试，多数是各省(市)邮政管理局奉命主持招考。

笔试：分初试与复试。初试科目：党义(政治)、国文、英文。复试科目：数学、地理、簿记(即会计记账)、经济概论、邮政法规、历史。初试出榜录取后，参加复试，复试出榜录取后，参加口试；口试合格，出榜才算正式录取。整个考试要经三次筛选。口试出榜录取后，还要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如发现有重大疾病(例如肺结核、深度近视或其他传染性疾病)还要除名(其他职工考试都须经过体格检验)。

4. 邮务佐：须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或有同等学历的青年方可报考。有先考笔试，后考口试的；也有先考口试，后考笔试的。无论先考口试或先考笔试，都必须初试出榜后，才可参加复试，复试出榜后才算正式录取。

笔试科目：党义(政治)、国文、英文、数学、地理。口试科目：有时口诵设有标点符号的中文(文言文)、英文各一篇，口诵

时要求发音清楚、断句正确方算合格。有时还询问中、英文及交通地理方面的知识。

(二) 工人

邮务工人由于工作任务不同，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考试科目比较简单，其中信差一类所担负的工作比其他工人较重要，工资待遇也高于其他工人，因此对文化程度要求略高。报考信差须具有高小文化程度，其考试科目为语文、算术二门。其他工人只要粗识文字，能认识地名就行，只考口试，不须笔试。

邮局为了鼓励职工努力上进，订有“过班”制度，凡低一级的职工工作时间较长，平日表现较好，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允许参加高一级职工的招工考试。经考试录取后，即可改变工种等级。例如，信差可以参加邮务佐考试，一经录取，即可由工人升为职员，享受职员待遇。

此外，对平日表现好，一贯努力工作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又是一等考绩的职工，年资达到本工种最高级（即一等一级），满两年后，经主管股长（指省局股长，等于现在的处长）保荐报请邮政总局批准，可以按积资升等办法，不须经过考试，“过班”升入上一级职工班次。例如一等一级邮务员可以升为一等六级高级邮务员，工资由每月 320 元增加为 340 元，以后可以逐级增加到 500 元。

按照规定，邮政人员特别是职员未经正式考试是不能录用的，工资只能从最低一级逐年增加。但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却把中央军校庐山特别训练班一批交通班学员硬塞了进来，而且不按邮局规定，开始就要按二等六级邮务员月薪 70 元录用（按邮章规定，邮务员进局时是按三等三级试用，每月工资 40 元起支付的），引起邮局职工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华全国邮务工会曾向当局提出抗议。交通部和邮政总局负责人慑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淫威，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地接收了这批人。据说这批人原来的胃口更大，开始要求按高级邮务员录用，希图享

受更高待遇，而他们的学历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且未经邮政总局正式招考，不符合邮局的用人制度。他们的进入无疑破坏了邮局的规章制度，遭到邮务工会和全体邮政职工的强烈抵制是必然的。经过交涉，最后才允许按二等六级邮务员录用。这样，只要举行高级邮务员考试，他们就有资格报考。这批人可算是特殊录用的人员，也是旧中国邮政史上又一件怪事。

旧时邮局招工考试原来是比较严格的，规定不准徇私舞弊。抗日战争前一年，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招考一批邮务佐（人数约 100 名）。局长（姓名记不清）碍于朋友的情面，将一名不合格的考生取在榜末，后被人检举。邮政总局派员查实，按章本应受到开除处分，因没有受贿，总局又念他平日为人尚正派，又是 30 多年的老邮务长，从轻发落劝他引咎退休（那时退休等于退职，一次发一笔退休金就算了事）。又如 1936 年江西招考邮务员时，考场尚未开始发试卷，考生周××只迟到五分钟，就不准进场并被取消应考资格。由此可见当时邮局考试是何等严格。

到抗日战争后期，很多省局一再后迁，邮局职工生活日益艰苦，从此邮局招考每况愈下，每批录取人数也多于往年。

三、工资待遇

旧邮政职工的工资待遇与当时外界（海关、银行、铁路除外）相比是较为优厚的，而且比较稳定可靠。但职工上下级的工资差别则相当悬殊。邮务长的工资就比工人高十几倍。就是同一班次，例如同是高级邮务员或邮务员，新进人员与资深的老人工资相比也往往相差好几倍。具体情况约见下述：

1. 邮务长：分三级，工资 650 元至 800 元（洋员更高）。署邮务长每月工资为 650 元，署理期限由邮政总局或交通部考核决定。实授邮务长每月工资升为 700 元，再过两年增至 800 元。

2. 副邮务长：分三级，工资 550 元至 650 元（洋员更高）。署

副邮务长每月工资 500 元，另加署理津贴 50 元。如一等一级以下各级高级邮务员被授予署副邮务长职称则照支原来工资，另加每月署理津贴 50 元。署理期限由邮政总局考核决定。实授副邮务长后，工资为 550 元，每过 1—2 年加薪一次，最高为 650 元。

上述邮务长和副邮务长（包括署理的）除享受较高工资外，还可以免费住公寓（一幢），使用公家的家具和餐具，而且可由公家免费拨给听差（工人）、包车（即黄包车，上海等大城市可以享受小轿车）。邮务长还可免费拨给厨师、女佣保姆各一人。

3. 高级邮务员：共分三等十五级。工资起首试用（三等三级）为 100 元（如在职邮务员过班的，不加“试用”字样），试用期 15 个月。最高级为一等一级，每月工资 500 元。一等分六级，二等分六级，三等分三级。

4. 邮务员：共分三等十五级。工资起首为试用三等三级邮务员每月 40 元（如过班人员，可不加“试用”字样）。最高为一等一级邮务员每月 320 元（原为 270 元）。一等分六级，二等分六级，三等分三级。

5. 邮务佐：共分四等十三级，另加试用一级共为十四级。一等分二级，二等分三级，三等分四级，四等分四级。工资起首为试用邮务佐每月 30 元，试用一年改为四等四级每月工资 35 元。以后逐级增加，最高为一等一级邮务佐月薪 160 元（原为 123 元）。

以上为职员工资待遇，以下为工人工资待遇。工人不分等级。

6. 信差（即城市投递员）：每月工资起首为 18 元，以后每年增加一次，最高为 100 元（原为 80 元）。

7. 邮差、听差：每月工资起首为 16 元，以后每年增加一次，最高为 80 元（原为 65 元）。

8. 力役、局役：每月工资起首为 14 元，以后按年增加，最高可达 70 元。

因工人工资较低，为使其安心工作，每次加薪（即工资）周期比职员短，开始半年加一次，以后逐渐延长为一年；职员工资

较高，每次加薪周期要长于工人。邮务员与邮务佐第一次加薪时间为一年，高级邮务员第一次加薪期为 15 个月，等级越高时间越长，以后延长最多为两年。

各级邮政职工除按月领取工资（包括津贴）外，每年年终每人可按年资（工龄）领取 1 至 3 个月的年终奖励金（也叫年终双薪）。邮政职工除按规定发给应得的工资外，每人每月还可领取米贴二元。省局和一等局的职工因当地物价较高，每月还可领取特别津贴若干元，这些津贴在本人每月工资加到 100 元以上时，即予停发。

四、奖 惩

“邮政纲要”（等于当时的邮政宪法）按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精神，对邮局职工实行奖惩。

奖励：邮局职工对发展邮政业务，维护邮局权益或做了其他有益于邮政事业的事，按贡献大小授予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或传令嘉奖等奖励。记功人员可以提前晋级加薪。记三等功的可提前 3 个月晋级（例如三级升为二级或二级升为一级）加薪，记二等功的提前 6 个月晋级加薪，记一等功的提前 9 个月或 1 年晋级加薪。

惩罚：邮局职工如因本人工作过失使寄件人或收件人（即用户）蒙受损失，或损害邮局声誉或使邮局受到经济损失的，必须视情节轻重受到邮章的惩处。其类别分为：口头申诉（不作记录）、申斥、告诫、三等过，二等过，一等过，开除、交政府法办。其中申诉为最轻微的处分，不影响晋级加薪；告诫处分略重于申诉，对加薪也无大碍，不过在一年之内连续受到三次告诫的，按章就要改作三等过的处分，下次晋级加薪就要延迟 3 个月；记二等过的延迟 6 个月晋级加薪；记一等过的延迟 9 个月至 1 年晋级加薪。凡在工作期间受到三次大过处分的即予开除。如担任经管

银钱工作的，经查明短少公款（突击检查发现），不论短少金额多少，一律开除并送官究办。同时所少金额，如本人无力偿还，即向保证人追缴。邮局职工每人都有保证人，但资深的人员可以免保。保证人一般都是店保，也可交现金作保。保证金额有多有少，一般工人较少，职员较多，而负责经营银钱的更多。

抗日战争期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上饶时，上饶邮局前局长魏和声虽是高级邮务员，但在视察员突击检查时发现他短少公款数百元（据说是挪用公款给妻弟合伙做生意），即被移送当地警察局扣押，一面报请省局批准开除，追回公款。他虽系资深人员，各方关系尚好，但仍不能逃脱开除的处分。

旧时邮局的传统，一向侧重处罚，记过的多，记功的少。职工犯有过错，一经发现或被人检举，就要按章惩处，毫不留情。过去错发一封信（即使是平信）也同样处分（告诫处分），错发或漏发一包信，就给一个三等过的处分；如果性质严重，后果很坏，就要记二等过或一等过。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选举时，南昌寄九江一封挂号信，内装数十张选票，这封信被南昌邮局的一个职工错发往山东济南，再由济南寄还九江，往返耽误了一个多星期，影响竞选。寄件人向江西省邮政管理局控告后，省局派人调查是职工金松龄经手，主管人责成他写检讨。他感到问题严重，害怕承担不起。当时他父亲在社会上有点地位，与省局刘局长有一面之交，就请父亲向刘局长说情；同时向寄件人疏通，请求寄件人免予追究。刘局长对金松龄不认真对待错误，反而托人说情，很为恼怒，给予记两个一等过的处分。

五、邮局员工的调派、任免

各省（市）邮政管理局设局长、帮办（邮务帮办和财务帮办各一人，有的省局只设一人），下设若干股（即现在的处），股设股长，大股还设主任股员（相当副校长），股下设若干组（相当现

在的科），组设组长。

省管局一般设总务股（即办公室，股长兼秘书）、会计股（即计划财务处设主任股员）、本地业务股（负责管理本城市的业务，设主任股员，下设支局若干）、内地业务股（管理全省各市县的邮政业务，人事调配任免奖惩和一部分财务开支，操全省内地各邮局生杀大权，设主任股员），储汇股、出纳股、运输股（有的省因业务不多，并入本地业务股，不另设股）。

省管局局长、帮办、各股股长由邮政总局直接调派任免（省局局长也可由总局提名请交通部任免）。各股主任股员及组长由主管股长提名，请省局局长任免。城市支局局长也可由本地股提请省局局长任免。

一等甲级和乙级邮局设局长一名、监察员（相当副局长）一名、秘书一名。一等甲级局局长一般戴有署邮务长或副邮务长的帽子，由邮政总局调派、任免。一等乙级局局长及监察员与秘书由省管局局长调派、任免。

二等甲乙级邮局和三等甲乙级邮局设局长一名，由内地业务股股长代行省局局长职权负责调派、任免。

旧中国各级邮局人员的职务安排，最重论资排辈，资浅人员是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的。各省（市）邮政管理局局长须派邮务长或署邮务长担任，帮办须由副邮务长或署副邮务长充任；各股股长须派资深的高级邮务员担任，其中会计股及内地业务股股长因职权很大，一般须派署副邮务长充任，但须管有100个内地局的条件下方可戴上署副邮务长的头衔，享受较优厚的待遇。因此，有些内地业务股股长（都是一等六级至一等一级资深的高级邮务员；也有较小的省局只派二等一、二级高级邮务员担任，但因资历不是很深，不够戴署副邮务长桂冠的条件），为了争取戴上乌纱帽，就拼命增设新的邮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西驻军云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上饶、赣东北一带的部队和军事机关很多，邮政业务突然增加。江西省邮政管理局为了应付客观需要，

除了给上饶、玉山、广丰、铅山、贵溪、弋阳、东乡、景德镇等邮局增派员工、扩充邮路、加强通信能力之外，还在鹰潭、邓家埠（当时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驻守鹰潭，当地未设邮局，只有邮政代办所，副长官司令部也配有军邮局一个，专为部队官兵服务）、万年等地开设新的邮局。当时任江西省局内地业务股股长职务的是一等一级高级邮务员罗广榴（广东人），他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拼命增设邮局，美其名是支援抗战，加强通信服务，实则是利用驻军云集带来邮政业务上升的机会，选择一些原来未设邮局的县镇地方，开设邮局（邮政业务收入勉可应付开支的）。为了缩小开支，每局配备局长一人、信差一人，都派工资不高的资浅员工。当时充任局长的，一般都是进局不久的邮务佐（署理），在短短的时间里，陆续开设了邮局 30 个，连原有的全省邮局已超过 100 个。不久，他就挂上了署副邮务长的桂冠了。

省管局本地业务股和内地业务股设视察员若干名（本地业务股一般只设一人，如城市支局多也可多设），负责检查督促下属各局工作。两股视察员可由高级邮务员或资深的邮务员担任。由主管股长提名请省局局长调派任免。

一等甲级邮局局长由副邮务长或资深的高级邮务员充任，一等乙级邮局局长由资深的高级邮务员充任，一等局的监察员由高级邮务员或资深的邮务员充任。

二等甲级、乙级邮局局长须派高级邮务员或资深的邮务员充任。二等局派设的襄办（相当于副职）可派邮务员或邮务佐担任（多半是邮务佐）。上饶局自抗日战争起升为二等甲级邮局，前局长魏和声、陈畏民、陈楚豪等都是资深的高级邮务员。

三等甲级、乙级局局长由邮务员或邮务佐担任。资浅的邮务佐只能署理，不能正式担任局长职务。

各类职工的招用和调配，统由总务股负责掌握，分配给各股后则由各股负责管理和使用。股际的调派仍由总务股负责办理。各

内地局之间的调派概归内地业务股负责。

六、请 假

旧时邮局对职工请假，掌握很严。无论婚丧、病、事、调遣假都须经过查实后方可准假。病假除医生出具的证明外，还要交验医生处方和药费发票才能批准。各种假期一经批准就不扣工资。超假如无可靠证明并办续假手续，即作旷工处理，轻则记过，重则开除出局。

婚丧假各五天，往返路程除外。调遣假在启程前和到达后各三天。事假最多 14 天。病假按实际需要核给。

各级职员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如连续六年没有请过一天假的，可以请给六个月假（供旅行等用），不扣工资。

七、退 休

旧时邮局职工退休是这样的：凡进局工作满 15 年的各级职工都可申请退休。主管批准后（邮务长、副邮务长、高级邮务员由邮政总局批准，其余员工由各省管理局局长批准），即可按章一次领取全部养老金，从此与邮局脱离关系，邮局不再负责病丧费用。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是：按实际在局工龄（不计算一般工龄）计算，前八年每年发一个月工资，总数最多不得超过本人月工资的 40 倍。

我在东北的特务活动

文 强

作者曾为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及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本文较详细地介绍了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如何千方百计打入东北地区及在东北地区所犯的种种罪行。

一、日本投降之后的东北军统活动情况

日本投降之前，军统局的特务组织，尚未伸入到东北境内。

日本投降后，美蒋合谋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大举海、空运兵到东北之时，军统局抓住这一时机，配合进军和接收的行动，有计划地在东北开始建立特务统治。

当时戴笠认为哈尔滨市是称为东北国际都市的所在，特别挑选了曾留学美国专门学警察的余秀豪，随着新发表的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前往担任哈尔滨警察局局长一职，名义上对外是警察局长，实际上は要求余秀豪借警察局的掩护，建立特务组织。余秀豪是负双重任务的。

同时军统局曾电令“北平办事处”（又称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遴选熟悉东北情况的军事人员携带电台随杜聿明指挥部进入东北。经军统头目陈铁珍的提名，马汉三介绍荆有章前往。

荆见杜聿明后，被发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以之作掩护，实际上是按军统指示，进入东北作特务活动。

军统局在上述两处作了布置的同时，又曾令原住界首（苏鲁豫皖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要地）担任对日汪进行策反任务的特别站站长陈旭东，将该站全部人员移调东北，配合余秀豪、荆有章进行特务活动。陈旭东是东北铁岭县人，张学良统治东北时的情报科长，西安“双十二”事变之后，才投入戴笠的门下的。因而军统局电令陈旭东率全站人员移调东北，对其寄托的希望远在余秀豪、荆有章之上。

余秀豪到哈尔滨不久，由于牵扯到谋杀抗日联军高级将领李兆麟一案，眼看在哈尔滨难以站住；荆有章与军统历史关系不深，加之其到达东北之后，招兵买马，到处收容日伪军，为一己私图在活动，被认为是不羁之马，难以驾驭。戴笠对陈旭东原来的期望甚殷，不料他率领站部，经济南、青岛、天津等地沿途停留时久，比荆有章迟了两个多月，方到达锦州。戴笠早已得知以上各情，对最先一批派遣入东北的特务均不满，因而又在1945年12月底，调我赶到北平与他见面。当时东北行营尚在北平寄居，因而我到北平与戴笠初次见面时，决定暂留北平待命，视情况再作出归的打算。同时由于戴笠在北平停留期间对马汉三印象甚坏，又欲留我在北平主持华北办事处兼负东北之责。这就是我在平逗留到1946年2月才去到锦州的原因，也是尔后才将东北有关军统组织全交我负责统一归并的原因。军统局东北办事处于1946年3月1日在东北行营督察处的名义掩护之下，才在锦州正式成立。

二、参加接收东北活动的决定

1945年12月中旬，我在西安任军统局的北方区区长，对外掩护名义是“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正陪同胡宗南到郑州举行授降典礼，就顺便到开封去视察，并处

理肃奸事宜（当时我兼第一战区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预定要停留月余。忽接西安电话，谓重庆来电，要我星夜返回西安，趁班机赴渝等语。我赶回西安之后，才知道有调东北之意，而且业已派徐远举前来接替我的职务。我匆匆交代后，即飞渝报到，见到了主任秘书毛人凤。他告诉我说：“戴老板（指戴笠）在北平相候，有意请兄到东北主持工作。本局先后派了几批人到东北都不得力，非兄全盘筹划不可……”我与毛人凤交换了一些意见，大都关于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两大机构之中如何取得公开名义为掩护的问题。毛认为东北情况的中枢措施他也不明白，嘱我到北平后，当面向戴笠请示。我于12月底飞到北平，下榻于安福胡同22号白莲丞的家里，当日晚到什锦花园原吴佩孚公馆见戴笠。他告诉我说：“这次调你来的打算是有关你去东北工作的问题。我本日晚即须到天津、青岛一行，一月内仍返北平过春节。你去东北的问题，容后再作具体的决定。”戴笠到了天津之后，又亲笔写给我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情况复杂，前途未可乐观。东北行营尚留北平，可多多与行营留平负责人交往，做一些布置东北工作的准备。同时还说到必要时将文强留北平办事处兼负东北之责。我在北平频频与东北行营留北平的负责人员有所接触，对长春方面与苏军交涉的情形是不抱乐观的，眼睛也就注视到杜聿明的枪杆子，希望他赶快打出关去。

当时杜聿明的部队疯狂地进攻解放区，占领了榆锦线，刚在锦州站住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在平，鼓励我说：“老杜真有一手，顺利地打到锦州，大有破竹之势。你为何不去锦州一行？”我说：“我本来打算去一趟，但还不知道铁路交通如何？”他说：“用不着迟疑，也用不着打听铁路交通情形。我已经派空军地区司令吴礼到锦州接收了日本机场，也已有了军用飞机，在空中建立了走廊。你如果要去，随时到机场等候都行。最好是每日拂晓前，准有一班。由于北方正在雪季，太阳一出便有雾，飞机起飞总是在日出之前。”于是我照着王叔铭所说的，在旧历春节前一星期，赶到锦

州去一趟。在病榻上见了杜聿明，谈了一些东北的情况。他的参谋长赵家骧更谈得详细一些，而且绘了一份进犯解放区的敌我态势图，最主要的企图有三个方面：即抢占热河、承德、朝阳到锦州之线，策应华北和傅作义之打通平绥线，此其一；迫切地要肃清沈阳外围，先向营口、本溪一带扫荡，此其二；另调一部主力部队准备渡辽河向沈阳以北四平、长春一线推进，此其三。我这次到锦州与杜聿明还作了第二次的见面。他告诉我，遵医嘱将赴平手术，唯对外须保守机密，恐影响军心。由于戴笠在平见面时与我谈过，打算在杜聿明主持的东北保安司令部设立一个督察处，并拟定派程克祥做处长。我提出了戴笠的这个意见，告知了他，杜当即表示说：“雨农（戴笠的别号）派谁来都行。以前派来的荆有章，人倒是精干的，作风太乱一点。听说他还在到处收编队伍，闹得地方上很乱。最近东北地区，到处都有招兵买马，趁火打劫的。自封的司令、指挥，有如雨后春笋。我正在下令取缔惩办之中。”我在锦州逗留了不到一星期，便取道山海关坐车回北平。

1946年2月中旬，戴笠自青岛第二次来到北平，正是过春节的前夕，我将等候他来平期间与东北行营人员的接触及到锦州见杜聿明的情形作了汇报。他很满意地说：“有了光亭（杜聿明）打出天下，不但我们的事好办了，行营也不愁无立足之地了。政学系都是一些书生，哪里懂得枪杆子的奥妙。既然有了比较好的环境，你也不必留平，决定请你专负东北的全责，统一规划办理。程克祥尚在考查中，无去东北的必要。行营、长官部配属的机构，为了统一事权，也全由你负责。”并约于次日晚间邀同陈旭东在什锦花园前吴佩孚公馆共餐，详谈去东北的注意事项。

戴笠这次与我和陈旭东的谈话，早有过周密的准备。记得在共餐时，指定我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以陈旭东为副处长，公开掩护名称，仿北平行营例——设立一个东北行营督察处。他说：“杜聿明主持的东北保安司令部之内，同样设立一个督察处，处长

由文强兼，昶新兄（陈旭东别号）不必兼长官部督察处副处长。因为东北情况复杂，借重之处正多，要多多协助建立和开展本局在东北的工作。我知道对昶新兄来说，是委屈了一些，但这是一个过渡，将来是不愁在东北没有地位的，如果张汉卿出山（指张学良将军），蒋主席还要大大的借重。”这些灌米汤的话说得陈旭东哈哈大笑，受宠若惊。饭后，戴笠将我和陈旭东引进他的内会客室，取出一个小日记本，慢吞吞地瞧着那个本子上一项一项地指示我和陈旭东两人去东北的主要任务：

（一）要在东北地区迅速有计划地建立起军统组织，本“中央”政策，须集中“优秀”人才到东北工作，以期早日完成接收任务。

（二）东北在俄国垂涎之下，尤其是十年友好条约的签订，已形成了巴尔干半岛第二，是世界火药库，是国际间必争之地，须好好研究中苏条约的内容，小心谨慎地对付俄国人。

（三）专靠后方调去的北方干部不够用（指冀、鲁、晋、豫四省籍贯的军统分子），且不熟悉东北情形，须就地取材，吸收当地“优秀”人才参加工作。

（四）注意考察和搜集日本人统治东北时一切有关治安措施的资料作参考，以资借鉴。

自戴笠有了明确的决定之后，陈旭东仍返回天津。我第二次在暴风雪中飞到锦州。这是1946年2月25日前后的事。这时东北行营正在决定搬迁锦州之时，经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接头，找到了锦州市一家日本粮食株式会社的房屋作办公地址，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这个掩护名义之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公、秘配合同时于3月1日成立。

军统局东北办事处的成立，在统一归划之下，首先是接收余秀豪、荆有章、陈旭东三部分最先进入东北的军统组织，要他们自行向办事处作出交代，同时军统局也将三部分的编制、预算及人事名册寄到东北。在统一归划接收的期间，根据三方的不同情

况，次第办理接收手续，三方面都在各地接收了不少的日伪统治下的特务分子，尤其是荆有章、陈旭东从旧东北军系统中吸收了不少的失业军官，对上无案可查，对下都是上校至少将级的“高干”，一时令我大为伤脑筋。陈旭东是人马先行，本人则压后迟迟不达，直等到行营督察处正式成立，也就是锦州确已稳定下来之后，他才到锦州转了一趟。适因3月17日戴笠在南京近郊坠机焚毙之事发生，军统局急电我飞渝一行，这样，我才抓住陈旭东，要他在锦州全权代我办理接收组织和布置统筹计划中的工作。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则由副处长张树勋代理。我那次到重庆，往返为时月余，关于东北按统一计划从新布置工作的最初阶段，陈旭东、张树勋和秘书陈泽如三人，是实际负责的执行人。

三、军统局在东北的领导机构 及公秘关系的配合作用

军统局在东北的领导机构前后用过两个不同的名称。第一阶段，1946年3月1日至同年11月1日，对外称“东北行营督察处”，对内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自同年11月1日以后，由于上层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个蒋介石军事独裁工具的撤销，仿效美国制度，换汤不换药地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亦随之而告撤销。但实际上同样也是换汤不换药地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于这一改组的演变，使原属军统局东北的领导机构职权的隶属关系上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第一阶段的公、密关系，原来是一根线通到军统局，是二而一，一而二，互相配合掩护的东西；第二阶段其所以发生了隶属关系的原因，问题在改组后的保密局，名义上属国防部，蒋介石又不愿让国防部过问，而仍然是直属于他个人。为了仿效美国制度，各高级军事机构中的情报机构，一律改第二处，并隶属于国防部第二厅管辖。东北行营督察处、长官部督察处亦随之撤销，改组为第二处。于是这么

一来，由上而下的牵出了两条线，一条线是秘密的领导机构——由军统东北办事处改组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直属于保密局局本部，一条线是公开的掩护的机构——东北行营第二处，直属于第二厅（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撤销，将一部分军统分子并入该长官部原有的第二处内，原长官部督察处副处长张树勋改为该第二处副处长）。因为发生了两条领导线的矛盾，不得不将公秘划分为二，各自单独办公。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公开掩护单位第二处，随行营在沈阳办公大楼办公，秘密单位仍在原督察处办公。地址在沈阳义光街四段 46 号。自从公、密划分为两部分办公之后，遵照军统局的习惯，由秘密单位领导公开单位的工作。秘密单位对外保守机密，不以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作公开活动。公开单位的第二处对外是掩护秘密单位的工作。并作公开活动的公秘两单位，对上行文是两条线，对下行文也是两条线，互不相混的。

军统东北办事处——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和东北行营督察处的编制和人事配备情形（东北办事处——东北督导室虽前后两个阶段名称不同，但编制和人事配备情形大致相同，无多变动，故用一个表说明之。行营督察处存在时期，系与东北办事处合并办公，并未另设机构，只是对外为公开名称作掩护而已）。

编制：

设处长（或称主任）1人（少将或中将）

副处长（或称副主任）1至2人（少将）

秘书1人（上校）

助理秘书1至2人（少校或中校）

督察1人（上校）

助理督察1至2人（阶级不定）

军法官1人（上校）

人事科科长1人（上校）

情报科科长1人（上校）

电讯科科长1人（上校）

总务科科长 1 人（上校）
会计科科长 1 人（中校）
军医 1 人（少校或中校，曾一度扩大为临时医疗所）
督察大队（又称警卫大队）设大队长 1 人（上校），队长 3 人
(编为一、二、三中队，队长阶级为中、少校)，队员共 200 人，支
士级及准尉级待遇，由陈旭东负责在东北临时招募介绍而来，多
具有高小到初中的文化程度。

主要负责人事配备：

主任（或称处长）：文强

副主任（或称副处长）：陈旭东、陈仙洲、王力

秘书：陈泽如

助理秘书：蹇庆德、蒋膏生

督察：孙海

军法官：罗子陨

人事科科长：徐哲甫

情报科科长：袁士举、董承烈（前后分任）

电讯科科长：王允吉

总务科科长：蒋膏生、王维善（前后分任）

会计科科长：张璜、李彦

军医：于得彩

督察大队长：刘惠民、文子瞻

四、两年特务活动的荦荦大端者

我在东北负特务责任的将近两年过程中（从 1946 年 2 月至 1947 年 12 月），保密局特务在东北境内对人民和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及其罪恶，是罄竹难书的。

（一）应东北交通运输总局局长陈延炯的请求，派武装特务由张树勋率领强迫接收沈阳铁路总局铁路宾馆，将苏联人撵走，并

没收其电台。

(二) 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魏德迈来华协助蒋介石打内战。他到达东北视察时，我们遵照熊式辉的指示，捏造反苏反共情报资料和证物，企图诬蔑苏联帮助中共打内战，扩大国际宣传（熊式辉当时是东北行营主任），以争取美援为目的。

(三) 1947年5月奉熊式辉指示，协助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到大连访问，经我派出特务人员及电台随行，电台报务员置于兵舰上，其他随行特务登陆为之护卫和刺探旅（顺）、大（连）虚实。

(四) 当国民党军队侵占安东（现为丹东市）时，曾派情报组进入安东市，企图混入朝鲜境之新义州、平壤等地，重点在于侦察苏联红军据扎情况以及朝鲜境内的其他动态，企图捏造北朝鲜的人民武装力量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打内战的情报和证物。

(五) 1947年春，中共派李焕然（即李立三）到沈阳谈判交换俘虏，恢复电源，遣送日本侨俘等问题。熊式辉、杜聿明节外生枝，故意为难，指派我前往中苏联谊社大楼——李先生下榻处，借访问为词，故意诬蔑曲解中苏条约的签订（指苏联于1945年8月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十年友好条约），是对中国极不友好、极不平等的条约，与帝俄时代的侵略政策一样，无理纠缠了两个多小时。

(六) 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前后，全国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高喊“反内战”“反饥饿”等口号。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时风起云涌地卷入到这一爱国学生运动之中，也就很快地传播到了东北地区。东北蒋管区借口军事紧急时期，无限制地戒严，实行宵禁，沈阳市成了恐怖世界。尽管如此，当时东北大学却仍然爆发了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早已奉到了蒋介石来电指示。他们在东北尚未爆发爱国学生运动之前，即采取了宵禁措施，同时还暗中指使国民党党棍、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头目配合军警特务，作了密切的监视布置。后来听到东北大学的学生发生了罢课、示威的行动，唯恐东

北闹成平津、上海等地一样，一再严令，要加强镇压措施。我曾会同长官部参谋赵家骥、代沈阳市警备司令彭璧生、宪兵第十六团团长长沙靖、沈阳市警察局局长毛文佐、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宁支团部干事长刘广瑛、中统东北特派员单成仪等几度密商，决定采取所谓“釜底抽薪”之策。一方面由三青团分子进入东北大学实行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段，同时又以他们作内线，暗中指出为首的学生领袖加以威胁和逮捕隔离。我在这些破坏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中，曾亲自传达执行命令，派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处长沈忠毅率领大批特务爪牙，会同有关部门在东北大学进行侦察和搜捕，将为首的学生领袖逮捕了五六人送交警备司令部继续侦查和囚禁。

(七) 1947年春，正当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前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北方面出现了两个叛徒（一个姓曹，一个姓李），向杜聿明告密自首。根据这一线索，杜聿明令第二处副处长张树勋作周密布置，企图在沈阳、长春、天津、青岛等地将民革分子一网打尽。张树勋会同东北督导室人事科长徐哲甫率领了大批军统特务，分赴各地，按告密线索，指名搜捕，大概是由于事机不密，在沈阳不曾逮捕到爱国人士，在长春逮捕一二人，在天津逮捕了刘甲樱（女性）及其同伴两人，后来杜聿明又自葫芦岛派兵舰去青岛逮捕了刘甲樱的父亲刘承烈。所有被捕的爱国人士均押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法处监禁起来。1947年8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撤销，又解送东北行营军法处禁押。

(八) 1947年春，正当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利情况下，保密局及国防部第二厅，双方一再电令指示，决定加强反人民反共的所谓策反任务，成立“东北行营策反委员会”，指定我为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工处处长余纪忠、中统局东北特派员单成仪、三民主义青年团辽宁支团部干事长刘广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二处处长吴宝云等为委员，名义上是通力合作，实际上是由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在包办一切。由于人民解放军内部高度警惕、团结一致，根本上就无隙可乘，无处可下手，这个徒具空名的罪

恶组织，不到半年，因为毫无成效而撤销了。

(九) 1947年夏，由上而下得到南京最高“丙种会报”的书面通知，指示在沈阳成立丙种会报。按规定时间将会报情况每月向上汇报一次。书面通知中，指定由军统、中统、沈阳市警察局、宪兵第十六团等四个单位的主管人员，每月召集一次汇报会议。由军统在东北的最高负责者为会报主席，主持推动会务的进行。当时保密局派遣在东北地区负最高责任的是我；中统在东北地区负最高责任的是单成仪；沈阳市警察局长毛文佐、宪兵第十六团长长沙靖。我曾召集并主持会报联席会议两次。这一会报的主要任务，名之曰“加强治安”措施，实际上是为打内战加强对人民的镇压统治，企图巩固后方而搞出来的勾当，并且与各地区的“甲种会报”“乙种会报”密切相配合。

(十) 自从军统特务进入东北地区之后，曾奉到军统局和东北行营的命令，要尽可能搜集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有益治安的“典章法令”作为借鉴。东北督导室根据这一指示，曾派特务分子毕琪主持其事，并利用中共叛徒黄佐汉及解放区逃出来的反动分子王开江等三人参加工作，除了搜集成文的日伪统治时期强化治安办法的规章、法令之外，还搜集了特务网分布的绘制图和使用的联络通讯器材、密电码、空中摄影器材、窃听器、曲视器等等一类东西，经整理成册，附同搜集来的实物，一份送行营，一份送保密局。熊式辉对搜集来的资料感到兴趣，亲自加以研究后，交给秘书长胡家凤起草一部对东北人民的“新统治术”，只是由于东北迅速得到解放，“新统治术”尚未来得及草成而已。

漫谈盛世才的特务统治

何 耿 光

作者在盛世才统治新疆的 11 年中，曾是新疆《塔城日报》创始人，本文详细介绍了盛世才在新疆推行特务统治的种种罪行。

盛世才统治新疆 11 年，以其庞大的特务网，笼罩新疆大地，把全省军政机关、学校、团体各级干部、大商富贾、工人、农牧民粘缚在这一特殊网上，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生活权利，一任盛世才这只大蜘蛛宰割吞噬。特务权力之大，有甚于明代之东厂，国民党之军统、中统。全省上自文武百官，下至工作人员，莫不以特务眼色行事，没有一个敢得罪他们。老百姓更视之如虎，恨之入骨。

这一特务网的中心是省公安管理处。它是在原保安局的基础上扩建的。原先保安局只是政治侦查，主要管的是官，而公安管理处，除政治外兼管民事、刑事，既管官又管民。保安局的前身是政治监察管理局，而政治监察管理局又是从边防督办公署侦探队发展而来的。盛世才自 1933 年掌握政权后，为对付敌人和异己分子，于督办公署内成立侦探队。队长是王玉书，他是新疆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与盛世才有师生之谊。盛世才对“四·一

二”政变^①领袖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省主席刘文龙乃至东北义勇军将领及其干部的侦查，都是靠这支队伍的。侦探队下属五个分队，各设分队长一人。分队长向队长负责，队长向盛世才负责。为直线领导，没有横的关系。1934年8月撤销侦探队，成立政治监察管理局，以张义吾为局长。张义吾湖北人，曾留学苏联，“四·一二”政变前，由苏联派遣，经塔城入境，在塔城行政长公署任书记员（管抄写文件的小职员）。“四·一二”政变后，经行政长赵得寿推荐给盛世才。张义吾晋省后，曾陪同教育厅长张馨（湖北人，湖北法政学堂毕业，由北京政府分发到新疆工作。历任县长、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交涉署科长等职，为“四·一二”政变领袖之一）赴苏联莫斯科医治目疾，回新后担任这一职务的。不久又任命王立祥为该局秘书长。王立祥亦系由苏联派遣来新疆的，经伊犁入境，伊犁屯垦使刘斌把王带到省城。王立祥短小精悍，熟娴俄语，刘斌戏呼之为“海里瑚”，盖以其活泼好动也。经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波列索夫建议，担任秘书长的。局内设侦查、侦讯、国际、军事、政治、经济等科。在局内工作的有来自苏联的熊效远、卞方明、胡鹏举等。有来自内地的郎道衡、程东白、王延令等，不过他们是临时性的。不久郎道衡即被任为省师范学校校长，程东白被任为新疆俄文法政学院教务主任，王延龄被任为建设厅技正（等于总工程师）。当地人员有刘文选（省一中学生，财政厅长陈德立内弟）、阿宝（哈萨克族，蒙哈学校毕业）、哈的尔阿吉（维族）、牙生（维族）、郝登榜（维族）等。基层干部多为宪警学校学生。1934年11月，国际文化特务斯文赫定由新疆窜到甘肃兰州，大肆宣传新疆已赤化，反帝会是共产组织，政治监察管理局是共产暴力机关。内地报刊亦有宣传新疆已赤化者。为此，1935年1月将政治监察管理局改为保安总局，并先后

① “四·一二”政变指1933年4月12日新疆公署参谋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等人发动政变，倒戈反对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之事。

在伊犁、塔城、喀什、哈密、吐鲁番设立分局。迨 1936 年改为公安管理处后，各县均设立了分局，即县公安局。

保安局以及后来的公安管理处主要是政治侦查。各族各界首脑和中、下层干部均在侦查之列。无论盛世才的知交、同学、亲友皆不例外，立有专案，凡一言一行均被侦查记录在卷。对军政首脑家中佣人，如汽车司机、马车夫、厨师、工役均被吸收，充当特务。通过他们将主人的言行、来客谈话、与人交往，每天报告给其附近的特务站。特务站一般为小杂货店，烟酒店，掌柜的便是特务站长。站长每天将汇集来的情报，呈转给公安管理处侦查科。1943 年笔者任新疆行政干部训练班主任时，所用的汽车司机东北人李某、马车夫阿不都、厨师王某、丁某等都是附近特务站的情报员。即使换了又换，总是甩不掉的。此外还有一种由盛世才亲自指挥的特殊特务，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能直接与被监视人员来往，如教育厅副厅长刘永祥、民政厅副厅长王连贵等。他们混在高级官员中刺探消息，向盛世才汇报。有一次笔者请正在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受训的伊犁区行政督察专员乔根吃午饭，家中厨师王某得到消息后，预先报告给特务站，特务站马上经公安管理处报到盛世才那里。当宾主人席不久，高级特务王连贵便闯入客厅。乔根是蒙古人，留日老前辈，同盟会员。这位“不速之客”是来监视我们谈话的。类似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这件事后来竟成为给我罗织罪名的一条佐证。

保安总局改为公安管理处是在 1936 年。改组后的正副处长仍为张义吾、刘贤臣。刘贤臣湖南人，是 1935 年从苏联派来的联共党员，到新后被任为保安总局副局长。秘书长王立祥此时已离职返回苏联。改组后之公安管理处，其范围与事权均较前扩大。除省城设立省会公安局外，各区、县都设立了公安局。特务网遍及全疆穷乡僻壤。公安管理处编制亦较大于原保安总局。除处长外设中将副处长一、少将副处长一、上校副处长一。下设督察室，特务队，公安队和五个科。第一科管总务，下设四个股。第二科管

特工，下设六个股。此科有中校一，少校五，上尉六，中尉十四，少尉十七，准尉二十七，上士六，中士四，警兵六十四。其特种外勤人员尚未计算在内。第三科办理户籍，下设四个股。第四科办理一般司法，下设两个股，一个看守所。第五科办理统计、汇报，下设五个股。全处官 260 人，警 292 人。全省公安人员总计：官 992 人，警 2323 人。苏联顾问仍为包国宁。

1937 年春，盛世才为炮制第一次“阴谋暴动案”扫除障碍，遂先将张义吾、刘贤臣调离，改任阿克苏正、副行政长。张、刘后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波列索夫干预下，始顺利携眷返回苏联。盛世才另任督办公署副官长赵剑锋为处长。从此盛世才便直接指挥公安管理处的工作了。盛世才为什么把张、刘二人调离呢？原来张义吾等主持公安管理处工作（包括以前在政治监察管理局和保安局时期）一切均以实事求是原则为依据，从不滥捕无辜，因此与盛世才盲目巩固政权，滥捕滥杀的荒谬做法，时有龃龉，使盛世才不能为所欲为。将他们调离，是为了遇事不致掣肘。

省城与外区县公安部门，因受盛世才直接指挥，便以特殊阶级自居。外区县的行政长、局长、县长、警备司令、团长、队长等对公安局人员莫不低声下气。当地区县公安局局长说一句话，谁也不敢置一词。他们做了坏事，也不敢过问，即使报告给盛世才，也如石沉大海。

1937 年 9 月，盛世才炮制了第一次“阴谋暴动案”时，在已捕押了很多人以后，仍未稍停。公安管理处长赵剑锋对盛世才说：“反对督办的人，能有这么多吗？”第二天赵剑锋就被调离，改任塔城行政长。以其亲信曾做过特务工作，出卖过东北义勇军将领的李英奇为处长。李英奇不学无术，残酷成性，有严重的鸦片烟瘾。他一跃登上处长宝座，掌握生杀大权，自然会俯首帖耳为其主子效命的。盛世才用人是有其标准的。既非唯亲，亦非唯贤，他所要的是唯命是从的奴才，而不是有所作为的干才。李英奇正是这种人，他充当盛世才的帮凶，一直到 1944 年 9 月随盛世才一起

滚蛋。解放后，从内地将李英奇捉拿归案，解至乌鲁木齐正法，给千千万万被害者报了深仇大恨。

1943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将公安管理处改为警务处。盛世才下台后，新任省主席吴忠信派军统胡国振继任处长，此是后话。

盛世才的特务组织，除公安管理处外还有其他系统，这就是大特务李溥霖领导的新疆省财政监察委员会中的特务组织。他以部分委员为骨干，专门侦查东北义勇军出身的机关干部与军官。如该会委员崔颖春以特务工作出色，由李溥霖推荐，被盛世才升为师长。委员富崇铨被升任为迪化县长。李英奇、李溥霖是这两大特务系统的头子。他们一直充当新疆审判委员会（特种法庭）的副委员长。委员长是盛世才的妹夫财政厅长彭吉元。彭吉元辽宁沈阳人，曾充何应钦的军委会北平分会的上校军法官。他双手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是盛世才的头号帮凶。解放后被镇压，大快人心。李英奇、李溥霖、彭吉元是盛世才手下八大金刚中最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此外，盛世才雇用特务学生，单新疆学院就曾安插四名，专门侦查院长杜重远的活动。1942年盛世才兼任新疆学院院长时，曾任用特务头子李英奇的儿子李树祥为教育主任，以监视学生和教职员。学生和教职员畏之不亚虎狼。

盛世才进行特务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每向外区县派遣工作人员，必单独接见，并给以密电本，使他们直接报告当地情况。对派出之某一机关之正副负责人，一律分别召见。对正职要求监视副职，反之又要求副职监视正职，均用密电报告他本人。这是互相监视，可是谁都不曾察觉。直到他们一起进了监狱，关在一起，谈及往事，才真相大白，恨自己给人当了工具。1938年笔者被关押在第二监狱十九号囚室。同室的阿山金矿局总办，原喀什中将警备司令刘斌和帮办原军官学校中将教育长杨炳森在赴新任前，盛世才也分别接见了他们。如法炮制，也给了他们密电本，但刘、

杨二人，深有经验，谁也没有给谁打小报告。当谈及此事，莫不大骂盛世才的奸狡和手段的卑劣。刘斌是东北义勇军将领，辽宁铁岭县人。南京陆军中学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在东北历任军职，曾担任过东北名将梁忠甲的参谋长。为人忠厚，信奉耶稣教，其父是牧师。刘斌以信教故，被诬与英国领事有来往，犯了里通外国罪。杨炳森河北省正定人，曾充吉林省警察总队长。抗日时为吉林自卫军前敌总指挥王之佑的参谋长。在狱中与笔者共习俄语，能用简短俄语给同室俄人归化军团长黑洛夫斯基的儿子小黑洛夫斯基讲聊斋故事；他对王充《论衡》亦有研究，常与笔者大谈其无鬼论。杨在东北讲武堂时，曾与沈阳地下党有接触，参加过兵运工作，思想很进步。1941年8月，刘、杨二人均被盛世才杀害。

特务统治自然带来恐怖。自1937年爆发第一次“阴谋暴动案”以来，人人自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每闻警车吼鸣，无不胆战心惊，使人食不甘味，寝不解衣，随时皆有被捕的可能，恐怖席卷全疆。省政府秘书原塔城行政长四川人陈继善，曾在狱中吟诗一首以纪实。诗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狗咬。夜来警车声，不知抓多少”。这首打油诗虽套用孟浩然诗句，但很有真实感。特务横行，到处抓人。狱中另有人为诗曰：“玉门关外春意迟，五月花开燕衔泥。闻巷盛传和平策，天山南北走缇骑”。缇骑是古来身着红衣乘马的特务，如明代东厂的锦衣卫，专门捕人。“和平”是六大政策中之一策。诗的意思是说，既提倡和平，为什么又无故抓人，破坏和平呢？这是对盛世才特务统治的抗议。

盛世才捕人的方式，可称是多样化。人们对盛世才的召见或召开的会议，均怀有戒心，甚至升官也会使人不安。因为有很多人是在召见或参加会议时被捕的。省会城防营长王兆庆升任团长，去吐鲁番赴任途中，全家被拉进第二监狱，做了阶下囚。有的于调省途中，在半路上被逮捕，如驻苏联斋桑领事原新疆裕新土产公司经理包尔汉。他和田行政长郑义钧夫妇，被调乘汽车晋省，谁

知汽车竟一直把他们送进监狱。郑义钩夫妇都是联共党员，是1935年由苏联来新疆工作的。还有趁节假日捕人，如迪化县长徐毓枯续弦，是在洞房花烛中被带上手铐推进警车的。在恐怖中，人人朝不保夕，迟早都有被捕坐牢的可能。当时狱中传诵一副对联，不知出自何公，颇具哲理。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都得进来；横出去，竖出去，横竖也须出去”。对仗工整，堪称杰作。这说明在盛世才特务统治下，每人都要蹲监坐狱的，不过是迟早而已。只要一入狱，就休想活着出去。在被捕人中，有的还是孩子。如省师范学校锡伯族学生多隆阿，不满18岁就无辜被捕，后死于狱中。他住过的囚室，有人写诗一首，诗曰：“朦胧方入梦，夜半铁门开。幼小身何罪，锒铛入狱来？”闻之使人泪下。

只要身陷囹圄，即与外界隔绝，是不允许家属接见的。受难者家属均以叛逆余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如迪化市长王立士、督办公署粮服处长程东白及笔者家属均被押送伊犁惠远城集中营。本来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何况身在狱中。生离死别，痛苦无以复加。新疆学院前身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省农矿厂副厅长马万禄（回族）于万分苦痛中，曾赋五言诗一首，并自谱曲，日夜反复歌唱，有如中魔。歌云：“与君别离后，碧桃几度花。何日得相见？夜夜梦还家。”末句反复三次，不亚阳关三叠，歌声甚为凄婉，人闻之不禁泣下。原《天山日报》社长、省商业银行行长宫振翰，乃山左才子，精翰墨，娴俄语，随黑龙江救国军入新，初任边防督公署秘书，书法浑厚有力，其自作自书之《将军南征行》条幅，及旅长盛世祺结婚时，所书赠之催妆诗横幅，均写作俱佳。1936年被捕入狱，曾于绝望中赋《寄内》一首，末联有云：“琵琶别抱任卿便，莫把萧郎当路人。”哀怨缠绵，令人不忍卒读。宫妻安玉莲为迪化京剧演员，夫妻伉俪甚笃。宫亦工京剧。1934年“九·一八”三周年纪念大会上义演募捐，夫妇二人曾串演《吊金龟》。宫饰张义，安饰张义母。当安呼张义儿时，观众不禁哄堂大笑，一时传为韵事。马万禄、宫振翰二君均于1941

年8月被盛世才杀害。他们如进步青年、有志之士，无辜身陷囹圄，均有“抗日徒有志、报国竟无门”之叹。笔者于狱中曾赋《感怀》一章：“边城久繁几冬春，每倚铁窗望暮云。铁马金戈惊日月，白山黑水陷胡尘。御倭岂乏文山（文天祥）志，报国空怀武穆（岳飞）心。春到中原草已绿，玉门关外雪犹深。”同室原喀什警备司令刘斌，原军官学校教育长杨炳森，原新疆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巴图沁，原哈密行政长刘应麟读后深为感叹。

公安管理处是预审也是终审的阎罗殿。在刑讯室里高悬“刑死勿论”盛世才亲笔手谕。刑具五花八门，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对妇女用侮辱性的酷刑，更惨无人道。如对盛世骐之妻陈秀英用猪毛绳锯其阴部，逼取其与苏联顾问通奸的口供，诬陷她谋害亲夫，举行暴动。这一空前绝后的毒刑，据说是新疆审判委员会委员长彭吉元的新发明。喀什警备司令刘斌被罚站七昼夜，瞪眼直立，不许休息，直至晕倒不省人事，才被抬回囚室。财政厅长臧谷峰每次提审，均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有的挺不住严刑拷打，竟自咬断胳膊上静脉血管，含冤死去，如建设厅科长金希文（回族）。金希文辽宁省开原县人，毕业于东北大学，青年有为，本想效力边疆，竟无辜被害。四川人陈继善历事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朝，晚年遭此不幸，冤狱刑后苦吟诗一首：“昨日挨手板，今朝又跪砖。书生何命苦，遭此不白冤。”奇台县长蒙古人孝昌，在被罚站几昼夜后，作对联两副，以抒受刑实况与感受。其中一联为“一身直立如铁钉，两眼圆瞪似铜铃。”另一联为“昼应封斋新礼拜，夜本加厉旧匪刑”。前联写罚站不准合眼，后联说明不给饭吃，以饥饿逼供。此外，审讯员还用车轮战法，昼夜轮班审讯，把人折磨得求生不得，欲死不能。

公安管理处之处决人犯，也是花样百出。刽子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刽子手照例是各监狱的监狱长。他们是单学忠、张思信、罗聚奎、王兆祥、李春台、卢殿魁。每处决一名人犯，都获有数目相当可观的奖金。处决犯人名单，盖有盛世才三字水晶章，这

就是判决书。处决人犯都是秘密执行的。有的先将犯人带进刑室，从后当头一棒，趁晕倒时，套上脖索，挂在绞架上。有的用火纸蒙在犯人脸上，再用酒喷，活活把人闷死。有的把犯人嘴堵上，用大钉子钉入脑门里。有的用药或药针把犯人毒死。如民主人士杜重远就是被督办公署医务处长侯麻子用毒针注射致死的。曾帮助盛世才打天下的杨树棠团长在狱中曾和监狱长王兆祥口角过，在他被勒死时，王兆祥为了泄私愤，故意把杨树棠勒死过去，又让他再活过来，反复折腾五、六遍，才送他上天堂。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哈萨克族，身高力大，几个人对付不了他，最后在乱刀下丧生。枪毙是最好不过的了，可以少受罪，可是特务们偏要你多受罪。无论是室内或室外处决人犯，均随地乱埋，一般没有标志。当盛世才下台后，受害者家属在荒郊丛冢中，哪里能找到亲人的尸骨！

盛世才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盛世才的特务统治虽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但毕竟挽救不了其政权的覆灭。

• 补充 订正 •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的补正

程 金 荣

顷读《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其中覃异之先生所写《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其中有“1944年底，青年军先后成立了八个师：二〇一师（师长戴之奇）驻璧山，二〇二师（师长罗泽恺）驻綦江，二〇三师（师长钟彬）驻泸县，二〇四师（师长覃异之）驻万县，二〇五师（师长刘安祺）驻贵阳，二〇六师（师长杨彬后为萧劲）驻汉中，二〇七师（师长方先觉后为罗又伦）驻昆明，二〇八师（师长黄珍吾后为吴啸亚）驻福建。”

事实上青年军共成立九个师，除覃文所写第二〇一师至二〇七师的师长和驻地外，还有第二〇八师驻江西黎川，第二〇九师（师长温鸣剑）驻福建上杭。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〇八师、二〇九师编为第三十一军，开驻福州。1946年春，第三十一军开驻杭州。当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机场对青年军第三十一军进行了检阅和训话。

另外覃文写有“1943年冬，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为了补充中国驻印度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兵团、装甲兵团等，曾局部号召知识青年参加所谓青年远征军……大约在一年之内，军政部先后在四川成立三个教导团，在陕西成立一个教导团，即一、二、三、四团，负责接受入伍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在教导团受短期训练后，就分批空运到印度去。”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共成立了五个教导团，教导

第五团（团长敖建畴）驻江西莲河。1944年夏，该团开赴昆明，后因湘桂路被日军占领，该团就在江西赣州待命。1944年底，该团就编入青年军第二〇八师、二〇九师，大部分从军青年充任军士（班长）。

为了增强史实资料的正确性，故特予以补正。

对《津塘蒋军被歼纪要》 等文的订正

胡 喧 华

一、对《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侯镜如等的《津塘蒋军被歼纪要》一文的订正：

该文第 164 页：津塘地区……“一个交警第三旅，一个交警第十总队。”第 167 页：“守北塘的交警第三旅的一个团被歼。”第 172 页：“兵力番号表”——“交警第十总队。”

我当时是交警第十二总队上校总队附，参与防守塘沽。交警第三旅辖两个总队——第十总队、第十二总队。按照当时塘沽防守部署，交警第十二总队防守塘沽山东路沿铁道至新河车站之线；交警第十总队担任塘沽外围据点新河村（塘沽以北 10 里）防守，12 月中旬一个夜间被歼灭。防守北塘的是第八十七军的一个团，在交警第十总队被歼后，即撤回塘沽，避免再被吃掉。

二、对《军统内幕》《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一文的订正：

该文第 202 页：胡宗南推荐马志超继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后被免职，改以他（戴笠）自己培训出来的周伟龙继任。

以上在先后时间有出入。我在抗战后期的忠义救国军工作。1939 年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作则被免职，周伟龙继任。1942 年在重庆成立“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周伟龙调任司令后，由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郭墨涛、阮清源先后代理。1943 年秋，由胡宗南推荐马志超继任总指挥。1946 年 3 月，该军改编为交警部队，马

志超调任交警总局副局长。

三、对《戴笠其人》(六)(1)“利用抗战抓武装力量”一文的订正：

该文第219页：“戴笠乘此机会将忠义救国军改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

我曾在别动军第七纵队、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工作。据我所知，别动军成立后，由各战区奋勇队、税警团等编组了七个纵队，以后又增编了几个纵队。为了统一指挥，只将忠义救国军隶属于别动军，当时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1946年3月，忠义救国军所辖的三个纵队和别动军所辖的各纵队，都合编为交警部队了。